

# 目 录

## 导 读

- 一、顾炎武生平简介.....( 1 )
- 二、《日知录》成书过程.....( 6 )
- 三、主要内容.....( 11 )
- 四、历史地位.....( 15 )
- 五、时代价值.....( 20 )

## 日知录

- 朱子周易本义.....( 29 )
- 艮其限.....( 43 )
- 凡易之情.....( 50 )
- 易逆数也.....( 54 )
- 孔子论易.....( 60 )
-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 65 )
- 文侯之命.....( 69 )

丰熙伪尚书.....	( 75 )
言私其縱.....	( 87 )
大 原.....	( 91 )
夸 毗.....	( 101 )
鲁颂商颂.....	( 106 )
春秋阙疑之书.....	( 111 )
春秋言天之学.....	( 118 )
医 师.....	( 121 )
乐 章.....	( 126 )
爱百姓故刑罚中.....	( 136 )
庶民安故财用足.....	( 139 )
致 知.....	( 143 )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	( 147 )
朝闻道夕死可矣.....	( 149 )
忠 恕.....	( 151 )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 158 )
博学于文.....	( 167 )
予一以贯之.....	( 170 )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 174 )
自视欲然.....	( 176 )
饭糗茹草.....	( 178 )
州县赋税.....	( 182 )
法 制.....	( 193 )
省 官.....	( 202 )
人 材.....	( 206 )
封 驳.....	( 212 )

守 令.....	( 224 )
治 地.....	( 235 )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 239 )
财 用.....	( 244 )
助 饷.....	( 262 )
访 恶.....	( 269 )
两汉风俗.....	( 272 )
正 始.....	( 280 )
宋世风俗.....	( 290 )
清 议.....	( 300 )
名 教.....	( 310 )
廉 耻.....	( 321 )
乡 原.....	( 330 )
俭 约.....	( 333 )
除 贪.....	( 340 )
家 事.....	( 354 )
田 宅.....	( 360 )
范文正公.....	( 365 )
经义论策.....	( 368 )
程 文.....	( 379 )
史 学.....	( 382 )
搜 索.....	( 387 )
秘书国史.....	( 393 )
三朝要典.....	( 403 )
记 注.....	( 407 )
四书五经大全.....	( 411 )

书传会选.....	( 417 )
内 典.....	( 422 )
心 学.....	( 431 )
窃 书.....	( 442 )
改 书.....	( 446 )
文须有益于天下.....	( 451 )
著书之难.....	( 453 )
巧 言.....	( 458 )
文辞欺人.....	( 465 )
文人摹仿之病.....	( 474 )
作诗之旨.....	( 479 )
诗体代降.....	( 483 )
四 海.....	( 486 )
尧冢灵台.....	( 493 )
杞梁妻.....	( 501 )
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 506 )
赌 博.....	( 510 )
外国风俗.....	( 520 )
佛 寺.....	( 532 )
奈 何.....	( 536 )
语 急.....	( 540 )
主要参考文献.....	( 547 )

# 导 读

顾炎武被誉为清代“开国儒宗”，《日知录》是他的代表作。全书三十二卷，博瞻通贯，明体适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文化遗产价值。包世臣说：清代“言学者必首推亭林，亭林书必首推《日知录》”（《艺舟双楫·读亭林遗书》）。

## 一、顾炎武生平简介

关于顾炎武的生平事迹，清张穆的《顾亭林先生年谱》、清钱邦彦的《校补顾亭林先生年谱》、清人撰写的多种顾炎武传记，以及顾炎武友人的诗文、清人笔记，都有十分具体的记载。

顾炎武，明万历四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613年7月15日），生于江苏昆山东南小镇千墩（今千灯）的蒋泾（今花浦村）。初名绛，曾改名继绅，以后仍名绛，字忠清；清顺治二年（南明弘光元年，1645），清

兵南下，为了表达对文天祥门生王炎午品格气节的崇敬，更名为炎武（一作炎午），字宁人；一度侨居南京钟山下，明亡后为避害出游，化名蒋山佣。顾炎武以南朝梁陈之际的著名学者、画家顾野王为先祖，顾野王居处有亭林之胜，顾炎武也被称为亭林先生。当年的亭林早已湮芜，但“亭林先生”四字，经过时间的淘选、风雨的洗礼，青史流芳，名垂千古。

顾氏为江东四大姓之一，世传“江南无二顾”。不过从《顾氏谱系考》看，自宋代以来，顾炎武的先辈大多是普普通通的读书人。他的本生父顾同应，就只是个乡秀才。顾炎武堂叔顾同古尚未成婚就已去世，未过门的妻子王氏矢志守节，奉养公婆。以此，顾炎武出生之后，就过继给已去世的堂叔为嗣，由王氏抚育。

顾炎武天生双瞳子，因三岁时出痘，一眼受到损伤，或说已经失明，或说瞳仁四周有白翳。但他七岁进书塾，依然一目十行，读书不倦。虽然其貌不扬，但生性耿介，才气不凡。

天启六年（1626），顾炎武进入县学，开始致力于科举文字。在县学中，与同窗归庄结交。二人砥行立节，孤高傲世，被人称为狂生。崇祯二年（1629），加入复社。崇祯三年秋，顾炎武首次赴南京参加应天乡试。以后多次应举，均未得一第。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再度赴试，依旧名落孙山。当时国事溃败，民不聊生，顾炎武有感于国家多难，而书生无术，于是退而读书，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五月，清睿亲王多尔衮率兵入京。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拥立福王朱由崧即帝位，年号弘光。十月，清定都北京，世祖福临即帝位，改元顺治。顾炎武对中兴之业，怀有极大的热忱，积极出谋画策，作著名的“乙酉四论”（《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从军事建制、地理形势、农田开垦、钱币流通等方面，对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顺治即位后，命豫亲王多铎率大军征江南，清军铁骑长驱苏、杭。江南各地抗清义军四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也都投笔从戎。但义军的兵力远远不敌八旗精锐。顺治二年（1645）七月，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四万余人。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砍，两个弟弟遇难。嗣母王氏在常熟绝食殉节。

顾炎武依然留在江南，从事秘密反清活动。但明王朝的终结已不可逆转。敌我力量对比的悬殊，使顾炎武等义士的希望逐一破灭。继弘光帝被杀，唐王被俘遇难，鲁王逃亡海上，南明小朝廷随起随落，江南反清的义士相继被杀。顾炎武写了一首《精卫》诗，表现出“明知已不可为，依然尽力而为”的精神追求。

临危一死谢君王。当此天崩地裂之际，一些士人选择死节以表忠贞。但顾炎武选择了另一条路，一条充满坎坷、备尝艰辛的漫长曲折之路。他认为，死节并非难事，活下去有时更难，但也更有意义。人不该将杀身成仁作为唯一的选择，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必须去做。为此，他积极投身于抗清活动之中，东至海上，北上淮安，风尘仆仆，四处奔走，联络各地义军。顺治七年（1650），顾炎武还同归庄、吴炎、潘柽章、王锡阐等人在吴江古风庄共结惊隐诗社，以“优游文酒”的面目，抒发矢志不渝的情怀。

外患日甚，内患又起。顺治十二年（1655），为侵吞顾炎武的家产，昆山豪强叶方恒与顾氏世仆陆恩勾结，欲以“通海”罪告亭林。顾炎武自南京回昆山，擒杀叛仆陆恩，因而被捕入狱。赖归庄等人营救，九月获释。次年，叶方恒派刺客跟踪，在南京太平门外将顾炎武刺伤，并指使歹徒洗劫顾家，将世代相传的财物席卷一空。

至此，顾炎武已无法在昆山居住。为了避祸，也为了结交各地豪杰，考察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他决计北游，于顺治十四年（1657）将家产尽行变卖。临行前，昆山好友设宴饯别，归庄写了著名的《送顾宁

人北游序》，说：“宁人之出也，其将为伍员之奔吴乎？范雎之入秦乎？吾辈所以望宁人者不在此。夫宣尼大圣，犹且遭魑畏匡；文王之仁，不殄厥愠。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天下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列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潘怪章等人亦有赠诗，以壮行色。

江南信美，已非吾土。从此顾炎武掉首故乡，一去不返。这年，他四十五岁。他带走的是对故乡铭心刻骨的思念，是对国破家亡深切的反思，是“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宏愿。

顺治十五年（1658）春，顾炎武登泰山，又至曲阜谒孔庙，并在章丘大桑家庄购置田产。秋季，至北京。次年凭吊山海关，发出“七庙竟为灰，六州难铸错”（《山海关》）的感慨。尽管大势已去，但顾炎武对恢复明室仍抱有希望。这年五月，张煌言、郑成功率师北伐，舟师进入长江，七月，直抵江宁城下，江淮为之一震。顾炎武闻讯南下，抵达扬州，听到明军败北的消息，只得返回天津。

为镇压反对者，清廷大兴案狱，江南地区，被害尤烈。顺治十八年（1661），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人聚哭文庙案，不分首从，一律凌迟处死。

康熙元年（1662），归安（今浙江湖州）知县吴之荣罢官，为立功再起，告发已故湖州南浔大户庄廷鑑私修《明史》，其中颇有忌讳之语。次年，庄廷鑑私修《明史》事结案：庄廷鑑遭开棺戮尸，因之而死的八十余人，株连多至七百家，妇女被发送边地为仆。顾炎武的好友、史学家吴炎、潘怪章，也因此狱牵连被害，潘怪章所作《明史记》草稿被销毁。事发时，顾炎武远在山西汾州，悲不自胜，作诗祭悼，又作《书潘吴二子事》一文，对此狱作了沉痛的记载。

“文字狱”很快就降到顾炎武的头上。康熙七年（1668），山东莱州人姜元衡告发其旧主黄培等十四人收藏刊印“逆诗”，并称有《忠节录》

一书，“昆山顾宁人到黄家搜辑发刻”。此案共株连江南江北名士巨室三百余人。顾炎武在狱中七个多月，每天仅靠几个烧饼度日，备尝折磨。幸赖友人李因笃、颜光敏及外甥徐元文等人多方斡旋，大力营救，才得以保释出狱。但黄培等十四人还是以“逆诗案”被杀。

自康熙元年（1662）起，顾炎武往来于北京、山东、山西、陕西之间，与著名学者傅山、李因笃、李颙、王弘撰、朱彝尊、屈大均等人订交。康熙四年（1665），在山东章丘大桑家庄购置房屋田产。次年，与李因笃诸友在雁北集资垦荒。

在顾炎武北游的二十多年间，他心藏家破国亡的沉痛，胸怀救国济民的理想，遍游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九州历其七，五岳登其四”（《与戴耘野》）。在给弟子潘耒的信中，顾炎武谈到途中颠沛流离，从未在一处住满三个月，一年之中，一半时间寄宿旅店。“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著花”（《亭林诗集·又酬傅处士次韵其二》），可谓顾炎武晚年形象的写照。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中国文人普遍的理想，但真能做到的却不多。顾炎武做到了。尽管他走得有些无奈，走得十分艰辛。北游途中，他始终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边走边读，成了游历生涯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

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顾炎武游西岳华山，寄居王弘撰家。在《与三侄书》中，他谈了欲卜居此地的用心，除了“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外，更主要的是：华阴地扼潼关、黄河险要，即使足不出户，也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地；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就有高屋建瓴之便。

在抗清斗争中，文人的反抗尤其强烈，影响也更大。为了从根本上消除反抗意识，清廷实行软硬兼施的两手政策，强化对士人的控制，限

制其思想行动。一面以“文字狱”镇压、威胁不服者；一面又借助科举收买、奖励顺从者。

康熙十七年（1678），清廷为纂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儒，一时名士赴召者不少。内阁学士叶方霭和翰林院侍讲韩菼想推荐顾炎武。顾炎武严词拒绝，并且从此不再入京。次年，叶方霭任明史馆总裁，又想招顾炎武入史局，顾炎武在回信中，慷慨陈词：“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与叶切庵书》）

不管面前有多少险阻，都毫不动摇顾炎武的决心，不能阻碍他前进的脚步。在顾炎武心头牵萦的，始终是对中兴大业的期盼。

康熙二十年（1681）八月，顾炎武自华阴至山西曲沃，因病呕泻不止。九月，移居韩宣的宜园，病势稍有减弱。康熙二十一年正月八日，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落地，病又发作，整天呕泻不止。九日凌晨，与世长辞。一应丧事，全仗韩宣操持。

三月，顾炎武从弟顾岩自昆山赶赴曲沃，与嗣子衍生一起扶柩南归，葬于千墩祖茔。在外漂泊二十五年后，顾炎武又回到了故乡。

顾炎武著作等身。现存著作三十五种，主要作品有《日知录》三十二卷、《音学五书》三十八卷、《天下郡国利病书》一百二十卷、《肇域志》四十册、《历代帝王宅京记》二十卷、《金石文字记》六卷，以及《亭林诗文集》等。

## 二、《日知录》成书过程

顾炎武晚年自言：“某自五十以后，笃志经史，其于音学深有所得。而别著《日知录》，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共三十余卷。”（《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亭林文集》中有近二十篇文章言及《日知

录》，除《答俞右吉书》《与人书十》《与汤圣弘》这三封书信不详年月，其余都作于康熙初年以后。以此，包括钱穆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顾炎武作《日知录》，应在康熙元年（1662）即五十岁之后。

而在《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卷首，顾炎武有自记云：“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初刻本起于康熙九年（1670），陈祖武先生据此推定：“由康熙九年上溯30余年，恰当明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离开科场之后。可见，《日知录》的始撰大致就在此时。”（《清儒学术拾零·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在顾炎武所作《孺觚》前，也有一段自记，前面和《日知录》自记相似：“仆自三十之后，读经史，辄有所笔记。岁月既久，渐成卷帙，而不敢录以示人。”顾炎武三十岁时为崇祯十五年（1642），所说的“笔记”，即作《日知录》笔记，可作佐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日知录》乃顾炎武“一生精力所注”之书。阮元《国史儒林传》云：“《日知录》三十卷，尤为炎武终身精诣之书，盖积三十余年而后成，凡经史、吏治、财赋、典礼、艺文之类，皆疏通考证之。”都持这种看法。产生两种不同的看法，主要是着眼点不同。前说是《日知录》初步成稿的时间，后说考虑的是《日知录》开始着手撰写的时间。

康熙九年八月，顾炎武离开山东德州去北京，友人程先贞送行，作《赠顾征君亭林序》，其中提到劝顾炎武出书的事：“今年结夏于此，与二三同人讲《易》。复得发其《日知录》一书观之，多考古论世之学，而其大旨在于明经术，扶王道，为之三叹服膺，劝其出以惠学者。”（见沈岱瞻《同志赠言》，《亭林先生遗书汇辑·附录》载）正是由于程先贞和众多友人的需求和劝说，顾炎武才动了刻《日知录》的念头。

在刻书之前，《日知录》中的一些篇章已广被传抄，其中也有歪曲原作的讹误之说。为了“无俾贻误来学”，顾炎武写了《孺觚十事》，以

作辩证。“无俾貽误来学”，这也可能是促使顾炎武将《日知录》刻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初刻日知录自序》中，有这么几句话：“炎武所著《日知录》，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遂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上章为天干中“庚”的别称，阉茂为地支中“戌”的别称，上章阉茂即“庚戌”的别称，当时的庚戌年为康熙九年。而在《蒋山佣残稿·与友人书》中，顾炎武又说：“《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这年为康熙十年，比前说晚了一年。这可能也是由于着眼点不同，陈祖武先生认为：“八卷本《日知录》系康熙九年始刻，而至康熙十年完成。”（《顾炎武评传》）

现存《日知录》初刻八卷本，刻书者署名“符山堂”。符山堂为顾炎武友人张昭书屋，在淮安（今属江苏）。前三年，顾炎武曾委托张昭父子在淮安校刻《音学五书》。

据傅增湘所见《日知录》初刻本，计一百十六条。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有一百四十一条。卷一首篇为《朱子周易本义》，在潘耒刻本《日知录》卷一；卷八末篇《劳山》，在潘耒刻本《日知录》卷三十一。各篇编排的次序，和潘耒三十二卷刻本基本相同。“上篇经术，中篇治道，下篇博闻”，在初刻本已成雏形。

不过就具体内容而言，初刻本和潘刻本已有很大不同。如《朱子周易本义》，初刻本仅五百字，而潘耒刻本有二千余字（包括自注）。初刻本卷二《三年之丧》，潘刻本在卷五，内容扩充更多，但少了原有的“初丧四十九日居于柩侧，谓之七七”一段文字。据全祖望说：“亭林儒者，非先王之法言不言，至此条则失之。然此乃其未定之说，在初刻《日知录》八卷。及晚年重定则芟之矣，盖自知其失也。”（《经史问答》卷五）

《孺觚十事》附于初刻本之后，其中第一条即说“《日知录》有辩淄川非薛一事”。可能顾炎武还想作进一步修改，初刻本不收“辩淄川非薛”的文字。潘耒本卷三十一载《史记菑川国薛县之误》，前面一段和《孺

觚十事》所录一字不差，后面二段改动较大。可见初刻本收录的只是顾炎武选定的部分文章，而非当时已完成的全部作品，于此也显示了作者文不苟作的严谨态度。

《日知录》八卷本刻成后，顾炎武的撰写和修改，一直在不断进行。在与友人的书信中，顾炎武言及《日知录》的撰写进程，历历分明：

“弟夏五出都，仲秋复入，年来踪迹大抵在此……顷者《日知录》已刻成样本，特寄上一部。”（《亭林佚文辑补·与李良年（武曾）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一年（1672）。

“黔中数千里，所刻之书并十行之牍乃不久而达，又得手报至方山所，而寄我于楼烦、雁门之间……此书中有二条，未得高明驳正，辄乃自行简举，容改后再呈。且续录又得六卷，未必来者之不胜于今日也。”（《亭林佚文辑补·又答李武曾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二年（1673）。

“弟今年寓迹半在历下，半在章丘。而修志之局，郡邑之书颇备，弟得藉以自成其《山东肇域记》……近日又成《日知录》八卷，韦布之士，仅能立言，惟达而在上者为之推广其教，于人心世道，不无小补也。”（《亭林佚文辑补·与颜修来书十五》）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二年（1673）。

“于上章阉茂之岁刻此八卷。历今六七年，老而益进，始悔向日学之不博、见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书已行于世，不可掩。渐次增改，得二十余卷，欲更刻之，而犹未敢自以为定，故先以旧本质之同志。”（《亭林文集·初刻日知录自序》）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五年（1676）。

“《日知录》三十卷，已行其八，而尚未惬意。”（《亭林文集·答曾庭闻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六年（1677）。

“《日知录》初本乃辛亥年刻。彼时读书未多，见道未广，其所刻者，

较之于今，不过十分之二。非敢沽名衒世，聊以塞同人之请，代抄录之烦而已。”（《蒋山佣残稿·与友人书》）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七年（1678）。

“《日知录》续已改定为三十卷，前本复有增损，且可勿刻。”（《蒋山佣残稿·与汤圣弘》）

“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惟多写数本以贻之同好，庶不为恶其害己者之所去。”（《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

“《日知录》二集想是八九年前之书，已不可用。今所著三四十卷，前十卷论五经者，已录送原一，其四书尚未全，而以后所谈兴革之故，须俟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一看，然后古今之事，始大备而无憾也。”（《蒋山佣残稿·答公肃甥》）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系于康熙十九年（1680）。

“今此旧编，有尘清览。知我者当为攻瑕指失，俾得刊改以遗诸后人，而不但当为称誉之辞也。”（《蒋山佣残稿·与友人书》）在撰写的过程中，顾炎武还将书稿寄与陆世仪、黄宗羲、王建常、迟维城、阎若璩等友人，以期攻瑕指失，精益求精。（见《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亭林佚文辑补·寄王仲复先生书》《蒋山佣残稿·复迟明府书》及《潜研堂集·阎先生若璩传》等文）

“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日知录·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日知录》撰写过程最真切的写照。

用心之苦、用力之勤，一至于此，所得必是精品。即使如此，顾炎武却再无开雕之意。他引东汉马援的话：“良工不示人以璞。”认为“著述之家，最不利乎以未定之书传之于人……《日知录》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赵孟不复年’之‘年’），则以临终绝笔为定”（《亭林文集·与潘次耕书》）。颇有“藏之名山，传诸其人”之意。

“年来行止类浮萍，虽有留书未杀青。世事粗谙身已老，古音方奏客谁听？儿从死父传楹语，帝遣生徒受壁经。投笔听然成一笑，春风绿草满阶庭。”（《亭林诗集·次耕书来言时贵有求观余所著书者答示》）藏之名山，更多的是其人其书与世不谐、知音难觅的无奈。

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逝世。弟子潘耒从其养子顾衍生处“求得手稿，较勘再三，缮写成帙，与先生之甥刑部尚书徐公健庵、大学士徐公立斋谋刻之而未果。二公继没，耒念是书不可以无传，携至闽中，年友汪悔斋（福建布政使汪楫）赠以买山之资，举畀建阳丞葛受箕鸠工刻之以行世”（《日知录序》）。在顾炎武去世十三年之后，即康熙三十四年（1695），遂初堂（潘耒书房）刻本《日知录》三十二卷终于问世。

道光间，嘉定黄汝成在遂初堂刻本的基础上，参以阎若璩、杨宁、沈彤、钱大昕四家校本，并酌收王锡闾、张尔岐、陆世仪等九十六位学者（几乎囊括了自康熙至道光年间的顶尖学者）的研究成果，编成《日知录集释》三十二卷，即西溪草庐重刊本，于道光十四年（1834）刊行。随后他从吴县王亮生处借得未经删改的《日知录》原写本（见张穆《年谱》引许瀚语），在比勘遂初堂本后，参以陈訏、张惟赤、遽园孙氏、楷庵杨氏四家校语，成《日知录刊误》二卷。后又得陆筠校本，成《日知录续刊误》二卷。自此之后，黄汝成的《集释》本便取代遂初堂本，成为影响最大的《日知录》刻本。

### 三、主要内容

顾炎武说：书名中的“日知”，出自子夏之言：“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论语·子张》）原意是每天学习一些新知识，每月温习已掌握的知识，可以称作好学了。这里的“知”，是动词，即了解、懂得。《日知录》即每日的认知和感悟。但书名中的“日

知”，也可作名词理解，即每日新增的知识，“录”即对这些认知和知识的记载。

顾炎武年少时，先祖曾对他说：“著书不如抄书。”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参加科举考试，再度落榜。当时他二十七岁，还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可以争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天下郡国利病书序》），顾炎武从此不再随波逐流，追求功名，而是全面攻读能经世致用的书，如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各地图经、前人的论说，乃至官府的公文报章，凡是和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内容，都随手记录下来。后来他云游四方，只要有人以书相示，就会留下，或亲手抄写，或请人抄录（见《钞书自序》）。顾炎武最重要的著作，无论《日知录》，还是《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在抄录前人文献的基础上完成的。

但顾炎武又不是简单的抄书，在抄录的同时，也记下读书的心得。这是顾炎武读书的习惯，也是他治学的特色。他曾答友人问《日知录》的进展：“尝谓今人纂辑之书，正如今人之铸钱。古人采铜于山，今人则买旧钱，名之曰废铜，以充铸而已。所铸之钱既已粗恶，而又将古人传世之宝，舂剉碎散，不存于后，岂不两失之乎？承问《日知录》又成几卷，盖期之以废铜。而某自别来一载，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他认为：如果只是为抄书而抄书，那么抄录的依然是前人的东西。在抄录的过程中，随手将读书心得记下，从中发现问题，随时修正，发现和古人议论重复的，随即删掉，通过取精汰芜，精益求精。这就不仅是采矿，更多的是冶炼；不仅是抄书，更多的是研究。如此日积月累，便编成一本内容极其广泛的书。用潘耒的话说：“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故谢章铤说：“大儒之所谓‘钞’，盖前圣之所谓‘述’也。”（《赌棋山庄集·竹柏山房丛书序》）这样的抄写，远比那些挥笔书写的长篇大论扎实、精深、可贵。顾炎武尽一生之力，撰写《日知录》，这是一个十分艰辛的过程，

让人不禁生“更觉良工心独苦”（杜甫《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的慨叹。

顾炎武多闻博学，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研究的领域，涉及政治、军事、财经、刑法、风俗、伦理、礼制、典制、文艺、语言、史学、考古、金石、地理、经学、理学、佛道、教育、天文、历算、术数、掌故、异域等各个方面。这在《日知录》中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现通行的《日知录》有三十二卷，一千零二十余条。顾炎武将其内容分为经术、治道、博闻三部分（《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康熙二十一年（1682）潘耒从其家取出书稿，再三校勘，按内容大体划为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等八类（《日知录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则分作十五类：“书中不分门目。而编次先后则略以类从。大抵前七卷皆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皆论政事，十三卷论世风，十四卷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卷十七卷皆论科举，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论艺文，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外国事，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这样分类，看似很细致，但不免琐碎，反将顾炎武最重视的治道淡化了。

当然，这些分类并非绝对，很多是交叉的。在经术和博闻部分，不少与治道相关，有些甚至是围绕治道展开的；而在治道部分，也包含着不少经术和博闻的内容。其实，在顾炎武看来：治道本于经术，博闻有助治道，三者一以贯之。《日知录》每一篇都提出一个具体的问题，各篇之间都相对独立，罕见有重复的现象，但又始终不脱离以经术为本原、以治道为指归的主线。

中国古籍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以“经义”领先。顾炎武尤重经学，在幼年就已读“四书”的全注；晚年于“六经”用功尤深。他认为“经”乃礼乐德刑之本、文治教化之源，通经可以明道，进而经世。

但顾炎武对经籍和前代的经说，不依傍，不盲从。“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日知录·丰熙伪尚书》），这是他治经的原则。顾炎武是把经学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来研究的，不独《春秋》为史，“虽六经皆然”（《日知录·鲁颂商颂》）。以此，他治经常引史证经，借助史实，阐发经义。虽然他研究的是古代典籍，但充满时代感和现实感。

顾炎武撰写此书的宗旨在有助治道，此书的重心也始终在治道。这一点，他有明确的表述：“著书陈治本，庶几回苍穹。”（《亭林诗集·赠卫处士蒿》）“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故曰：‘载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夫《春秋》之作，言焉而已，而谓之行事者，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将欲谓之空言而不可也。愚不揣，有见于此，故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而既以明道救人，则于当今之所通患，而未尝专指其人者，亦遂不敢以辟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三》）

治道离不开“政事”，包括各级行政区域和官吏的职责、历代用人制度的利弊、如何选拔人才、如何监督官吏、如何维护社会安定、如何保持国家稳定、如何发展经济和实业，如何征收赋税，如何满足民众生活需要，以及君主制、法制、土地制度、水利、盐铁、钱币、贸易等各个方面。虽然时代已经变化，但书中提出的很多问题，至今依然值得重视，可供借鉴。

孟子论天下“一治一乱”，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诋行，放淫辞。”（《孟子·滕文公下》）顾炎武继承并发挥了孟子的看法：“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亭林文集·与人书九》）陈澧认为：“亭林在明末亦一孟子也。”（《东塾读书记》卷三）

“世风”是《日知录》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舆论监督、立身处世、不正之风等内容。对此，潘耒激赏不已：“至于叹礼教之衰迟，伤风俗之颓败，则古称先，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日知录序》）其中关于“廉耻”“耿介”“俭约”“除贪”“贵廉”等命题的论说，至今仍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具有警示和启迪的作用。

“科举”部分所说的，实际上是关于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问题。顾炎武认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对其窒息人的思想和活力，从而扼杀人才，作了深刻的揭露，发人深省。

在“艺文”中，顾炎武对如何创作、如何编史，有十分具体的论述；对一些重要的典籍和思潮，也有独到的看法。里面提出许多有关学风的问题，如：“文须有益于天下”“著书之难”“立言不为一时”“文辞欺人”“文人摹仿之病”等，至今依然是值得重视、理应遵守的准则。

“杂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对古今中外、历史地理、天文历数、文艺语言、典章掌故的一些现象、问题、知识，辨析源流，辨别真伪，很多是考证文字。对今人阅读古籍、了解历史，颇有裨益。

#### 四、历史地位

顾炎武著作等身，且无空言，“其绪论足以扶世翼教者，虽残编断简，至一句一字之微，后之人往往摭拾而珍惜之，俾流传至于千百祀之久”（邹福保《日知录之余》序）。而他最看重的作品，无疑是《日知录》：“弟州年来，并无一字流传坊间，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亭林佚文辑补·与人札》）“向者《日知录》之刻……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夏，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自信其书之必传，而未敢以示人也。”（《亭林文集·与杨雪臣》）

就当时的声望和对后世的影响二者而言，清代学术界，似乎无人能与顾炎武比肩。潘耒说当时“文人才士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日知录序》）。被方苞称为“国朝第一名臣”的汤斌，借他人之口，表达了自己对顾炎武的敬仰：“前岁山史（王弘撰）自关中见访，询及交游名贤，即曰吴郡顾先生品高学博，真当今第一有用儒者也。”（《汤子遗书·答顾宁人书》）他尤其爱读《日知录》，从而发出“惜不能得《日知录》尽读之”（同上）的感慨。被江藩称为“清代汉学家第一”的阎若璩，博极群书，睥睨一代，即使像文坛正宗王士禛那样的人，也认为不足挂齿，唯独对能诘难《日知录》中的某些条目而沾沾自喜，“则其引炎武为重，可概见矣。然所驳或当或否，亦互见短长，要不足为炎武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顾炎武，阎若璩可谓推崇备至：“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钱谦益）也，曰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黄宗羲）而三。先生云亡，上距牧斋薨已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歿亦且十四五年，盖至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附《南雷黄氏哀词》）

在顾炎武众多著作中，公认成就最大的便是《日知录》。潘耒称此书“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明三百年来，殆未有也”，“先生非一世之人，此书非一世之书也”（《日知录序》）。后人对《日知录》的评价，始终和对顾炎武的评价连在一起。

清初汉学和宋学之争，尚不明显。但由于治学精神和方法的不同，二者之间的分歧始终存在。乾嘉之后，汉宋之争愈趋激烈。《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是体现顾炎武思想的代表作，文中揭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对理学家最关注的“天道”“性”“命”，并不措意：“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

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

当务之急，就是治国平天下。亭林继承了《大学》的精神，从格物致知入手，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经术和经世，在亭林原为两面的两面，不可或缺，治经是为了经世，而经世又必须从明经入手，因此也就无畸重畸轻之弊。事实上，在清代确实也有一些客观的评价：“要之先生之才，体用兼备，固不屑屑以考订见长，而亦不徒以经生自命也。即以经学论，书中所录，及世所传《五经同异》，类皆折中众说，不名一家者，是先生学期心得，不尚苟同，而亦非立异，正不必于马、郑、程、朱之间，为先生强分主奴也。”（张杓《日知录跋》，见《清经世文编》卷二）王国维在概述清代学术演变时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

出于对明亡的沉痛反思，清初学者，特别是亭林的友人，无不推崇其学的经世之用。潘耒《日知录序》云：“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闵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读是书而憬然觉悟，采用其说，见诸施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

潘耒的忧虑，是先见之虑，而非杞人之忧。时至乾嘉年间，社会环境、学术氛围，都已发生很大的变化，偏重汉学的四库馆臣，出于自身的学术追求和爱好，便不同意潘耒的说法：“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悞而过锐……潘耒作是书序，乃盛称其经济，而以考据精详为末务，殆非笃论矣。”（《四

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国初称学有根柢者，以炎武为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经部二十九·左传杜解补正》）而《日知录》“盖其一生精力所注也”。“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十九《子部二十九·杂家类三》）

正是由于顾炎武等人倡导经学，注重实证，不为空疏无用之谈，后来学者开始重视研究经籍，“其时若阎若璩、胡渭、顾祖禹、周惕之辈，其后若王鸣盛、钱大昕、江永、戴震之徒，莫不闻风兴起，由浅逮深，炳然述作，与古同功”（《东华续录·光绪六十》引陈宝琛奏）。由此造成清代朴学的鼎盛。故章学诚将顾炎武誉为清代“开国儒宗”（《文史通义·浙东学术》），王国维说“国初之学创于亭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阮元编《国史儒林传》，以顾炎武为首。故纯从学术考虑，《四库提要》的看法，也不无道理。

但知人必须论世，对顾炎武的评价，不能离开他所处的历史环境。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评价，其后续都是扬弃，是如何继承。而该继承的除了具体的知识，还有意识和精神。四库馆臣感兴趣的未免琐细，缺乏更高层面的追求。更何况对顾炎武来说，经世和经史，既不可分，也不能缺。姚椿已看到这一点：“或谓亭林经济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纪昀）。经济诚不可空言议，然天下容有能言而行之未尽善者，未有不能言而所行乃与古合。且谓经济不出于经史，则正昔人所谓歧而二之者也。”（《晚学斋文集·顾亭林先生肇域志手稿跋》）

被誉为“岭南第一才子”的宋湘有一段话，集中体现了清人对顾炎武和《日知录》的评价：“国初名儒，余最服膺顾亭林先生。先生之学博矣，而无考据家傅会穿凿、蔓引琐碎之病；先生之行修矣，而无讲学家

分门别户、党同伐异之习；先生之才识优矣，而无纵横家矜才逞智、剑拔弩张之态。所著《日知录》一书，举经史子集之要，统修齐治平之全，择精语详，扶世翼教，其学为有用之学，其言皆有本之言。孔子所谓‘博学于文，约之以礼’，孟子所谓‘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若先生者，庶乎足以当之矣。”（凌扬藻《蠡勺编》卷三十七《国初名儒之最》引《松心日录》）

关于顾炎武和《日知录》所长在经世还是经史这个问题，很快又在新的历史时期被提出。晚清又开始新的剧变，对世事的忧虑，使时人的心和明末清初的学者贴近，对顾炎武的关注，也回到经世致用这一面。曾国藩作《圣哲画像记》，自文王、周公直至当代，共三十二人，其中就有顾炎武：“我朝学者以顾亭林氏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吾图画国朝先正遗像，首顾先生，次秦文恭公，亦岂无微指哉！”（《曾文正公文集》）

对前人的经世、经史之争，钱穆有一段概括性的话：“盖亭林论学本悬二的，一曰明道，一曰救世。其为《日知录》又分三部，曰经学、治道、博闻。后儒乃打归一路，专守其经学即理学之议，以经术为明道。余力所汇，则又及博闻。至于研治道，讲救世，则时异世易，继响无人，而终于消沉焉。若论亭林本意，则显然以讲治道救世为主。故后之学亭林者，忘其行己之教，而师其博文之训，已为得半而失半。又于其所以为博文者，弃其研治道论救世，而专趋于讲经术，务博文，则半之中又其半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近代西风东渐，新学日盛。但对顾炎武的钦敬、阅读《日知录》的热情，始终不减。七七事变后，陈垣先生在已沦陷的北平，依然讲解《日知录》。并用近三十年的时间，校注《日知录》，“是他未刊著作中用时最长、用力最多的一部”（《日知录校注》陈智超前言）。确实，顾炎武

用心血凝聚的著作，如《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等，无不有美国计民生，提倡实学，具有创新价值，直至今日，依然被视为经典中的经典。

## 五、时代价值

《日知录》是顾炎武一生心血的结晶，从中寄托了他的志向和事业。在给朋友的信中，顾炎武表达了这样的愿望：“所著《日知录》三十余卷，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而有王者起，得以酌取焉，其亦可以毕区区之愿矣。夫道之污隆，各以其时，若为己而不求名，则无不可以自勉。”（《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通过治学来救世，是他的志向；留下作品供后人借鉴，便是他的事业。这也是《日知录》在顾炎武心中的价值。

“吾辈学术，世人多所不达，一二稍知文字者，则又自愧其不如。不达则疑，不如则忌，以故平日所作，不甚传之人间。”（《亭林文集·与人书十二》）顾炎武明白：自己的思想和著作，当代人很难理解，至于流俗更难接受。以此，他像司马迁那样，宁可将作品藏之名山，将知音寄于后人。“须绝笔之后，藏之名山，以待抚世宰物者之求。”（《初刻日知录自序》）去世前不久，顾炎武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别著《日知录》……有王者起，将以见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为今人道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十五》）顾炎武明确表示：这部书是写给后人看的，希望能对后世的当政者有所裨益。他期待日后有雄才大略的人出现，从这部书中采纳一些有益的看法，完成他的心愿。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直到晚清（或者说近代），世人才真正全面认识到顾炎武及《日知录》的传世价值。具体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立身准则：博学有耻。有其人才有其书。在给潘耒的信中，顾炎武坦陈心迹：“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一》）治学是为了明道，明道是为了救世，这就是他的平生之志，是他立身的根本。《日知录》就是一部志在救世的著作。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出于《论语·颜渊》和《子路》篇。顾炎武将二者合而为一，作为立身的准则，并作了阐述，这也是在《日知录》中反复提出和强调的主题。他所说的“学”，不仅是书本知识，包含着更广泛的内容。简言之，他将廉耻作为道德的基础，将实学作为博学的根本。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必须对社会有用，这样才称得上道德学问，两不偏废。梁启超尤其敬慕顾炎武的为人，称他德艺双馨，“不但是经师，而且是人师”，能将道德、学问、文章三者融为一体（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二、敢于担当：匹夫有责。康熙二十年（1681）秋，为了陕西、甘肃千百万百姓的生计，顾炎武给朝廷当权大臣写了一封信。“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故一病垂危，神思不乱。使遂溘焉长逝，而于此任已不可谓无尺寸之功，今既得生，是天以为稍能任事而不遽放归者也，又敢怠于其职乎？”（《亭林文集·病起与蓟门当事书》）此时顾炎武只是一个“一病垂危”、自身难保的遗民，离去世仅几个月，但“神思不乱”，依然以“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源自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境界更高。

这种责任感，在《日知录·正始》篇中，凝结成这样一段文字：“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晚近学者又将此概括为八个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说这不是顾

炎武的原话，但的确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和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样，体现了一种担当，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近代外患日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直被看作是抵御外敌的精神支柱。从曾国藩、张之洞，到梁启超、章炳麟、蔡锷，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还是革命派，都以此激励士气，鼓舞民心。由于这句话始终具有激发世人爱国、爱民热情的积极意义，因此传诵众口，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呼声。

三、治学宗旨：经世致用。顾炎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怀（《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以“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初刻日知录自序》）为治学宗旨。他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重视“坐而言，可起而行”的实用之学，主张以“修己治人之实学”，替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他认为著书立说，必须是针对现实的切实有用的东西，不可尽是些从前人那里照搬过来的陈词滥调。对晚明空谈心性的习气，作了深刻而又尖锐的批判。

《日知录》主要作于明亡之后。顾炎武痛定思痛，通过对前代和当代史实的考论，追本溯源，对明末朝政和社会的众多乱象，对国家政事、社会经济、文化教育、风俗民情等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对这些问题产生和恶化的原因，明王朝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教训，作了深刻的思考；并对如何防止、解决这些问题，提出自己独到的看法。潘耒称顾炎武为“通儒”：“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日知录序》）《日知录》也可说是一部学术研究性的“资治通鉴”。和《资治通鉴》的区别在于：《通鉴》主要叙述重大的历史事件，史实是主体；《日知录》则对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结果和影响进行探讨，论断是中心。

四、研究精神：自立自重。梁启超认为：顾炎武之所以能成为清学

的开山之祖，一在于他开创了新的学风；二在于他做学问的方法，给后人垂示模范；三在于他所做学问的种类，替后人开辟了途径（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日知录》集中体现了顾炎武的学术旨趣、治学精神和研究方法。

“若徇众人之好，而自贬其学，以来天下之人，而广其名誉，则是枉道以从人，而我亦将有所不暇。”（《亭林文集·与友人论门人书》）程先贞说顾炎武的著述，“本于经而不泥于昔闻，原于史而不拘于成说，多前贤所未明，一旦自我发之者”（《赠顾征君亭林序》）。顾炎武治学，敢于怀疑，善于推论，不自满，不武断，不依傍，不盲从，不剿袭，不雷同。“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日知录·著书之难》）。潘耒说他研究问题，都要“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对一些重要命题重新考察和定义。“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潘耒《日知录序》）在撰写《日知录》中所体现的创新自立的意识、实地考察的作风、文不苟作的精神、虚怀若谷的态度、精益求精的追求，始终是学术研究理应努力的目标。

五、研究方法：注重实证。全祖望说顾炎武出游，总是“以二马二骡载书自随，所至厄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亭林先生神道表》）以此，他的论述，材料丰富，论证严密，疏误很少。《日知录》中一些考证文字，如《尧冢灵台》、《大明一统志》中的“杨令公祠”等，都是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鉴别史籍记载的成果。

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的命题，“抉剔史传，发挥经典”（《金石文字记序》），探源溯流，开清代朴学的先声。他倡导的由音韵文字入手进行学术研究的途径，从究名物、辨史事入手读经，将典籍研究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特别是重视金石的发现和研究，以金石证经、史，“其事多与史书相证明，可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金石文字记序》），被

后人奉为圭臬。魏长宝先生认为：“顾氏发明的这些治学方法，包括重纂辑、明流变、善归纳、求证佐、躬实察等等，后来皆成为乾嘉学者治学的法门。”（《顾炎武与乾嘉学派》）这些在《日知录》中都有很好的体现。

顾炎武博览群书，见多识广，网罗四部，熔铸群言，读《日知录》，首先让人震惊的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大。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古代规模最大、最完整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著作。李慈铭评论《日知录》说：“此三十二卷中，直括得一部《文献通考》，而俱能自出于《通考》之外。”（《越缦堂读书记》）同时又不能不叹服此书的精深。江藩说顾炎武“学究天人，博综群籍”，“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经史之外，如唐宋元明诗文集、小说、笔记，自秦汉及宋元金石文字，皇朝典章制度，满洲蒙古氏族，皆研精究理，不习尽工”（《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三），洵非虚美。

后人常将《日知录》与南宋黄震的《黄氏日钞》、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相比，但梁启超认为二者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看来，《黄氏日钞》和《困学纪闻》只能算是原材料，而《日知录》则是精制品（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大昕学问之博大精深，在中国学术史上罕见其匹，被认为是清代唯一学问可与顾炎武媲美的学者。他治学深受顾炎武影响，所作《十驾斋养新录》，考镜源流，洞悉幽微，体例与《日知录》相近；就专精而言，更在《日知录》之上。但经世致用，终有逊色。清代还有一些在形式上和《日知录》相仿的学术名作，但无论价值和影响，都无法与《日知录》相比。

作为清学开山之祖，顾炎武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广泛而又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学以人为本，探讨的根本问题是伦理问题，是人的问题。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具体反映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的特性，在其著作中所体现的，不仅是某些学理，某些现象，更是时代精神。研究顾炎武的思想和著作，也是在清理学术文化

演进的轨迹，从中探讨学术演变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发展的规律，进而转向对社会思潮、时代意识、时代特征的探求。这种研究，既有历史感，又有时代感、现实感，因而始终是动态的、充满活力的。这就使顾炎武思想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发展过程之中，各个时代，都能从中获得当代意义和价值。

顾炎武的学术思想，兼收并蓄，博大精深，涉及广泛的历史、社会、文化内容。作为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符号，顾炎武学说具有极大的兼容性和象征意义。研究清代学术思想，以及清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顾炎武著作是首选之书。

顾炎武治学，具有极强的思辨、综合、推理能力，这在《日知录》得到完美的体现。阅读、研究《日知录》和顾炎武的其他著作，对重视各类学科的相互渗透，运用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手段，做更深入、更有效的探索，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金无足赤，《日知录》也难做到无瑕，有其不足和错误。其中有认识问题，如尊古复古、道德说教，不合时宜；有些看法过于激愤，有欠公允；也有一些材料引述的疏误，兹不赘述。

本书在理清《日知录》版本源流的基础上，比较优劣，以出版时间早、内容完整、错误少、校刻精、具有代表性为标准，选定以潘耒刊刻的清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本为底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日知录集释》，附《日知录刊误》《续刊误》二书。另附“外七种”，其中五种为校正书。近年来《日知录》的整理、研究，成绩斐然，尤其是陈垣的《日知录校注》、张京华的《日知录校释》，以及栾保群的《日知录集释》，无论校勘还是注释，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但依《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的体例，“校勘并非本书的重点，对重要的异文可酌情说明”。故本书仅校以整理《顾炎武全集》时所用的康熙九年顾炎武手定本、康熙

三十四年遂初堂刻本天头的佚名原校记、道光十四年《日知录集释》本，同时参考了成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黄侃《日知录校记》（与原校记互有出入）。对于抄本原文中某些带有歧视性的词语，如“夷狄”“胡虏”等，则保留潘耒的改动，不再改回。

《日知录》的内容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传统学术研究的所有科目。选本既要体现这种特色，又不能各科目平分秋色，应根据其内容、篇幅、价值、影响，有所侧重。本书所选文章，以下面几点为准：一、顾炎武所重视的问题，有不朽的学术价值。二、能体现顾炎武的学术宗旨、学术思想、研究精神、研究方法。三、在当今依然有现实意义，可供借鉴。四、兼顾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能力，对那些内容已和现实脱离及过于生僻、难解、繁琐的文字，均不加考虑。所选考证类的文字，或是对今人学术研究和阅读古籍有帮助，或是当今依然被关注的问题。五、《日知录》为札记，各篇长短不一，差别甚大，最长的《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有五千多字，最短的《召杀》仅九个字。所选文章，以论述比较完整的为主。

对自己著作中的引文，古人胜过今人的是往往娴熟于心，但查阅、核对原文不如今人容易。以此，其引文常凭记忆，与原文时有出入，也有疏误，不似今人那么严谨。或许是为了节省篇幅，或许是为了表达顺畅，删改原文（或数字，或数句），重新组织、隐括原文，甚至将自己的文字掺入原文，都很平常。《日知录》本以抄书为著书，不少文章自始至终都是引文，这些情况也很明显。本书在标点时，尽可能核对原文，区分原文。

《日知录》原是读书札记，对涉及的每个命题、每个史实，乃至每个地名、每个词语，都探本溯源，理清沿革，多方比较，剖析入微。故书中征引（或明引，或暗引）大量经文、史实、典章、掌故，以及前人的著述，乃至坊间的传闻，从中寄托和申述自己的看法。看似信手拈来，

其实都含有深意。“不待论断而于序事之中即见其指”（《日知录·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用于《日知录》的撰写特色，尤为贴切。要正确理解顾炎武的看法，必须弄清他所引内容的真实含意。但原书即使明引的文章，也不注明卷数，那些暗引的文字，更无出处。所引文字常有删改，与原文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注明这些引文的出处、背景和语义就显得格外重要。书中所用典故，也有明典，有暗典。为帮助读者理解，无论明引、暗引，明典、暗典，本书尽可能都注明出处。

国家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

## 日知录

### 朱子周易本义<sup>[1]</sup>

《周易》自伏羲画卦<sup>[2]</sup>，文王作彖辞<sup>[3]</sup>，周公作爻辞<sup>[4]</sup>，谓之经。经分上、下二篇。孔子作《十翼》<sup>[5]</sup>，谓之传<sup>[6]</sup>。传分十篇：《彖传》上、下二篇<sup>[7]</sup>，《象传》上、下二篇<sup>[8]</sup>，《系辞传》上、下二篇<sup>[9]</sup>，《文言》《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各一篇<sup>[10]</sup>。《汉书·艺文志》：“《易经》十二篇。”师古曰<sup>[11]</sup>：“上、下经及《十翼》，故十二篇。”孔氏《正义》曰<sup>[12]</sup>：“《十翼》者，《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

《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陆德明《释文》曰<sup>[13]</sup>：“太史公论六家要旨<sup>[14]</sup>，引‘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谓之《易大传》。班固谓孔子‘晚而好《易》<sup>[15]</sup>，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传即《十翼》也。前汉六经与传皆别行<sup>[16]</sup>，至后汉诸儒始合经传为一。”

肯定《易传》  
为孔子所作。

自汉以来，为费直<sup>[17]</sup>、郑玄<sup>[18]</sup>、王弼<sup>[19]</sup>所乱，取孔子之言逐条附于卦爻之下。程正叔《传》因之<sup>[20]</sup>。及朱元晦《本义》，始依古文，故于《周易》上经条下云：“中间颇为诸儒所乱，近世晁氏始正其失<sup>[21]</sup>，而未能尽合古文。吕氏又更定著为经二卷、传十卷<sup>[22]</sup>，乃复孔氏之旧云。”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sup>[23]</sup>，而《易》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为书。永乐中修《大全》<sup>[24]</sup>，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传》之后。《易经大全·凡例》曰：“程《传》、《本义》既已并行，而诸家定本又各不同，故今定从程《传》元本<sup>[25]</sup>，而《本义》仍以类从。”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复淆乱。“彖即文王所系之辞，传者孔子所以释经之辞也，后凡言‘传’放此<sup>[26]</sup>”。此乃《彖上传》条下义。今乃削“彖上传”三字，而附于“大哉乾元”之下。“象者，卦之上下两

象，及两象之六爻<sup>[27]</sup>，周公所系之辞也”。乃《象上传》条下义。今乃削“象上传”三字，而附于“天行健”之下。“此篇申《彖传》《象传》之意以尽《乾》《坤》二卦之蕴，而余卦之说因可以例推云<sup>[28]</sup>”。乃《文言》条下义。今乃削“文言”二字，而附于“元者善之长也”之下<sup>[29]</sup>。其“彖曰”“象曰”“文言曰”字皆朱子本所无，复依程《传》添入。后来士子厌程《传》之多，弃去不读，专用《本义》。弘治三年会试<sup>[30]</sup>，“物不可以苟合而已<sup>[31]</sup>，故受之以贲”题，陈辅文<sup>[32]</sup>，同考官杨守陞批曰<sup>[33]</sup>：“《序卦》，朱子无一言以释其义，盖以程子于诸卦之首，疏析其义已明且尽故也。今治经者专读《本义》，《易》卷逾八百，而知有《传》者不数人<sup>[34]</sup>。此能知之而又善作，是用录之，以激励经生之不读程《传》者。”而《大全》之本乃朝廷所颁，不敢辄改，遂即监版《传》《义》之本<sup>[35]</sup>，刊去程《传》，而以程之次序为朱之次序。虚斋蔡清《易经蒙引》谓之“今所窃刊行《易经本义》”<sup>[36]</sup>。今《四书》版本，每张十八行，每行十七字，而注皆小字。《书》《诗》《礼记》并同<sup>[37]</sup>。惟《易》每张二十二行，每行二十三字，而《本义》皆作大字，与各经不同，明为后来所刻。是依监版《传》《义》本而刊去程《传》，凡《本义》

梳理自孔子至明代《周易》流传的不同文本形式，以排除《周易》研究中的各种歧说，清理流行文本中的淆乱现象，恢复《易》的本来面目。

中言“程《传》备矣”者，又添一“《传》曰”而引其文，皆今代人所为也。坊刻擅改古书，宜有严禁，是学臣之责。朱子《诗集传序》、蔡仲默《书集传序》<sup>[38]</sup>，今南京刊《大全》本，改曰《诗经大全序》、《书经大全序》，此即乱刻古书之一验。幸监本尚存，其谬亦易见尔。相传且二百年矣。惜乎朱子定正之书竟不得见于世，岂非此经之不幸也夫！

擅改古书，乱刻古书，会直接引起经籍的歧义，以致曲解经义，误导学子。

朱子《记嵩山晁氏卦爻象象说》，谓“古经始变于费氏<sup>[39]</sup>，而卒大乱于王弼”。此据孔氏《正义》，曰：“夫子所作象辞，元在六爻经辞之后，以自卑退，不敢干乱先圣正经之辞。王辅嗣之意，以为象者本释经文，宜相附近，其义易了，故分爻之象辞，各附其当爻下，如杜元凯注《左传》<sup>[40]</sup>，分经之年与《传》相附。”故谓连合经、传始于辅嗣，不知其实本于康成也。《魏书》：“高贵乡公幸太学<sup>[41]</sup>，问博士淳于俊曰：‘孔子作象、象，郑玄作注，其释经义一也。今象、象不与经文相连，而注连之，何也？’俊对曰：‘郑玄合象、象于经者，欲使学者寻省易了也。’帝曰：‘若合之于学诚便，则孔子曷为不合以了学者乎？’俊对曰：‘孔子恐其与文王相乱，是以不合。此圣

人以不合为谦。’帝曰：‘若圣人以不合为谦，则郑玄何独不谦邪？’俊对曰：‘古义宏深，圣问奥远，非臣所能详尽。’”是则康成之书已先合之，不自辅嗣始矣。乃《汉书·儒林传》云：“费直治《易》，无章句<sup>[42]</sup>，徒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则以传附经，又不自康成始。朱子《记晁氏说》，谓“初乱古制时，犹若今之《乾卦》”。盖自《坤》以下皆依此，后人又散之各爻之下，而独存《乾》一卦以见旧本相传之样式耳。愚尝以其说推之，今《乾卦》“彖曰”为一条，“象曰”为一条，疑此费直所附之元本也。《坤卦》以小象散于各爻之下，其为“象曰”者八，余卦则为“象曰”者七，此郑玄所连，高贵乡公所见之本也。

追溯古《易》  
文本改变的源头。

程《传》虽用辅嗣本，亦言其非古《易》。《咸》<sup>[43]</sup>：“九三<sup>[44]</sup>，咸其股，亦不处也。”《传》曰：“云‘亦’者，盖象辞，本不与《易》相比，自作一处，故诸爻之象辞意有相续者。此言‘亦’者，承上爻辞也。”《小畜》九二<sup>[45]</sup>：“牵复在中，亦不自失也。”《本义》曰：“亦者，承上爻义。”

全文点睛之笔。科举对经籍造成两方面的伤害，一是因篡改而造成的对文本的伤害，二是因学风的不正而造成的对读经的伤害。《日知录》中有整整两卷谈科举，对科举制度的弊端，作了全面的批判。

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sup>[46]</sup>，不能通知大义者也。而《易》《春秋》尤为缪盭<sup>[47]</sup>。以《彖传》合大象，以大象合爻，以爻合小象，二必臣，五必君<sup>[48]</sup>，阴卦必云小人，阳卦必云君子，于是此一经者为拾渾之书<sup>[49]</sup>，而《易》亡矣。取胡氏《传》一句、两句为旨<sup>[50]</sup>，而以经事之相类者合以为题，传为主，经为客，有以彼经证此经之题，有用彼经而隐此经之题，于是此一经者为射覆之书<sup>[51]</sup>，而《春秋》亡矣。天顺三年九月甲辰<sup>[52]</sup>，浙江温州府永嘉县儒学教谕雍懋言：“比者浙江乡试<sup>[53]</sup>，《春秋》摘一十六段配作一题，头绪太多。及所镂程文<sup>[54]</sup>，乃太简略而不统贯。且《春秋》为经，属词比事<sup>[55]</sup>，变例无穷。考官出题，往往弃经任传，甚至参以己意，名虽经题，实则射覆。乞敕禁止。”上从之。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当各自为本。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以存《春秋》<sup>[56]</sup>，必有待于后之兴文教者。

### [ 注释 ]

[1] 朱子周易本义：朱子，朱熹，字元晦，号晦庵，祖籍徽州府婺源（今属江西）。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周易本义》，朱

熹注释《周易》的著作。《周易》，即《易经》，居儒家“六经”之首。 [2]《周易》自伏羲画卦：伏羲，又称宓牺、包牺氏等。华夏民族的先祖，上古三皇之一。《周易·系辞下》：“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卦，《易经》中一套象征自然现象和人事变化的符号，供占卜用。 [3]文王作彖（tuàn）辞：文王，周文王，姬姓，名昌，岐周（今陕西岐山）人。周朝奠基者。“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史记·太史公自序》）相传商纣王听信谗言，将西伯姬昌拘禁在羑里（今河南汤阴县北有羑里城遗址），其间他通过整理研究，将上古“三易”规范化、条理化，演绎成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彖，“彑”指“猪头”。猪头有长吻部，其中上吻部半包住下吻部。“彑”与“豕”联合起来表示“半包边的猪嘴”。彖的本义为总括。彖辞即总括之辞，是《易经》中论卦义的文字，即“卦辞”，或为概括一卦涵义之辞，或为注解一卦之辞。其余六爻的筮辞即爻辞。 [4]周公作爻（yáo）辞：周公，姬姓，名旦，周文王第四子。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古代礼乐和各种典章制度的制定者。司马迁、郑玄认为卦辞、爻辞都为文王所作；郑众、贾逵、马融等人认为卦辞为文王所作，爻辞为周公所作。爻，本义是绳结，在一根绳索上分段打结，表示一定含义。引申为“交”“效”，“效”即通过相交所产生的效用。爻是组成卦符的基本符号，表示阴阳交织的整体作用。爻辞，《易经》中六十四卦每卦爻题下所系文辞。《易经》八卦的两个符号，一个是“—”，另一个是“--”。在《易经》中并没有“阴阳”二字，至《易传》才将“—”称阳爻，将“--”称阴爻。 [5]孔子作《十翼》：《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十翼》是对《周易》作注释的

著作，故又称《易传》。因有十篇，古称“十翼”。“翼”为翅膀，有辅佐之义，在此意为帮助《易经》流传。 [6] 传：一种文体格式，属于古籍注释体例。 [7] 《彖传》：《系辞传下》：“彖者，材也。”材，通“裁”。除“总括”外，彖尚有“裁断”之义。《彖传》是《易传》中解释彖辞（如《周易·乾卦》中的“元亨利贞”）的部分，裁决论断一卦的基本思想（如《周易·乾卦》中的“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包括《十三经注疏》中的《周易正义》在内，今通行《周易》本，将《彖传》《象传》《文言》拆散，分列于相关的各卦之中。 [8] 《象传》：《系辞传下》：“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形象。《象传》是《易传》中解释象辞（与爻辞相应，如《周易·乾卦》中的“潜龙勿用”）的部分，论述一卦的卦象、卦理、卦义（有大、小象之分，参见注[27]）。 [9] 《系辞传》：总论《易经》大义，其中引了不少孔子的话，是《易传》中思想价值最高的作品。“系”即系属。孔颖达疏：“系属其辞于爻卦之下。” [10] 《文言》：专门对乾、坤两卦进行解释的作品。《周易正义》孔颖达疏引庄氏云：“文谓文饰，以乾坤德大，故特文饰以为文言。”《说卦传》：《周易》本为卜筮之书，《说卦传》解说乾、坤、艮、兑、坎、离、震、巽八卦所象征的各类事物，以及阐述六十四卦卦序排列原理和各卦的属性意义，以辅助占断吉凶，故以为名。《序卦传》：说明《易经》六十四卦排列的次序，以此建立其因果关系链。《杂卦传》：晋韩康伯注：“杂卦者，杂糅众卦，错综其义，或以同相类，或以异相明也。”即以相反相成观点把“六十四卦”分为三十二对，两两一组，一正一反，用一两个字解释其卦义和各卦之间的错综关系。 [11] 师古：颜师古，名籀（zhòu），字师古，以字行。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初唐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汉书注》等。 [12] 孔氏《正义》：孔颖达，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

河北)人。唐初十八学士之一,经学家,曾奉唐太宗命编纂《五经正义》。 [13]陆德明《释文》:本名陆元朗,字德明,以字行。初唐经学家、训诂学家,著有《经典释文》等。 [14]“太史公论六家要旨”以下三句:太史公,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官职,为官方史料的专职记录者。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均曾任太史公。此指司马谈。论六家(先秦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道家、阴阳家)之要旨,载《史记·太史公自序》。《周易·系辞下》:“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言天下万事万物,殊途同归,百虑一致(虽有多种考虑,最后归于一致),因此何须多加思考忧虑? [15]“班固谓孔子‘晚而好《易》’”以下三句:语出《汉书·儒林传》。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东汉史学家、文学家。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汉书》。韦,皮制品。春秋时期的书,主要写在竹简上,一部书要用许多竹简,最后用绳按次序编连起来,以便于阅读。用熟牛皮绳编连的叫“韦编”。韦编三绝,言孔子勤读《易经》,致使编连竹简的皮绳多次脱断。 [16]前汉:西汉。六经:儒家经籍《易》《书》《诗》《乐》《礼》《春秋》的合称。别行:分别流行。 [17]费直:字长翁,东莱(郡治在今山东莱州)人,西汉古文易学“费氏学”的开创者。 [18]郑玄:字康成,北海郡高密县(今属山东)人。东汉末年轻学家,遍注儒家经籍,世称“郑学”。 [19]王弼: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魏晋玄学的代表人物。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等。 [20]程正叔《传》:程颐,字正叔,河南府洛阳(今属河南)人,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共创“洛学”,奠定理学基础。著有《周易程氏传》《遗书》等。 [21]晁氏:晁说之,字以道,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人。北宋末年文学家。 [22]吕氏:吕祖谦,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南宋理学家,开

“浙东学派”先声。曾编定《周易》古本，成《东莱吕氏古易》。自云：“谨因晁氏（晁说之）书，参考传记，复定为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为断，其说具于《音训》。”（《书所定古周易十二篇后》）[23]洪武初颁五经天下儒学：洪武，明太祖朱元璋年号。儒学，元、明、清在各府、州、县设立的供生员修业的学校。洪武二年（1369），下诏令天下府、州、县建立儒学。次年，定科举制度。颁布五经，应在此时。[24]永乐中修《大全》：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永乐十二年（1414）十一月，明成祖发起修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于次年九月完成。[25]元本：原本。元，原来。[26]放：通“仿”。[27]两象：《周易》各卦附有《象传》，有总有分，“总”是解读整个一卦，为大象（如《周易·乾卦》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分”是解释每一卦的每一爻，为小象（如《周易·乾卦》中的“‘潜龙勿用’，阳在下也”）。六爻：既可以指从下向上排列的六个阴阳符号的组合，也泛指借用这种组合进行占卜的方法，往往和八卦预测等同。[28]例推：按先例推断。[29]元者善之长也：语出《文言》。[30]弘治：明孝宗朱祐樞年号。会试：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所谓会试者，即共会一处，比试科艺。由礼部主持，在京师举行考试。应考者为各省举人，录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31]“物不可以苟合而已”二句：语出《周易·序卦》。贲（bì），本意为装饰，文饰。用作《易》卦名。言人与人相交之际必有文饰，不能马虎凑合。[32]陈辅文：陈辅所作的文章。[33]同考官：明、清乡试、会试中协同主考或总裁阅卷之官。[34]不数人：没几个人。[35]监版：各朝国子监所刻印书籍统称“监本”，被看作是官刻本的代表。[36]虚斋蔡清：字介夫，别号虚斋，晋江（今属福建）人。明代理学家。[37]诗：原作“经”，据黄汝成《日知录集释》改。[38]蔡

仲默《书集传序》：蔡沈，字仲默，学者称九峰先生，建宁府建阳县（今属福建）人。南宋理学家，朱熹弟子。受朱熹委托，作《书集传》。 [39] “古经始变于费氏”二句：语出晁说之《嵩山文集》卷十八《题古周易后》。 [40] 杜元凯注《左传》：杜预，字元凯，京兆郡杜陵县（今陕西西安东南）人。魏晋时期将领和学者，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及《春秋释例》等。 [41] “高贵乡公幸太学”以下二十五句：语出《三国志·魏书四·三少帝纪》。高贵乡公，曹髦，字彦士，魏文帝曹丕之孙，曹魏第四位皇帝。早慧，好儒学。圣问，圣上（高贵乡公）的追问。 [42] 章句：剖章析句，分析古文的章节和句读。经学家解说经义的一种方式。 [43] 《咸》：《周易》篇名。 [44] 九三：《易经》六十四卦，每卦都有六爻，“九”表示阳爻，“六”表示阴爻。初、二、三、四、五、上等表示所占的时空位置。按自下而上的顺序，凡阳爻，爻题分别为“初九”“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凡阴爻，爻题分别为“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六”。 [45] 《小畜》：《周易》篇名。 [46] 帖括：唐制，明经科以帖经试士。把经文贴去若干字，令应试者对答。后考生因帖经难记，乃总括经文编成歌诀，便于记诵应对，称“帖括”。后用以比喻迂腐不切时用之言。 [47] 而《易》《春秋》尤为缪盭：《春秋》，儒家“六经”之一，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传世《春秋》由孔子修订而成。盭（lì），同“戾”。 [48] 二必臣，五必君：乾卦主爻为“九五”，坤卦主爻为“六二”，《周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言九五，阳气盛至于天，故云‘飞龙在天’。此自然之象，犹若圣人有龙德，飞腾而居天位。”所言为君德。《周易·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孔颖达疏：“二得其位，极地之质，故亦同地也。俱包三德：生物不邪，谓之直也；地体安

静，是其方也；无物不载，是其大也。”所言为臣德。 [49] 拾渫 (sh n)：拾取汁水。比喻事情不可能办到。渫，汁。 [50] 胡氏《传》：胡安国《春秋胡氏传》。胡安国，字康侯，号青山，学者称武夷先生，建宁崇安（今福建武夷山）人。北宋学者。所著《春秋传》成为后世科举士人必读之书。 [51] 射覆：古时的一种猜物游戏。《汉书·东方朔传》：“上尝使诸数家射覆，置守宫孟下，射之，皆不能中。”颜师古注：“于覆器之下而置诸物，令暗射之，故云射覆。” [52] 天顺：明英宗朱祁镇年号。 [53] 比者：近时。乡试：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由各地州、府主持考试本地人，一般在八月举行，故又称“秋闱”。明、清两代定为每三年一次，在各省省城（包括京城）举行。中式称为“举人”，第一名称“解元”。 [54] 程文：科举考试时，由官方撰定或录用考中者所作，用作范例的文章。 [55] 属词比事：连缀文辞，排比史事。后也用以泛指撰文记事。 [56] 备三《传》、啖、赵诸家之说：三《传》，注释《春秋》的三部代表性著作。相传春秋末年鲁人左丘明所作的《春秋左氏传》、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所作的《春秋公羊传》、战国时鲁人穀梁赤所作的《春秋穀梁传》。啖，啖助，字叔佐，赵州（州治在今河北赵县）人。唐代经学家，以治《春秋》知名于世。著有《春秋集传》《春秋统例》。赵，赵匡，字伯循，河东（郡治在今山西永济蒲州镇）人。唐代经学家，啖助弟子。著有《春秋阐微纂类义统》。

### [ 点评 ]

明道、征圣、宗经，三位一体，起于荀子，扬雄、刘勰等人接受并加以光大。顾炎武也是这种思想的继承者，他相信儒家经籍乃“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

(《文心雕龙·宗经》), 经学是一切学问的本原, 治学必先读经, 于此用力尤勤。《易》居五经之首。顾炎武对《易》评价之高, 可谓无以复加: “故尽天下之书皆可以注《易》, 而尽天下注《易》之书不能以尽《易》。”“《诗》、《书》、执礼之文, 无一而非《易》也。下而至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 秦、汉以下史书百代存亡之迹, 有一不该于《易》者乎?”(《亭林文集·与友人论易书》)《日知录》前七卷都属“经义”, 而首卷即论《易》。

但愿意静下心来读经的人, 在明代已日益稀少。顾炎武曾说“舟石(谭吉璫, 字舟石, 嘉兴人)勤于读经, 叩其书斋, 插架《十三经注疏》, 手施朱墨, 始终无一误句。我行天下, 仅见此人”(沈岱瞻《亭林同志赠言》引《鹤征录》), 对此不胜慨叹。他认为学术发展有其本身的历史进程, “经学自有源流, 自汉而六朝, 而唐、而宋, 必一一考究, 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 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亭林文集·与人书四》)。本文首先确定《易》的作者和篇目, 梳理自孔子至明代《周易》流传的不同文本形式, 以纠正因“旧本之日微”而造成“新说之愈凿”(《亭林文集·答李子德书》)的不良风气。文中揭示这种不良风气所造成的危害, 对当时人“擅改古书”“乱刻古书”的行为尤为不满。顾炎武曾引《东坡志林》语: “近世人轻以意改书, 鄙浅之人好恶多同, 故从而和之者众, 遂使古书日就讹舛, 深可忿疾。”(《日知录·改书》)指出: “万历间人多好改窜古书, 人心之邪, 风气之变, 自此而始……此皆不考古而肆臆之说, 岂非‘小人而无忌惮’者哉!”(同上)为了遵从原典, 保证

所读经籍的正确性，他提出“读九经自考文始”的主张，开清代考据学的先声。

文中进一步分析造成读经式微的原因，将矛头直指当时的科举制。为了能在科举考试中捷足先登，博取功名利禄，士子不是为求知读经，而是将读经作为应付考试的手段，根据时文的需要，拼凑经句，牵扯成文。由此，“今之为科举之学者，大率皆帖括熟烂之言，不能通知大义者也。”“经学日衰，人材日下，非职此之由乎？”（《日知录·九经》）有感于此，顾炎武在文中大声疾呼：“秦以焚书而五经亡，本朝以取士而五经亡。”从而提出复兴《易》学、《春秋》学的主张。

明末与心学末流成鲜明对照的，是实学的兴起。实学以致用为鹄（如宋应星），而其精神则是对真相的求索（如徐霞客）、对真理的追求（如徐光启）。保持经籍原文，不乱改书，也是求真重实的表现。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清代学术主流转向考据学。考据即考证，通过考核资料，证实文献的真伪，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而考证的对象，主要是经籍和相关的文献。清代考据学又称朴学，所谓“朴”，即朴实，即本真。“真实”二字，是考据学的生命。故看似回避现实的考据学，与重在经世致用的实学，并不截然对立，反倒有着某种精神上的联系。兼有实学精神和考证成就的顾炎武，被誉为清学开山之祖，可谓实至名归。

## 良其限<sup>[1]</sup>

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sup>[2]</sup>，及其施之于事，有扞格而不通<sup>[3]</sup>，则忿懣生而五情瞽乱<sup>[4]</sup>，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sup>[5]</sup>，相去盖无几也。孔子恶果敢而窒者<sup>[6]</sup>，非独处事也，为学亦然。告子不动心之学<sup>[7]</sup>，至于“不得于言，勿求于心”，而孟子以为其弊必将如蹶趋者之反动其心。此“良其限，列其夤”之说也。君子之学不然，“廓然而大公<sup>[8]</sup>，物来而顺应”，故“闻一善言<sup>[9]</sup>，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无“熏心”之“厉”矣。

慈溪黄氏震《日钞》曰<sup>[10]</sup>：“心者，吾身之

主宰，所以治事而非治于事，惟随事谨省，则心自存，不待治之而后齐一也。孔子之教人曰：‘居处恭<sup>[11]</sup>，执事敬，与人忠。’曾子曰<sup>[12]</sup>：‘吾日三省吾身<sup>[13]</sup>，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不待言心而自贯通于动静之间者也。孟子不幸当人欲横流之时，始单出而为‘求放心’之说<sup>[14]</sup>。然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sup>[15]</sup>，以礼存心。’则心有所主，非虚空以治之也<sup>[16]</sup>。至于斋心服形之老、庄<sup>[17]</sup>，一变而为坐脱立忘之禅学<sup>[18]</sup>，乃始瞑目静坐，日夜仇视其心而禁治之。及治之愈急而心愈乱，则曰：‘易伏猛兽<sup>[19]</sup>，难降寸心。’呜呼！人之有心，犹家之有主也，反禁切之，使不得有为，其不能无扰者，势也，而患心之难降欤！”《省斋记》。又曰：“夫心之说有二：古人之所谓存心者，存此心于当用之地也；后世之所谓存心者，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也。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世乃有游手浮食之徒，株坐摄念<sup>[20]</sup>，亦曰存心。而士大夫溺于其言，亦将遗落世事，以独求其所谓心。

迨其心迹冰炭<sup>[21]</sup>，物我参商<sup>[22]</sup>，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sup>[23]</sup>，一人之身，已兼备之，而欲尤人之不我应<sup>[24]</sup>，得乎？”《山阴县主簿厅记》。此皆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详又见第二十三卷“心学”条下<sup>[25]</sup>。乃周公已先系之于《易》矣。

〔注释〕

[1] 艮（gèn）其限：《周易·艮卦》：“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熏心。”艮，本义为边界、极限。列，“裂”的古字。夤，通“瑛”，夹脊肉。这里指上身下身的界限，即腰。厉，危险。熏，通“熏”，烧灼。王弼《周易注》：“艮之为义，各止于其所。上下不相与，至中则列矣。列加其夤，危莫甚焉，危亡之忧，乃熏灼其心也。”言九三爻处上下卦之中，就像停留在人的腰部，上下体不能通达。既不甘留在这里，又不能运动，处境危险，心急如焚。 [2] 执一：固执一端，不知变通。 [3] 扞格：互相抵触，格格不入。 [4] 忿懣（zhì）：发怒。五情：喜、怒、哀、乐、怨，泛指人的情感。眊（mào）乱：精神错乱。 [5] 滑性而焚和：滑性，刘昼《刘子·防欲》：“故明者刳情以遣累，约欲以守贞，食足以充虚接气，衣足以盖形御寒；靡丽之华，不以滑性；哀乐之感，不以乱神。”滑，滑动，移动。滑性即转移、改变本性。焚和，《庄子·外物》：“心若县（悬）于天地之间，慰瞽（烦闷）沈屯（沉闷），利害相摩，生火甚多，众人（普通人）焚和，月固不胜火，于是乎有僨然（颓然，败坏）而道尽。”郭象注：“众人而遗利则和，若利害存怀，则其和焚也。”成玄英疏：“驰心利害，内热如火，故烧焰中和之性。”焚和即毁灭中和之性。 [6] 孔子恶果敢而窒者：《论语·阳

老子“道德”说的流弊，产生了申、韩的法家学说。而老庄的清静无为、禅宗的自足其性，其流弊也直接影响了晚明的虚浮习气。在此，顾炎武借黄震对道家、禅宗的看法，道出对当时学者的批评。

货》：“子曰：‘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汕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言憎恶武断却又固执的人。 [7]“告子不动心之学”以下四句：《孟子·公孙丑上》：公孙丑问：“敢问夫子之不动心，与告子之不动心，可得闻与？”孟子答：“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可。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志壹则动气，气壹则动志也。今夫蹶者趋者，是气也，而反动其心。”告子说“言论上有所不通，心中不必去寻求道理；心中有所不安，不必求助于意气”。孟子说“心志专一就能调动意气，意气专一也能触动心志。譬如跌倒和奔跑，这是意气专注的结果，反过来也使他的心志受到触动。”告子，《孟子》中的人物，战国时思想家。他和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有过几次辩论。据《墨子》载，告子曾受教于墨子。又据赵岐《孟子注疏》，告子为孟子学生。 [8]“廓然而大公”二句：语出程颐《答横渠先生定性书》。廓然，形容远大。 [9]“闻一善言”以下四句：语出《孟子·尽心上》。沛然，形容水流大。御，抵御，抵挡。 [10]慈溪黄氏震《日钞》：黄震，字东发，号文洁，慈溪（今属浙江）人。南宋学者。学宗朱熹。主要著作有读书笔记《东发日钞》（又作《黄氏日钞》）。 [11]“居处恭”以下三句：语出《论语·子路》。谓“日常生活恭敬有礼，处理事情严肃认真，与人交往真心诚意”。 [12]曾子：姒姓，曾氏，名参（shān），字子舆，鲁国南武城（今山东平邑）人。春秋末年思想家，孔子著名弟子。相传“四书”中的《大学》即其所作。 [13]“吾日三省吾身”以下四句：语出《论语·学而》。言：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否尽心？同朋友交往是否诚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去实践？三，再三，多次。 [14]求放心：《孟子·告子上》：“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

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认为“本心”即“良心”，是“人皆有之”的天赋德性。求放心，即找回丧失的“本心”，恢复善性。 [15]“君子以仁存心”二句：《孟子·离娄下》：“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存心，保存在心中。 [16]“则心有所主”二句：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引钱大昕语：“不求学问而求放心，此释氏之学也。” [17]斋心服形之老、庄：《列子·黄帝》：“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斋心，祛除杂念，使心神凝寂。服形，服气，即“食气”“行气”。言在呼吸吐纳中吸纳天地精气，可以此行气炼养身体。老、庄，老子、庄子，道家学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18]坐脱立忘之禅学：《禅苑清规》：“超凡越圣，坐脱立亡，一任此力矣！”坐脱，又称坐化、坐亡，指端坐念佛而迁化。立亡，谓直立合掌念佛而涅槃。 [19]“易伏猛兽”二句：《菜根谭》：“语云：‘猛兽易伏，人心难降。溪壑易填，人心难满。’信哉！” [20]株坐：独坐。摄念：凝聚意念，收敛心神。 [21]心迹冰炭：言思想与行为对立矛盾。心迹，思想与行为。冰炭，冰和火炭。比喻互不相容的事物。 [22]物我：外物与自我。参商：参星与商星，二者在星空中此出彼没。古人以此比喻彼此对立，不和睦。 [23]所谓老子之弊流为申、韩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太史公曰：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宣扬）道德，放（纵意）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勤奋自勉），施之于名实（概念和事实）。韩子引绳墨（指规范，法制），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惨酷苛刻）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老子，《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者，楚苦县（在今河南鹿邑）厉乡曲仁里人

也。姓李氏，名耳，字聃。”道家学派创始人。传世作品有《道德经》（又称《老子》）。申，申不害，也称申子，郑国京邑（在今河南荥阳东南）人。战国法家创始人之一，专攻“黄老之术”。韩昭侯时为丞相。韩，韩非，又称韩非子，战国末期韩国新郑（今属河南）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司马迁认为法家的学说，源于老子的道德思想，得到后人的赞同。[24]尤人：责怪别人。尤，怨恨，归咎。[25]详又见第二十三卷“心学”条下：潘耒《日知录》刻本，《心学》在第十八卷。

### [ 点评 ]

本文以《易》“艮其限”为题，但重心则是所引黄震《日钞》中的两段文字。前者是对执一不化、扞格不通的告诫，后者批评虚空治心、株坐摄念，二者所言，看似并不一致。但就不能直面现实、不能有所作为而言，则有类似之处。本文借“艮其限”的爻义，引出后面对当时社会不良习气的批评。在写作手法上，和《诗经》中的“比兴”相仿。

上篇谈读经，本文谈存心，虽发端不同，但目的一致，都是为了廓清当时社会弥漫的虚浮不实、无所作为的习气。佛家“直指本心”，道家炼气收心。只是如黄震所言，因“摄此心于空寂之境”，以致心无所主，“遗落世事”，“不得有为”，成为“游手浮食之徒”。这和儒家由“正心诚意”上升入“治国平天下”的修身之道，截然不同。文中所说的“求放心”，就是将心从空寂之境，挽回现实之中，“存此心于当用之地”；让人从瞑目静坐，回归求仁执礼之途。“造化流行，无一息不运，人得之以

为心，亦不容一息不运，心岂空寂无用之物哉！”这正是有志之士“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论语·泰伯》）的情怀。

“通乎昼夜之道而知，则终日乾乾，与时偕行，而有以尽乎《易》之用矣。”（《日知录·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要有所作为，除“终日乾乾”、自强不息外，还得“与时偕行”。“易”的本义是变易，是变化。自然和社会的变化，就像昼夜交替，无法回避。只有适应社会的变化，追随时代发展的脚步，才称得上掌握《易》的精髓，用于现实生活之中。这正是开篇提出“物来而顺应”，反对“执一而不化”，挽救“学者之患”的深意，故结语谓黄震之言，“足以发明‘厉熏心’之义”。

## 凡易之情<sup>[1]</sup>

“爱恶相攻”，“远近相取”，“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将叛者其辞惭<sup>[2]</sup>，中心疑者其辞枝，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诬善之人其辞游，失其守者其辞屈。”“听其言也<sup>[3]</sup>，观其眸子，人焉廋哉？”是以圣人设卦，以尽情伪。“夫诚于中<sup>[4]</sup>，必形于外”，君子之所以知人也。“百物而为之备<sup>[5]</sup>，使民知神奸”，先王之所以铸鼎也。故曰：“作《易》者<sup>[6]</sup>，其有忧患乎？”周身之防<sup>[7]</sup>，御物之智<sup>[8]</sup>，其全于是矣<sup>[9]</sup>。

作《易》者有忧患，《易》之情含吉凶、利害、悔吝之诚，读《易》者可从中悟周身之防，得御物之智。

### [ 注释 ]

[1] 凡易之情：《周易·系辞下》：“是故爱恶相攻而吉凶生，

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则凶，或害之，悔且吝。”孔颖达疏：“若泯然无心，事无得失，何吉凶之有？由有所贪爱，有所憎恶，两相攻击。事有得失，故吉凶生也。”“远谓两卦上下相应之类，近谓比爻共聚迭相资取。取之不以理，故悔吝生也。”“情谓实情，伪谓虚伪，虚实相感。若以情实相感则利生，若以虚伪相感则害生也。”“近谓两爻相近而不相得，以各无外应，则致凶咎。”韩康伯注：“《易》之情，刚柔相摩、变动相适者也。近而不相得，必有乖违之患。”[2]“将叛者其辞惭”以下六句：语出《周易·系辞下》。叛，背信弃义。惭，惭愧。因背信弃义，不说实话，怕被人揭露，故有惭愧之意。歧，犹“歧”，不一致。因心中有疑惑，不敢肯定，故说话模棱两可。吉人，善人。善人话少。躁，浮躁。诬善，诬蔑诋毁善人。因造谣中伤，毫无依据，故说话闪烁不定。守，操守。没有操守的人，也就不能自主，只得屈己从人，随声附和。[3]“听其言也”以下三句：《孟子·离娄上》：“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恶。胸中正，则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眼睛无神，看不清楚）焉。听其言也，观其眸子，人焉廋哉？”廋（sū），藏匿，隐藏。[4]“夫诚于中”二句：《礼记·大学》：“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5]“百物而为之备”二句：《左传》宣公三年：“楚子伐陆浑（古代西北少数民族）之戎，遂至于雒（同“洛”，洛阳），观兵（陈列大军，炫耀武力）于周疆（周皇室领地的边界）。（周）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庄王）。楚子问鼎（周室收藏的宝鼎，为皇权象征）之大小轻重焉。（王孙满）对曰：‘（周王朝的存在，）在德不在鼎。昔夏（朝）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绘画各种奇异的事物），贡金九牧（各地长官。此句倒装，即“九牧贡金”），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神圣和奸邪）。’”[6]“作《易》者”

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下》。文王作《易》，正在被拘禁在羑里之时，故说“有忧患”。[7]周身：保全自身。[8]御物：驾御万物。[9]于是：在这里。

### [ 点评 ]

顾炎武认为：“圣人所闻所见，无非《易》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所以告人行事，所谓‘拟之而后言，议之而后动’者也。”（《亭林文集·与人书二》）研究《易》义，明白《易》理，便可用于日常行事，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本文所言，是《易传》中所提示的，如何通过“知言”观察他人，从而进行有效的自我保护。

前人有言为心声之说：“故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扬雄《法言·问神》）但实际情况却往往相左。“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元好问《论诗绝句》）《论语》以“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结束全书。孟子也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无论孔子还是孟子，其所谓知言，都不是能听懂别人所说的话那么简单，而是能够辨别这些话的真伪，识别这些话的善恶。由于人世间有“谀辞（偏执的话）”“淫辞（过激的话）”“邪辞（邪僻的话）”“遁辞（躲闪的话）”（《孟子·公孙丑上》）特别是有许多言不由衷的话、虚伪诈骗的话、颠倒黑白的话、指鹿为马的话，因此知言绝非易事。知言中的“言”字，并非仅指口头的言语，也包括书写的文字，要辨识更加困难。

孟子只说应该知道像“谀辞”这类话语错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周易·系辞》中“将叛者其辞惭”数句，则对如何通过言语识别其人真实的心态，作了具体的提示。

《日知录》中有一篇题为“文辞欺人”的文章，也谈知言，以“真伪”二字为试金石，可参看。

国家图书馆

## 易逆数也<sup>[1]</sup>

“数往者顺”。造化人事之迹，有常而可验，顺以考之于前也。“知来者逆”。变化云为之动，日新而无穷，逆以推之于后也。圣人“神以知来<sup>[2]</sup>，知以藏往”，作为《易》书，“以前民用”<sup>[3]</sup>。所设者未然之占<sup>[4]</sup>，所期者未至之事，是以谓之逆数。虽然，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通而系之爻象乎？是以“天下之言性也<sup>[5]</sup>，则故而已矣”。

刘汝佳<sup>[6]</sup>曰：“天地间一理也，圣人因其理而画为卦以象之，因其象而著为变以占之。象者，体也，象其已然者也。占者，用也，占其

逆数并非臆测，“知来”须建立在“藏往”的基础上。只有对以往的迹象了然于胸，才有可能预测未来的情状。藏往知来和温故知新有相通之处，但内涵更加丰富。

未然者也。已然者为往，往则有顺之之义焉。未然者为来，来则有逆之之义焉。如象天而画为乾<sup>[7]</sup>，象地而画为坤，象雷、风而画为震、巽，象水、火而画为坎、离，象山、泽而画为艮、兑。此皆“观变于阴阳而立卦<sup>[8]</sup>，发挥于刚柔而生爻”者也，不谓之‘数往者顺’乎？如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贞’<sup>[9]</sup>；筮得坤而知‘坤：元亨，利牝马之贞’；筮得震而知‘震：亨。震来虩虩，笑言哑哑’；筮得巽而知‘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见大人’；筮得坎而知‘习坎：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筮得离而知‘离：利贞，亨。畜牝牛吉’；筮得艮而知‘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筮得兑而知‘兑：亨，利贞’。此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也<sup>[10]</sup>，不谓之‘知来者逆’乎？夫其顺数已往，正所以逆推将来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sup>[11]</sup>，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数往者顺’也。‘其或继周者<sup>[12]</sup>，虽百世可知也。’‘知来者逆’也。故曰：‘易，逆数也。’若如邵子之说<sup>[13]</sup>，则是羲、文之《易》已判而为二<sup>[14]</sup>，而又以

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sup>[15]</sup>，巽、坎、艮、坤为推未生之卦，殆不免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矣。”

### [ 注释 ]

[1] 易逆数也：《周易·说卦》：“数往者顺，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数也。”韩康伯注：“作《易》以逆睹来事。”孔颖达疏：“《易》之为用，人欲数知既往之事者，《易》则顺后而知之；人欲数知将来之事者，《易》则逆前而数之。是故圣人用此《易》道，以逆数知来事也。”逆数，倒数，这里意为预测。 [2] “神以知来”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上》。来知德《周易集注》：“凡吉凶之几，兆端已发，将至而未至者，曰来；吉凶之理，见在于此，一定而可知者，曰往。知来者，先知也；藏往者，了然蕴畜于胸中也。” [3] 以前民用：《周易·系辞上》：“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兴，起。前，引导。 [4] 所设者未然之占：未然，尚未成为事实。占，占卜。 [5] “天下之言性也”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下》。原文下面还有一句“故者以利为本”。 [6] 刘汝佳：字无美，号紫芝。明无为州（治所在今安徽无为）人。有政绩。 [7] 象天而画为乾：根据天象画为乾卦。这里“乾”为乾卦，非《易》中的《乾》篇。下面坤、震、巽、坎、离、艮、兑，意与乾相同。 [8] “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二句：语出《周易·说卦》。孔颖达疏：“既观象立卦，又就卦发动挥散于刚柔两画，而生变动之爻。”来知德《易经来注图解》：“观变者，六十四卦皆八卦之变。阳变阴，阴变阳也。”生爻，生成爻辞。 [9] 筮得乾而知“乾：元亨利贞”：筮得乾，卜筮（占卜）得乾卦（非《易》篇名）。“元亨利贞”为乾卦卦辞，下面“元亨，利牝马之贞”等，

分别为坤卦等各卦卦辞。[10]此皆“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者也：《周易·系辞下》：“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谓通晓万物神妙的本性，将万物的真实情况分别归类。[11]“殷困于夏礼”以下四句：语出《论语·为政》，言殷（商）朝、周朝沿袭夏朝、殷（商）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加和废除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12]“其或继周者”二句：语出《论语·为政》，言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13]邵子：邵雍，字尧夫，赐谥康节，生于林县（今属河南）。北宋理学家。[14]羲、文之《易》：伏羲、周文王所撰的《易经》。[15]“而又以震、离、兑、乾为数已生之卦”二句：邵雍说：“天地定位一节，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错者，相交错而成六十四卦也。数往者顺，若顺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数往也。知来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来也。夫易之数由逆而成矣，此一节直解图意，若逆知四时之谓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朱熹说：“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居东南、震居东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所谓先天之学也。起震而历离、兑以至于乾，数已生之卦也。自巽而历坎、艮以至于坤，推未生之卦也。《易》之生卦，则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次，故皆逆数也。”（《周易本义》）

### [ 点评 ]

《易》本卜筮之书，易卦的功用在“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即能“本于八卦已成之迹”，借助“未然之占”，明白“未至之事”，用以指导日常生活。由于《易》广大

悉备，有天道，有地道，有人道，因此其功用也就不限于人事，也包括自然现象，遍及整个宇宙。这就是“易，逆数也”的含义。

这种能逆推天道人事的巨大功能，也是《易》的魅力所在。后世许多学者沉浸在对卦爻、象数的研究之中。宋初道士陈抟作《先天图》，传至邵雍。邵雍受此启发，提出“先天学”，影响甚大。“先天学，心法也，故图皆自中起，万化万事生乎心也”，“先天之学，心也；后天之学，迹也”（《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与此相应的是“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说，前者为伏羲所画八卦，后者为文王演绎的八卦；前者为本为体，后者是前者的演变。邵雍重视作为自然法则的“先天八卦”，轻视已成王者之法的“后天八卦”，抛弃了汉代经学家以象数解释卦辞、爻辞的繁琐的说《易》形式。他认为“神生数，数生象，象生器”（同上），说《易》也从先验的“数”展开，被称为《易》学中的“数学”。

邵雍的《易》学观，独标异帜，新人耳目。对此，朱熹持肯定的评价，而清初一些学者，如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等人，则表示否定。顾炎武认为：《易》虽为卜筮之书，但预测将来，必须建立在已有事实的基础之上，而非随心所欲、无中生有的臆测。“若不本于八卦已成之迹，亦安所观其会通而系之爻象乎？”他还强调《易》的平易性，人人都可掌握：“且夫《易》之为书，广大悉备，一爻之中，具有天下古今之大……然此特识其大者而已，其实人人可用。”（《亭林文集·与友人论

易书》)虽然邵雍本身主要是一个理学家,但“先天学”名义上出自道家,以此说《易》,明显带有神秘主义色彩。这显然和顾炎武的《易》学观相忤。本文即借刘汝佳之口,批评“先天八卦”说。

国家图书馆

## 孔子论易

孔子论《易》，见于《论语》者二章而已，曰：“加我数年<sup>[1]</sup>，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曰：“南人有言曰<sup>[2]</sup>：‘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是则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sup>[3]</sup>”之间，而不在于图书象数也<sup>[4]</sup>。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畔也<sup>[5]</sup>。

学《易》重在“庸言庸行”之间，是在倡导生活中的哲学。

记者于夫子学《易》之言<sup>[6]</sup>，而即继之曰：“子所雅言<sup>[7]</sup>，《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是知夫子平日不言《易》，而其言《诗》《书》、执礼者，皆言《易》也。人苟循乎《诗》《书》、

执礼之常而不越焉，则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矣。故其作《系辞传》，于“悔吝”“无咎”之旨特谆谆焉<sup>[8]</sup>。而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然辞本乎象，故曰：“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sup>[9]</sup>。”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sup>[10]</sup>。”若“天一，地二”“易有太极”二章<sup>[11]</sup>，皆言数之所起，亦赞《易》之所不可遗<sup>[12]</sup>，而未尝专以象数教人为学也。是故出入以度，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周公、孔子之《易》也。希夷之图、康节之书<sup>[13]</sup>，道家之《易》也。自二子之学兴，而空疏之人、迂怪之士举窜迹于其中以为《易》<sup>[14]</sup>，而其《易》为方术之书，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sup>[15]</sup>，去之远矣。

“《诗》三百<sup>[16]</sup>，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sup>[17]</sup>。有恒，然后可以无大过。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这八字，不仅概括了《易》卦爻的精义，也概括了孔子作《易传》的深意。

## [ 注释 ]

[1] “加我数年”以下三句：语出《论语·述而》。 [2] “南人有言曰”以下八句：语出《论语·子路》。“不恒其德”二句，语出《周易·恒卦》。即：不能坚持，三心二意，就会招致羞耻。因此孔子说：这就不必去占卦了。（因为他只能是凶，不会有吉。） [3] 庸言庸行：指平平常常的言行。《周易·乾卦·文言》：“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庸，平常。 [4] 图：卦图。象：卦象、爻象。数：阴阳数、爻数。 [5] 畔：通“叛”。在此言违背了孔子的教诲。 [6] 记者：记录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话的人。 [7] “子所雅言”以下三句：语出《论语·述而》。言孔子用标准语的场所是：读《诗》、读《书》、行礼。雅言，当时各国通用的标准用语。 [8] “悔吝”“无咎”之旨：《周易·系辞上》：“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忧虞，忧患。又：“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补过也。”因行事尚有小问题，故有悔吝。《周易·乾卦·象传》：“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言君子时时自强不息，警惕戒惧，如同涉水过河，不敢怠慢，就能免于过失。 [9] 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语出《周易·系辞上》。谓君子平时审视六爻刚柔进退得失忧虞之象，玩味吉凶悔吝之辞，以明其所以然之理。 [10] 圣人之情见乎辞：语出《周易·系辞下》。 [11] 天一，地二：语出《周易·系辞上》。《周易》筮法，通过数的运算来求卦，有十个数，五奇五偶，奇数一、三、五、七、九代表天，偶数二、四、六、八、十代表地。易有太极：语出《周易·系辞上》。易，变易。太极，天地未分之前，元气混一的状态。意谓太极是易的原始，宇宙的变化从太极开始。 [12] 赞：使幽隐者显，使未见者见。有彰明之义。 [13] 希夷之图：陈抟，字图南，号扶摇子，赐号“希夷先生”，亳州真源（今河南鹿邑）人。北

宋初期道家学者。著有《太极图》和《先天方圆图》等。康节：邵雍，赐谥康节。 [14] 举：全。 [15] 寡过反身：将所学到的东西用在自己身上，以少犯错误。反身，返之于身。 [16] “《诗》三百”以下三句：语出《论语·为政》。 [17] 夫子所以思得见夫“有恒”也：《论语·述而》：“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有恒者，谓有操守的人。

### [ 点评 ]

顾炎武论《易》，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功能，特别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指导作用。他说：“《易》于天道之消息，人事之得失，切实示人，学者玩索其义，处世自有主张。”（《亭林余集·与任钧衡》）“圣人之所以学《易》者，不过‘庸言庸行’之间，而不在于图书象数也……大象所言，凡其体之于身、施之于政者，无非用《易》之事。”《易经》的主体是卦爻，但象数深奥隐晦，常人不能通晓。“‘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观之者浅，玩之者深矣。其所以与民同患者，必于辞焉著之，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这里说的“辞”，固然指卦辞、爻辞，但常人依然不易理解。相比之下，《易传》所言更加具体明白，“与民同患”之意更深，用以指导人事，更有裨益。

虽说孔子晚年喜读《易经》，但现存《论语》，其中谈到《易》的言词，仅有二处。后人所说的孔子论《易》，都是就《易传》而言的。但关于《易传》的作者，即使在古代也有不同的看法。在《朱子周易本义》中，顾炎武肯定《易传》为孔子所作，绝不仅仅是考辨作者，更深的意义是：既经圣人之手，那么《易传》本身也是经

籍，和《易经》具有同样的地位和价值，理应为众人祖述。宗经和征圣相连，征圣主要是征孔，即以孔圣人的看法作为判断是非的依据。“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亭林文集·与人书三》）他作《易传》，当然也是为了济世泽民。后人说《易》，也应以此为宗旨。而陈抟之图、邵雍之书，直至“今之穿凿图象以自为能者”，显然背叛了孔子的宗旨，“于圣人寡过反身之学，去之远矣”。故顾炎武斥之为道家之《易》、方术之书。

伏羲画易虽不可信，但《易经》建立在象数的基础上则不容置疑。孔子学《易》，研究《易》，主要也在《易》的卦象和爻数。故朱熹论《易》，不废象数，黄宗羲也有《易学象数论》。顾炎武认为《易》本平易，后世有些人却故弄虚玄，凿之过深，反失去了《易》的本意，不失为高明之论；他否定象数之学，重视实际应用，有其积极意义，只是言辞偏激，未免矫枉过正。

##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sup>[1]</sup>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愬之于神<sup>[2]</sup>，而诅盟之事起矣。苏公遇暴公之谮<sup>[3]</sup>，则“出此三物，以诅尔斯”；屈原遭子兰之谗<sup>[4]</sup>，则告五帝以折中，命咎繇而听直。至于里巷之人，亦莫不然<sup>[5]</sup>。而鬼神之往来于人间者，亦或著其灵爽<sup>[6]</sup>，于是赏罚之柄<sup>[7]</sup>，乃移之冥漠之中<sup>[8]</sup>，而蚩蚩之氓<sup>[9]</sup>，其畏王钺<sup>[10]</sup>，常不如其畏鬼责矣。乃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sup>[11]</sup>。今日所传地狱之说、感应之书<sup>[12]</sup>，皆苗民诅盟之余习也<sup>[13]</sup>。“明明棗常<sup>[14]</sup>，鰥寡无盖”，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

迷信鬼神，是平民百姓在现实社会中得不到帮助、看不到希望后聊以自慰的选择。

神。故曰：有道之世，“其鬼不神<sup>[15]</sup>”。所谓“绝地天通”者<sup>[16]</sup>，如此而已矣<sup>[17]</sup>。

### [ 注释 ]

[1] 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语出《尚书·周书·吕刑》。信，原作“行”，据《吕刑》改。罔，无，没有。覆，反，背叛。诅(z)，发誓。诅盟，对神明立下的誓约。言没人遵守信用，以致背叛了誓约。 [2] 愬：同“诉”。 [3] “苏公遇暴公之谮”以下三句：《毛诗序》谓暴公为周卿士，诬陷中伤苏公，苏公作《何人斯》诗，和他绝交。“出此三物，以诅尔斯”，语出《诗·小雅·何人斯》。言拿出猪、犬、鸡三物，求神明降祸到你的身上。古时订盟，杀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违背，令神明降祸。 [4] “屈原遭子兰之谗”以下三句：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出生于楚国丹阳秭归（今湖北宜昌）。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因遭贵族排挤诽谤被流放。楚国郢都被秦军攻破后，自沉于汨罗江殉国。战国时期楚国诗人，“楚辞”的创立者和代表作家。《史记·屈原列传》：楚顷襄王登位后，以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与屈原政见不合，命上官大夫在顷襄王前诬陷屈原，屈原因此被放逐。所作《惜颂》诗，为进谏招致祸患而痛惜，前面几句为：“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与向服。俾山川以备御兮，命咎繇使听直。”折中，谓中正公平。咎繇，即皋陶(gō yáo)，历经唐虞夏三代，长期掌管刑法，以正直闻名天下，后世尊为“中国司法始祖”。听直，判断曲直是非。 [5] 不然：不是这样。 [6] 亦或者其灵爽：有时也会显示灵验。 [7] 柄：权柄，指权力。 [8] 冥漠：虚无，也指阴间。 [9] 蚩蚩之氓：即无知的百姓。蚩蚩，无知貌。氓，

百姓。 [10] 钺：铡刀。古代也用作斩人的刑具。 [11] 穷：不足，缺陷。 [12] 感应：谓神明对人事的反响。 [13] 苗民：又称三苗、有苗，古代部落名，主要生活在长江中游以南一带。 [14] “明明棐常”二句：语出《尚书·周书·吕刑》。言贤德之人扶持常道，孤苦之人不受伤害。明明，勉力。棐常，辅助常道。盖，通“害”，伤害。 [15] 其鬼不神：《老子》：“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用“道”治理天下，鬼神就起不了作用。 [16] 绝地天通：《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孔安国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绝地天通，断绝平民与天神沟通的途经。 [17] 如此而已矣：《日知录集释》引清胡承诺语，深中肯綮：“鬼神者，前圣尊而称之，百官以畏，万民以服，皆所以正人心者也，王道大明，作福作灾，于己取之，盖无所事于神矣。道之不明，理不可信，不得不求救于神，以免意外之祸。愚民小夫缘此冀无端之福，武人剧盗顿首像设之前，出庙门而行杀。度九黎乱德之世，大都如此。《书》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盖折民邪妄，惟当示以典礼。典礼胜，邪妄息矣。其不度于礼者，刑必施焉。故狄公毁淫祠，折以刑之谓也。”

### [ 点评 ]

迷信是一种社会现象。在古代中国，迷信的对象，则主要是现实社会不见不闻的鬼神。至于迷信的原因，既有因认知不足、无法控御而产生的对自然的敬畏，也有因社会不公、堕入困境而产生的恐惧和不安。诚然，人类和鬼神阴阳相隔、天地相隔，但也由此使人能和不满的现实划出一道虚拟的间隔，将人生的目标指向不负

自己的未来，寻找精神上的支撑，获得某种心灵的慰藉。透过迷信的表面，是非常实际的功能性的需求。本文便是对此展开的论述。

“国乱无政，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见理，于是不得不禡之于神。”这是迷信鬼神的现实基础，是一种不得已的心理需求。因为人世不公，不可信任，而鬼神间或还会“著其灵爽”，反倒可以身相许，“于是赏罚之柄，乃移之冥漠之中”。顾炎武并不信鬼神之说，但也不否认：“世之君子，犹有所取焉，以辅王政之穷。”值得注意的是：本文标题出自《尚书·吕刑》，这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法典。作者谈迷信的产生，是和法令不行、百姓无所凭依相关的。“明明棗常，鰥寡无盖”，只要统治者扶持常道，不让孤苦之人受到伤害，执法施令，取信于民，“则王政行于上，而人自不复有求于神”。重要的是：“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尚书·吕刑》）国家应颁布法典，让人遵法守法，若有惩罚，也应依据法典行事，这样才能服人。所以说：在太平盛世，“其鬼不神”，迷信之风就不会盛行。

## 文侯之命<sup>[1]</sup>

《竹书纪年》<sup>[2]</sup>：幽王三年<sup>[3]</sup>，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sup>[4]</sup>。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盘古“服”字，与“盘”字相似而误。为太子<sup>[5]</sup>。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郟<sup>[6]</sup>。十年，王师伐申<sup>[7]</sup>。十一年，申人、郟人及犬戎入周<sup>[8]</sup>，弑王及王子伯盘。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sup>[9]</sup>，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sup>[10]</sup>，周二王并立。平王元年<sup>[11]</sup>，王东徙雒邑。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sup>[12]</sup>。二十一年，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sup>[13]</sup>。《左传》昭二十六年：王子朝告诸侯之辞曰<sup>[14]</sup>：“携王奸命，诸侯替之<sup>[15]</sup>，而建王嗣。”杜氏以携王为伯服，盖失之

诛心之论。

不考<sup>[16]</sup>。然则《文侯之命》报其立己之功<sup>[17]</sup>，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sup>[18]</sup>。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sup>[19]</sup>，请无与围郑，晋人许之。今平王既立于申，申国在今信阳州<sup>[20]</sup>。自申迁于雒邑，而复使周人为之戍申，《竹书纪年》：“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sup>[21]</sup>。”则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sup>[22]</sup>，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sup>[23]</sup>。虢公之立王子余臣，或有见乎此也。自文侯用师，替携王以除其偪<sup>[24]</sup>，而平王之位定矣。后之人徒以成败论，而不察其故，遂谓平王能继文、武之绪<sup>[25]</sup>，而惜其弃岐、丰七百里之地<sup>[26]</sup>，岂为能得当日之情者哉！孔子生于二百年之后，盖有所不忍言，而录《文侯之命》于《书》，录《扬之水》之篇于《诗》<sup>[27]</sup>，其旨微矣<sup>[28]</sup>。《葛藟》<sup>[29]</sup>，《诗序》谓“平王弃其九族”，似亦未可尽非。《古今人表》以平王、申侯与幽王、褒姒、虢石父同列下下<sup>[30]</sup>。

黄汝成按：“春秋起平王末年，而托始于让位之隐，或亦有微意欤。”（《日知录集释》）

《传》言平王东迁<sup>[31]</sup>，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凡言迁者，自彼而之此之辞，盘庚迁于殷是也<sup>[32]</sup>。幽王之亡宗庙社稷，以及典

章文物，荡然皆尽，镐京之地已为戎狄所居<sup>[33]</sup>。平王乃自申东保于雒，天子之国与诸侯无异，而又有携王与之颉颃<sup>[34]</sup>，并为人主者二十年，其得存周之祀幸矣，而望其中兴哉！如东晋元帝不可谓之迁于建康<sup>[35]</sup>。

### [ 注释 ]

[1] 文侯之命：《尚书·周书》篇名。《书序》：“（周）平王锡（赐予）晋文侯秬鬯（jù chàng，古代以黑黍酿制的酒，用于祭祀降神）、圭瓚（古代的一种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用于祭祀），作《文侯之命》。” [2] 《竹书纪年》：又称《汲冢纪年》。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作。西晋咸宁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此书。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是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 [3] “幽王三年”二句：幽王，周幽王，名宫涅（sh ng），周宣王之子。幽王三年（前 779），幽王攻打褒国，褒国兵败，献褒姒乞降。褒姒貌美，深得幽王宠爱。嬖（bì），宠幸。 [4] 王世子宜臼出奔申：世子，古代诸侯王嗣子的称号，此指周太子。宜臼母申王后为申国国君申侯之女。 [5] 王立褒姒之子伯盘为太子：周幽王四年，褒姒生子，名伯服。八年（前 774），周幽王废黜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王后，伯服为太子。 [6] 申侯聘西戎及鄆：聘，诸侯派大夫见别国诸侯，是诸侯之间邦交的礼仪。西戎，古时对西方诸部落的统称。鄆国，在今山东临沂境内。 [7] 王师：指周朝军队。 [8] “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周”二句：周幽王十一年

(前 771), 申侯联合郟国、犬戎攻入周王室, 在骊山下杀死周幽王, 西周灭亡。犬戎, 古代部落名, 又名狻狁(xi n y n), 生活在今陕西、甘肃一带。 [9] 立宜臼于申: 申、鲁、许等诸侯国拥立姬宜臼继位。 [10] 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 与此同时, 以虢国为首的姬姓诸侯国在携地拥立周幽王庶弟余臣, 称携王。周王室出现了“二王并立”的局面。 [11] “平王元年”二句: 姬宜臼为避犬戎之难, 于公元前 770 年迁都洛邑, 是为周平王。命郑武公、晋文侯辅佐皇室, 支撑残局。东迁之后的周朝, 史称东周。东周开始的这一年, 便是春秋时期的开端。 [12] 成周: 周武王灭殷商后就着手在中原建立新都, 平王东迁后改名洛邑, 位于今河南洛阳。 [13] 晋文侯杀王子余臣于携: 携王为虢公翰所立, 对虢公翰言听计从, 引起姬姓大诸侯国国君晋文侯姬仇不满。周平王二十一年(前 750), 晋文侯姬仇于虢地亲自击杀周携王。 [14] 王子朝告诸侯之辞: 周敬王姬贵的庶长子, 名朝。在争夺王位中失败, 于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前 516), 带着全部典籍和一些贵族逃往楚国, 派人向诸侯陈说。 [15] 替: 废除。 [16] 盖失之不考: 《日知录集释》引杨宁(zhù)语: “观《左传》后序, 则成侯已见《竹书》, 但不甚信之耳, 并非失考。”成侯, 指杜预, 封丰乐亭侯, 谥号为成。 [17] 立己: 拥立自己(周平王)登上王位。 [18] 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 作《文侯之命》之时, 依然是“二王并立”的局面, 故平王希望晋文侯能杀携王。 [19] “郑公子兰之从晋文公而东也”三句: 《左传》僖公三十年: “初, 郑公子兰出奔晋, 从于晋侯(跟从晋文公)。伐郑, 请无与围郑(请求不参加围攻郑国的战斗)。许之, 使待命于东。”郑公子兰(即郑穆公, 名兰)为郑文公庶子, 继位前流亡在晋国, 因此不忍心参与伤害故国的事。 [20] 信阳州: 治所在今河南信阳。 [21] 王人: 周王朝的百姓。 [22] 冢嗣: 嫡长子。 [23] 与

闻乎弑：参与过问杀害其父幽王的事。 [24] 逼：同“逼”，逼迫。 [25] 文、武之绪：周文王、武王留下的事业。 [26] 岐、丰：岐，岐山，周王室肇基之地，在今陕西宝鸡。丰，丰镐，丰京和镐京，西周国都，位于今陕西西安长安区。平王东迁，故谓之“弃岐、丰七百里之地”。 [27] 《扬之水》：《诗经·王风》篇名。朱熹《诗集传》：“平王不能行其威令于天下，无以保其母家，乃劳天子之民，远为诸侯戍守，故周人之戍申者，又以非其职而怨思焉。则其哀懦微弱，而得罪于民，又可见矣。” [28] 微：精深，微妙。 [29] “《葛藟》”二句：葛藟，《诗经·王风》篇名。《毛诗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熹《诗集传》云：“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 [30] 《古今人表》：《汉书》篇名。 [31] 《传》言平王东迁：《传》，《左传》。语出《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32] 盘庚迁于殷：商朝中期，盘庚继位，为躲避天灾政祸，决定迁都于殷（今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自此以后，政局稳定，商朝强盛，商族才定居下来不再迁徙。 [33] 镐京之地已为戎狄所居：戎狄，潘耒康熙三十四年遂初堂刻本（下简称“潘耒本”）作“西戎”，天头有佚名原校记（以下各篇称“原校记”）：“‘西戎所有’，原本作‘戎狄所居’。”据此改。镐京，即京城丰镐。 [34] 颉颃（xié háng）：原指鸟上下翻飞，引申为不相上下，互相抗衡。 [35] 东晋元帝不可谓之迁于建康：永嘉之乱，晋愍帝被俘，西晋灭亡。晋朝宗室与大臣拥戴琅琊王司马睿登位，史称晋元帝，是为东晋开国皇帝。晋朝南迁江东，建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成为偏安政权。

### [ 点评 ]

周平王东迁，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中的一

件大事。以此为标志，西周灭亡，东周开始，周王朝从此一蹶不振，中国出现了长达五百多年的列强争霸、混战不休的分裂局面。孔子作《春秋》，即起于周平王后期鲁隐公继位之年（前722）。虽说周平王保全了周王室，但后人认为他胸无大志、不思中兴，对其评价一直不高。《汉书·古今人表》，将其和昏庸的亡国之君幽王同列，置于下下等。苏轼认为“周之失计，未有如东迁之缪者也”，指责“平王举文、武、成、康之业而大弃之，此一败而粥（鬻）田宅者也”（《东坡志林·周东迁失计》）。本文也是批评周平王的文字，文中言“平王东迁，盖周之臣子美其名尔。综其实不然”，还是沿袭前人之说。和宋代学者对周平王的态度一样，文中也包含了对后世苟安一隅的皇朝的不满。但本文的可贵之处，则在并未止于这些常见的表面的指责，而是能探赜索隐，作了深刻的诛心之论。“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谓非出于平王之志者矣。当日诸侯但知其冢嗣为当立，而不察其与闻乎弑为可诛”，直指周平王有弑君父之罪。他赏赐晋文侯，也是为了残杀手足：“报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杀携王之效也。”后世引起无数血案的宫廷之争，周平王可谓始作俑者。一个历来被认为平庸的周平王，在顾炎武的笔下，露出了被人忽视的心理阴暗、生性残忍的一面。

## 丰熙伪尚书<sup>[1]</sup>

五经得于秦火之余<sup>[2]</sup>，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sup>[3]</sup>，乃其分也。近世之说经者，莫病乎好异。以其说之异于人，而不足以取信，于是舍本经之训诂<sup>[4]</sup>，而求之诸子百家之书。犹未足也，则舍近代之文，而求之远古。又不足，则舍中国之文，而求之四海之外。如丰熙之《古书世本》<sup>[5]</sup>，尤可怪焉。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sup>[6]</sup>。又有子贡《诗传》<sup>[7]</sup>，后儒往往惑之。曰“箕子朝鲜本者<sup>[8]</sup>，箕子封于朝鲜，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止，后附《洪范》一篇”。曰“徐市倭国本者<sup>[9]</sup>，徐氏为秦

“信古而阙疑”，是本文的旨意，也是顾炎武学术研究的准则。

博士，因李斯坑杀儒生，托言入海求仙，尽载古《书》至岛上，立倭国，即今日本是也”。二国所译书，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庆录得之<sup>[10]</sup>，以藏于家。按宋欧阳永叔《日本刀歌》<sup>[11]</sup>：“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盖昔时已有是说，而叶少蕴固已疑之<sup>[12]</sup>。夫诗人寄兴之辞，岂必真有其事哉！日本之职贡于唐久矣<sup>[13]</sup>，自唐及宋，历代求书之诏不能得，而二千载之后庆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献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宋咸平中<sup>[14]</sup>，日本僧裔然以郑康成注《孝经》来献，不言有《尚书》。至曰“箕子传《书》古文，自《帝典》至《微子》”，则不应别无一篇逸《书》，而一一尽同于伏生、孔安国之所传<sup>[15]</sup>。其曰“后附《洪范》一篇”者，盖徒见《左氏传》三引《洪范》，皆谓之《商书》，文公五年，引“沈渐刚克<sup>[16]</sup>，高明柔克”。成公六年，引“三人占<sup>[17]</sup>，从二人”。襄公三年，引“无偏无党<sup>[18]</sup>，王道荡荡”。《正义》曰<sup>[19]</sup>：“箕子商人，所说故谓之《商书》。”而不知“王者”，周人之称；“十有三者”，周史之记，不得为商人之书也。《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sup>[20]</sup>，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

义也<sup>[21]</sup>。孔安国传“道岍及岐”，即云“更理说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是自汉以来，别无异文。《史记·夏本纪》亦先九州而后道山、道水。《五子之歌》“为人上者<sup>[22]</sup>，奈何不敬”，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谓本之《鸿都石经》<sup>[23]</sup>。据《正义》言蔡邕所书《石经尚书》，止今文三十四篇，无《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五子之歌》，乃孔氏古文<sup>[24]</sup>，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sup>[25]</sup>。故《左传》成公十六年，引“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哀公六年，引“惟彼陶唐<sup>[26]</sup>，有此冀方”。杜预注并以为逸《书》。《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sup>[27]</sup>，而不可上也”，单穆公引“关石和钧<sup>[28]</sup>，王府则有”。韦昭解亦以为逸《书》<sup>[29]</sup>。

夫“天子失官<sup>[30]</sup>，学在四夷”。使果有残编断简，可以裨经文而助圣道<sup>[31]</sup>，固君子之所求之而惟恐不得者也。若乃无益于经，而徒为异以惑人，则其于学也，亦谓之异端而已。愚因叹夫昔之君子，遵守经文，虽章句先后之间犹不敢辄改，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sup>[32]</sup>，用魏徵所注《类礼》撰为《疏义》，成书上进，而为张说所驳，谓章句隔绝，有乖旧本，竟不得立于学官。夫《礼记》

以上引经据典，论丰氏《尚书》出自伪造，明白无误。

信古阙疑，是为了提防异端惑人，而非抱残守缺。

二戴所录<sup>[33]</sup>，非夫子所删，况其篇目之次，元无深义<sup>[34]</sup>，而魏徵所注，则又本之孙炎<sup>[35]</sup>。字叔然，汉末人。以累代名儒之作<sup>[36]</sup>，申之以诏旨，而不能夺经生之所守，盖唐人之于经传，其严也如此。故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sup>[37]</sup>，多有独得，而史氏犹讥其“一本所承<sup>[38]</sup>，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辨，为助所阶。乃近代之人，其于读经鹵莽灭裂<sup>[39]</sup>，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之据依，而师心妄作<sup>[40]</sup>，刊传记未已也<sup>[41]</sup>，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sup>[42]</sup>，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sup>[43]</sup>，陆务观曰：“唐及国初<sup>[44]</sup>，学者不敢议孔安国、郑康成，况圣人乎？自庆历后，诸儒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然排《系辞》，毁《周礼》，疑《孟子》，讥《书》之《胤征》《顾命》，不难于议经，况传注乎？”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sup>[45]</sup>。而今且弥甚。徐防有言<sup>[46]</sup>：“今不依章句<sup>[47]</sup>，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寔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

汉代徐防的话，千年之后，在顾炎武心中引起更深的感慨，引为对当代学者的告诫。

若丰熙之徒，又不足论也。近有谓得朝鲜本《尚书》，于《洪范》“八政”之末添多五十二字者。按元王恽《中堂事记》<sup>[48]</sup>：“中统二年<sup>[49]</sup>，高丽世子禘来朝，宴于中书省<sup>[50]</sup>。问

曰：‘传闻汝邦有古文《尚书》及海外异书。’答曰：‘与中国书不殊。’是知此五十二字者，亦伪撰也。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sup>[51]</sup>，“以中书校之，非是。霸辞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并”，诏存其书。“后樊并谋反，乃黜其书。”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sup>[52]</sup>，延登，赞曰：假王莅政”之语，莽遂依之，以称居摄<sup>[53]</sup>。是知惑世诬民，乃犯上作乱之渐<sup>[54]</sup>，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sup>[55]</sup>，其必先之矣。

#### [ 注释 ]

[1] 丰熙伪尚书：丰熙，字原学，浙江鄞县（今属浙江宁波）人。嘉靖时任翰林学士。《尚书》，儒家五经之一。尚，即“上”；书，即史官所记史书，《尚书》即上古史书。 [2] 秦火：指秦始皇焚书坑儒。 [3] 信古而阙疑：相信古人，把疑难问题保留下来，不妄加评论。阙，同“缺”。 [4] 训诂：又称“训故”“故训”“解诂”等。用通俗的语言解释词义叫“训”；用当代的话解释古代的语言叫“诂”。最早见于西汉鲁人毛亨的《诗故训传》，“故”“训”“传”三者都是注解古文的方法。 [5] 《古书世本》：即《古书世学》，题“宋丰稷正音，明丰庆续音，明丰熙集说，明丰坊考补”，为丰氏世代相续之作，故谓之“世本”。 [6] 鄞人言出其子坊伪撰：坊，丰坊，丰熙子，字存礼，又字存叔，晚年更名道生。精于书法，篆、隶、行、草、楷五体并善。相传丰坊为人，目空古今，滑稽玩世。好藏书，尤嗜碑帖，卖尽祖传田

异端惑众，不仅危害学术，还会祸害整个社会，务必预加防范。

产千余亩，聚书五万卷，藏书处名“万卷楼”。曾谎称祖先于北宋年间得秘府《河图石本》《鲁诗石本》《大学石本》，于驿馆得《朝鲜尚书》《日本尚书》。有《古书世学》六卷。 [7] 子贡《诗传》：《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十七《诗传》：“旧本题曰‘子贡撰’。实明丰坊所作。《明史》坊本传称‘坊为《十三经训诂》，类多穿凿。世所传子贡《诗传》即坊编本’者是也。其说升鲁于《邶》《鄘》之前，降《郑》于《邠》《曹》之后，《大雅》《小雅》，各分为三，曰续、曰传，皆与所作《申培诗说》同。”子贡，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卫国黎（今河南浚县）人。孔门十哲之一。有雄辩之才，且善于经商。 [8] 箕子：名胥余，商纣王的叔父，官太师，封于箕。预见商朝必亡。商亡后，远走朝鲜，创立箕氏侯国，史称朝鲜国的创立者。 [9] 徐市：市，同“黻”（fú）。又作“徐福”，字君房，秦朝著名方士，曾任秦始皇的御医。率领三千童男女自山东沿海东渡，传说遍及韩国南部与日本，传说为日本国的创立者。 [10] 庆：丰庆，明英宗天顺间为河南布政使。 [11] 欧阳永叔《日本刀歌》：欧阳永叔，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官至参知政事。北宋文学家，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所作《日本刀歌》，借日本出口的宝刀，慨叹秦始皇焚书坑儒导致一部分文化典籍的流失。 [12] 叶少蕴：叶梦得，字少蕴，苏州长洲人。高宗时任户部尚书、江东安抚大使等官职。南宋文学家。 [13] 职责：古代藩属或外国对于朝廷按时纳贡。 [14] “宋咸平中”二句：裔（di o）然，俗姓秦。生于日本京都，幼入东大寺从观理习三论宗，又从石山寺元昶习真言密教。宋太平兴国八年（983），为弘扬佛法，率领弟子乘宋商船入宋求法。雍熙三年（986）六月，乘台州商船回日本。咸平，宋真宗年号（998—1003）。其时裔然已回日本，疑有误。郑康成，郑玄。郑玄《六艺论》有《孝经注》一卷。清鲍廷博云：“《孝

经郑氏注》废于唐，亡于五季，至宋雍熙间日本僧裔然以献于朝，诏藏秘阁，嗣后历元及明，未闻有述之者，讫无传焉。”（《孝经郑注序》）[15]伏生：伏胜，字子贱。曾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于壁中藏《尚书》，汉初仅存二十九篇，教于齐鲁之间。文帝时求能治《尚书》者，以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乃使晁错往受之。《今文尚书》学者，皆出其门。孔安国：字子国，鲁国人，孔丘十世孙。受《尚书》于伏生。汉武帝末期，鲁共王坏孔府旧宅，于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蝌蚪文字，当时人不识，安国以今文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五十八篇，谓之《古文尚书》。[16]“沈渐刚克”二句：语出《尚书·周书·洪范》。杜预注：“沈渐，犹滞溺也。高明，犹亢爽也。言各当以刚柔胜己本性，乃能成全也。”（《春秋左传正义》）克，胜。刚克即以刚强见胜，柔克即以柔顺见胜。孔颖达疏：“地之德沈深而柔弱矣，而有刚能出金石之物也。”谓地德深沉柔弱，柔中有刚。[17]“三人占”二句：《尚书·周书·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孔颖达疏：“从二人之言者，二人为善既钧，故从众也。”[18]“无偏无党”二句：语出《尚书·周书·洪范》。偏，偏颇，不公正。党，偏私，偏袒。言不偏私，不结党，治国大道就平坦宽广。[19]《正义》：指唐孔颖达等人的《五经正义》。[20]《禹贡》以道山、道水移于九州之前：《禹贡》，《尚书·夏书》篇名。道，当为“导”，开通。道山，谓开通岍山等山脉，直至庐山。道水，谓疏通弱水等河流，直至大海。[21]此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也：《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郑玄注：“经纬，谓涂（同“途”）也。”贾公彦疏：“南北之道为经，东西之道为纬。”《禹贡》九州，自冀州起，自北往南，依次陈说。导山、导水则自岍山、弱水起，自西往东，依次陈说。先九州而后导山、导水。丰氏《古书世学》中的《禹贡》篇，“以道（导）

山、道（导）水移于九州之前”，故谓之“不知古人先经后纬之义”。 [22]“《五子之歌》为人上者”以下四句：《五子之歌》，《尚书·夏书》篇名。大禹之孙、夏朝第三代君主太康贪图享乐，在外打猎长期不归，国都被后羿侵占。太康的五个弟弟和母亲在洛河边，追述大禹的告诫而作《五子之歌》，表达五人的怨恨和谴责。其一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与下文《国语·周语》所引不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末句“敬”字与前“予”“图”“马”等字声韵不协。叶（xié），指声韵协调。 [23]《鸿都石经》：东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蔡邕奉命定儒家六经文字，亲自以隶书体书写，命工镌刻，至光和六年（183）告成。石经刻于四十六块高一丈、宽四尺的长方形石碑之上，共二十多万字，立于太学门外，称《鸿都石经》，又称《熹平石经》。 [24]孔氏古文：传说西汉景帝程姬之子刘余被封为鲁王后，为扩大王府，侵占一部分孔子旧居，在屋壁中发现暗藏的《礼》《论语》《孝经》《尚书》等简书，因其字体远在先秦，时人称为蝌蚪文字。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以伏胜所传校定，多出二十五篇，被称为《古文尚书》。 [25]东晋豫章内史梅赜所上：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豫章内史梅赜献了一部《古文尚书》，计有经文五十八篇，包括西汉今文二十八篇，后世指为伪书。 [26]“惟彼陶唐”二句：语出《五子之歌》其二。陶唐，即唐尧。初封于陶，后徙于唐。冀方，冀州地区。 [27]“《国语·周》单襄公引‘民可近也’”二句：见《国语·周语中·单襄公论郤至佻天之功》。单（shàn）襄公，春秋时期单国国君。《五子之歌》谓“民可近，不可下”，《国语》谓“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上”“下”二字正反。但《五子之歌》之“下”字，可作轻视解，《国语》之“上”字，可作

居高临下解，于文意均无碍。 [28]“单穆公引‘关石和钧’”二句：见《国语·周语下·单穆公谏景王铸大钱》。单穆公，春秋时期单国国君。“关石和钧”二句出《五子之歌》其四。韦昭注：“关，门关之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赋调钧，则王之府藏常有也。”和，平。钧，同“均”。 [29]韦昭：韦曜，本名韦昭，字弘嗣，吴郡云阳（今江苏丹阳）人。东吴四朝重臣。三国时期著名史学家，有《吴书》《国语注》等。 [30]“天子失官”二句：语出《左传》昭公十七年。言天子丧失了自己的职守，官守的学术散落到四夷之地。“夷”，原作“裔”，据《左传》改。 [31]裨：裨益，使受益。 [32]“故元行冲奉明皇之旨”以下七句：《旧唐书·元行冲传》：“初，有左卫率府长史魏光乘奏请行用魏徵所注《类礼》，上遽令行冲集学者撰《义疏》，将立学官。行冲于是引国子博士范行恭、四门助教施敬本检讨刊削，勒成五十卷，十四年八月奏上之。尚书左丞相张说驳奏曰：‘今之《礼记》，是前汉戴德、戴圣所编录，历代传习，已向千年，著为经教，不可刊削。至魏孙炎始改旧本，以类相比，有同抄书，先儒所非，竟不行用。贞观中，魏徵因孙炎所修，更加整比，兼为之注，先朝虽厚加赏锡，其书竟亦不行。今行冲等解徵所注，勒成一家，然与先儒第乖，章句隔绝，若欲行用，窃恐未可。’上然其奏，于是赐行冲等绢二百匹，留其书贮于内府，竟不得立于学官。”元行冲，元澹，字行冲，河南人。开元中，为弘文馆学士。博学，尤通古训。明皇，唐玄宗的谥号。魏徵，字玄成，巨鹿郡下曲阳县（今河北晋州）人。唐太宗时任宰相，唐初政治家。张说，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今属河南）人。唐玄宗时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学官，指学校。 [33]二戴：指戴德与戴胜（或戴圣）。戴德，字延君，梁国睢阳（今河南商丘南）人。汉代学者，今文礼学“大戴学”的开创者，有《大戴礼记》。戴圣，字次君。汉代今文经

学的开创者，有《小戴礼记》。戴圣与叔父戴德曾随后苍学《礼》，后人合称为“大小戴”。 [34] 元：原来。 [35] 孙炎：字叔然，乐安（今山东博兴）人。三国时期经学家，受业于郑玄。曾为《礼记》作注。 [36] 累代：历代，接连几代。 [37] 三家：指《左传》《公羊传》《穀梁传》三家。 [38] “而史氏犹讥其‘一本所承’”二句：《新唐书·儒学传下》：“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拙三家，不本所承，自用名学，凭私臆决，尊之曰‘孔子意也’。赵、陆从而唱之，遂显于时。”一，当为“不”。 [39] 灭裂：草率，粗略。 [40] 师心：师心自用，自以为是。 [41] 刊：改动。未已：不止，未毕。 [42] 更：更改。 [43]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诗人。 [44] “唐及国初”以下十二句：语出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八。庆历，宋仁宗年号。皮锡瑞《经学历史》：“排《系辞》谓欧阳修，毁《周礼》谓修与苏轼、苏辙，疑《孟子》谓李觥、司马光，讥《书》谓苏轼，黜《诗序》谓晁说之。” [45] 赵汝谈至谓《洪范》非箕子之作：赵汝谈，字履常，宋太祖八世孙。南宋宁宗庆元前后在世，居余杭。学识渊博，于经学最见功底。《宋史·赵汝谈传》“汝谈天资绝人，沈思高识，自少至老，无一日去书册。其论《易》，以为为占者作；《书·尧》《舜》二典宜合为一，禹功只施于河洛，《洪范》非箕子之作；《诗》不以《小序》为信；《礼记》杂出诸生之手；《周礼》宜傅会女主之书。要亦卓绝特立之见。” [46] 徐防：字谒卿，东汉沛国铨（今安徽濉溪）人。奉事明帝、和帝。父、祖均治经学。 [47] “今不依章句”六句：语出《后汉书·徐防传》。寢（qǐn），渐渐。 [48] 王恽：字仲谋，号秋涧，卫州路汲县（今河南卫辉）人。元朝学者、诗人。为元世祖忽必烈、元裕宗真金和元成宗皇帝铁穆耳三代著名谏臣。 [49] 中统：元世祖年号。 [50] 中书省：古代皇帝直属的中枢官署之名。为正规的宰

相机构，掌管制令决策，是中央最高权力机关。 [51]“汉东莱张霸伪造《尚书》百二篇”以下八句：见《汉书·儒林传》。中书，宫中的藏书。尉氏，地名，在今河南开封。 [52]“而伪《逸书·嘉禾篇》有‘周公奉鬯立于阼阶’”以下四句：见《汉书·王莽传上》所载汉平帝死后，群臣请王莽“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的奏言。鬯(chàng)，古代祭祀用的酒。阼阶，东阶。延登，引入而登殿。假王，暂署的、非正式受命的王。莅政，掌管政事。 [53]居摄：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处理政务。 [54]渐：征兆，迹象，苗头。 [55]大学之教“禁于未发”者：《礼记·学记》：“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同“预”）。”

### [ 点评 ]

刘知幾的“疑古”“惑经”之论，在唐代尚罕知音，至宋则蔚成风气，陆游在当时已生感慨。如此说经，得失互见，一方面“发明经旨，非前人所及”，另一方面也有师心自用、凭私臆决之处。就“读经卤莽灭裂”“妄生穿凿”而言，明人走得更远。孔子曾告诫子张：“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论语·为政》）这也是他编纂《春秋》的原则。本文开篇即将“信古阙疑”与“病乎好异”对举提出。前者是顾炎武治经，也是治学的原则，无论是信，还是疑，都须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而一味“好异”，势必会放言无忌，妄议古人，这是治学的大忌。前者实事求是，后者标新立异，从两相比较中，可见治学态度、治学规则，乃至学者素养的区别。

顾炎武“先人皆通经学古”（《钞书自序》）。他毕生尊崇经学，治学也从经学入手，对像丰坊那样故弄虚玄、

“轻侮道术”的人尤为不满，但既不依傍，也不盲从。“阙疑”并非不疑，五经“不能无错误”，只是应该疑其所当疑，而不是信口雌黄，妄加訾毁。他赞同孟子的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认为这在当今更有现实意义。以《尚书》而言，他怀疑“古时有《尧典》无《舜典》，有《夏书》无《虞书》，而《尧典》亦《夏书》也”（《日知录·古文尚书》）；“《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者”（《日知录·泰誓》）。他也相信“《书序》为后人伪作，逸《书》之名亦多不典”；“不但《书序》可疑，并百篇之名亦未可信矣”（《日知录·书序》）。顾炎武信古，是信古籍中真实的部分；他尊经，是尊经籍中有价值的内容。以此，他对古籍的真伪、书中文字是否有讹误，特别注意。“是故信而好古，则旧本不可无存；多闻阙疑，则群书亦当并订。此非后之君子之责而谁任哉？”（《日知录·监本二十一史》）顾炎武晚年至关中，以唐开成石经，校明监本九经，甄别各经出入之处，或以史实佐证，著《九经误字》。九经中的不少脱误，“皆赖炎武此书校明，今本得以补正，则于典籍不为无功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九经误字》）。

## 言私其縱

“雨我公田<sup>[1]</sup>，遂及我私。”先公而后私也。“言私其縱<sup>[2]</sup>，獻豸于公。”先私而后公也。自“天下为家<sup>[3]</sup>，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sup>[4]</sup>。非惟弗禁，且从而恤之<sup>[5]</sup>。建国亲侯<sup>[6]</sup>，胙土命氏<sup>[7]</sup>，画井分田<sup>[8]</sup>，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至于当官之训，则曰“以公灭私<sup>[9]</sup>”，然而禄足以代其耕<sup>[10]</sup>，田足以供其祭<sup>[11]</sup>，使之无“将母”之嗟<sup>[12]</sup>，“室人”之谪<sup>[13]</sup>，又所以恤其私也。此义不明久矣。世之君子必曰“有公而无私”，此后代之美言，非先王之至训矣。

这是一篇如何认识、处理公私关系的文字。

## [ 注释 ]

[1] “雨我公田”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大田》。言雨下在公田中，也洒到我的私田。商、周时土地制度为井田制。公田是由劳动者共同耕种，而将收获物全部缴给统治者的土地。同“私田”相对称。私，私田。 [2] “言私其豨”二句：语出《诗经·豳风·七月》。言，语助词，无义。豨（z ng），一岁小猪，代指小兽。豨（j n），三岁的猪，代指大兽。言小兽归猎者私有，大兽献给公家。 [3] “天下为家”以下三句：语出《礼记·礼运》。言天下为一家私有，各人只亲爱自己的父母，只慈爱自己的子女。 [4] 弗：不。 [5] 恤：体恤，替他人实际处境着想而同情、怜悯。 [6] 建国亲侯：《周易·比卦》：“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谓建立万国，亲抚诸侯。 [7] 胙土命氏：《左传》隐公八年：“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谓古代天子立有德之人为诸侯，根据他的生地赐姓，又分封土地且赐与他族氏。 [8] 画井分田：《孟子·滕文公上》：“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 [9] 以公灭私：语出《尚书·周书·周官》。 [10] 禄足以代其耕：俸禄足以替代耕种的收入。 [11] 田足以供其祭：田，古代君王赏赐给宗亲臣僚的封地。言封地所得足以提供祭祀的费用。 [12] “将母”之嗟：《诗经·小雅·四牡》：“王事靡盬，不遑将母。”言王家的差使没完没了，以此顾不上奉养老母。靡，无。盬（g ），止息。将，奉养。 [13] “室人”之谪：《诗经·邶风·北门》：“我入自外，室人交遍谪我。”言我从外面回家，家人个个责骂我。谪，谴责，责难。

## [ 点评 ]

本文讨论的，是一个纠缠学者上千年的问题：公与

私，孰轻孰重？就人的行为而言，该孰先孰后？据《尚书·周官》，周朝建国之初，成王训诫百官，有“以公灭私，民其允怀”这样的话。即官员若能用公心灭除私欲，就能获得百姓的信任和思念。这话说得一点不错，但它针对的仅仅是官吏，作为普通的百姓，是否也该“以公灭私”呢？对此，宋代道学家持肯定的态度。前人有“天理人欲”说，天理即伦理纲常，人欲即人的欲望。《礼记》中虽也肯定：“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礼运》）但又认为：“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乐记》）宋代道学家明确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就一定意义上说，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即公与私的对立；“以公灭私”，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必然结果。与顾炎武同时的王夫之、稍后的戴震等人，为维护人欲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对道学家的主张，作了有力的抨击：“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孟子字义疏证》）“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漫漫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戴东原集·与某书》）顾炎武的态度，不像王、戴那么激烈，但也不同意“以公灭私”这种偏激的看法。他认为“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因此古代贤明的君王从不禁止私欲，非但不禁止，还持体恤和同情的态度。这实际上关系到国家和国民关系的问题。国家由国民组成，二者一体相连，维护国民

的利益，也是维护国家的利益；窒息国民的欲望，也会断送国家的生机。“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国家图书馆

## 大 原<sup>[1]</sup>

“薄伐玁狁<sup>[2]</sup>，至于大原”，毛、郑皆不详其地<sup>[3]</sup>。其以为今太原阳曲县者<sup>[4]</sup>，始于朱子<sup>[5]</sup>，《吕氏读诗记》、严氏《诗缉》并云<sup>[6]</sup>。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sup>[7]</sup>，而后大原可得而明也。《汉书·地理志》：安定郡有泾阳县<sup>[8]</sup>，“开头山在西<sup>[9]</sup>，《禹贡》泾水所出<sup>[10]</sup>”。《后汉书·灵帝纪》：“段熲破先零羌于泾阳<sup>[11]</sup>。”注<sup>[12]</sup>：“泾阳县属安定，在原州<sup>[13]</sup>。”《郡县志》<sup>[14]</sup>：“原州平凉县<sup>[15]</sup>，本汉泾阳县地，今县西四十里泾阳故城是也。”然则大原当即今之平凉，而后魏立为原州<sup>[16]</sup>，亦是取古大原之名

“大原”究竟在何处？求得“泾阳所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下面的论证，都从这里展开。

根据历史地名的沿革，推断大原即现今的平凉。

根据地理位置的距离，推断大原不在晋阳。

根据史书记载，作进一步论证。

根据文学作品，指出太原并非仅仅是地名。

尔。《唐书》<sup>[17]</sup>：原州平凉郡，治平高<sup>[18]</sup>。“广德元年没吐蕃<sup>[19]</sup>。节度使马璘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sup>[20]</sup>。贞元十九年徙治平凉<sup>[21]</sup>。元和三年又徙治临泾<sup>[22]</sup>。大中三年收复关陇<sup>[23]</sup>，归治平高。”计周人之御獯豸，必在泾、原之间。若晋阳之太原<sup>[24]</sup>，在大河之东<sup>[25]</sup>，距周京千五百里<sup>[26]</sup>，岂有寇从西来，兵乃东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sup>[27]</sup>，城彼朔方。”而《国语》宣王“料民于大原”<sup>[28]</sup>，亦以其地近边而为御戎之备，必不料之于晋国也。又按《汉书》贾捐之言<sup>[29]</sup>：“秦地南不过闽越<sup>[30]</sup>，北不过大原，而天下溃畔<sup>[31]</sup>。”亦是平凉而非晋阳也。汉武帝始开朔方郡<sup>[32]</sup>，故秦但有陇西、北地、上郡而止<sup>[33]</sup>。若晋阳之太原，则其外有雁门、云中、九原<sup>[34]</sup>，不得言“不过”也。若《书·禹贡》“既修大原，至于岳阳<sup>[35]</sup>”；《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sup>[36]</sup>”；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sup>[37]</sup>，障大泽，以处大原”，则是今之晋阳。而岂可以晋之大原为周之大原乎？司马相如《上林赋》<sup>[38]</sup>：“布濩阎泽<sup>[39]</sup>，延蔓太原。”阮籍《东平赋》<sup>[40]</sup>：“长风振厉，萧条太原。”高平曰原<sup>[41]</sup>，盖古人之通称也。

吾读《竹书纪年》而知周之世有戎祸也，盖

始于穆王之征犬戎<sup>[42]</sup>。六师西指，无不率服<sup>[43]</sup>，于是迁戎于太原<sup>[44]</sup>。十七年<sup>[45]</sup>。以黷武之兵，而为徙戎之事。懿、孝之世<sup>[46]</sup>，戎车屡征。至夷王七年<sup>[47]</sup>，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sup>[48]</sup>，至于俞泉，获马千匹”。则是昔日所内徙者，今为寇而征之也。宣王之世，虽号中兴，三十三年<sup>[49]</sup>，“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三十九年<sup>[50]</sup>，“伐羌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其与后汉西羌之叛<sup>[51]</sup>，大略相似。幽王六年<sup>[52]</sup>，“命伯士帅师伐六济之戎，王师败逋”。《后汉书·西羌传》并用此。严尤以为周得中策<sup>[53]</sup>，盖不考之言。于是关中之地<sup>[54]</sup>，戎得以整居其间<sup>[55]</sup>，而陕东之申侯<sup>[56]</sup>，至与之结盟而入寇。自迁戎至此，一百七十六年。《周语》：“申、缙、西戎方强<sup>[57]</sup>，王室方骚。”盖宣王之世，其患如汉之安帝也；幽王之世，其患如晋之怀帝也<sup>[58]</sup>。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而三川之震<sup>[59]</sup>，“麋弧”之谣<sup>[60]</sup>，皆适会其时者也。然则宣王之功，计亦不过唐之宣宗<sup>[61]</sup>，而周人之美宣，亦犹鲁人之颂僖也<sup>[62]</sup>，事劣而文侈矣。“书

不尽言<sup>[63]</sup>”，“是以论其世也<sup>[64]</sup>”。如毛公者<sup>[65]</sup>，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竹书纪年》自共和以后多可信<sup>[66]</sup>，盖亦必有所传，其前则好事者为之尔。

结句含蓄不尽，  
耐人玩味。

### [ 注释 ]

[1]大原：大，通“太”。潘耒《日知录》刻本原文及原注，或作“大原”，或作“太原”，并不一致。现依原文不改。 [2]“薄伐玁狁”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六月》。薄，置于句首的组词。薄伐，征伐。玁狁(xīnyǎn)，也作“猃狁”，古代北方游牧民族。 [3]毛、郑皆不详其地：毛，大毛公毛亨或小毛公毛萇。毛亨，战国末年鲁国（今山东曲阜）人，秦始皇时避居河间（今属河北）。据称其诗学传自子夏，作《毛诗故训传》，简称《毛传》，以授其侄毛萇。世称“二毛”所传为古文诗学“毛诗学”。郑，郑玄，著有《毛诗传笺》（简称《郑笺》）。不详，不知道。 [4]阳曲县：史称“三晋首邑”，今属山西太原。 [5]始于朱子：见朱熹《诗集传》。 [6]《吕氏读诗记》：即《吕氏家塾读诗记》，南宋学者吕祖谦著。严氏《诗缉》：南宋严粲所著《诗缉》。 [7]若此诗则必先求泾阳所在：《诗经·小雅·六月》中尚有“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数句。“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因“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而起。泾阳，今属陕西咸阳，位于泾河之北。 [8]安定郡：汉武帝元鼎三年（114），析北地郡地置安定郡。 [9]开(jì'n)头山：杜佑《通典》：原州高平县“有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屯山，泾水所出，一名崆峒山”。在今宁夏固原南。 [10]《禹贡》泾水所出：泾水，泾河，黄河最大支流渭河的最大支流，发源于宁夏六盘山东麓。 [11]段颍破先零羌于泾阳：建宁元年（168），汉灵帝命段颍镇压东羌起义。七

月，又破先零羌于泾阳。段颍，字纪明。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戍边征战十余年，与羌人作战先后达一百八十次，最终平定西羌，并击灭东羌。先零羌，两汉时期西羌族的一支。 [12]注：南朝宋范晔所著《后汉书》，有唐章怀太子李贤注。 [13]原州：今属宁夏固原。 [14]《郡县志》：唐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 [15]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崆峒区。 [16]后魏立为原州：后魏，指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魏太延二年（436），在今固原置高平镇，北周时改高平镇为原州。 [17]《唐书》：指北宋欧阳修等人合著的《新唐书·地理志》。 [18]平高：西魏末改高平县置为平高郡治（在今宁夏固原）。 [19]广德：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吐蕃（t b）：意为“大蕃”，古代藏族政权。 [20]马璘：字仁杰，岐州扶风（今属陕西）人。安史之乱后长年镇守西北，多次与吐蕃交战，以杀敌报国为己任。行原州：兼理原州事务。行，兼任官职。灵台之百里城：即今甘肃灵台西五十里百里镇。 [21]贞元：唐德宗李适的年号。徙治：将治所迁徙（至某地）。 [22]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临泾：在今甘肃镇原南。 [23]大中：唐宣宗李忱的年号。关：今陕西关中地区。陇：今甘肃乌鞘岭以东、宝鸡以西地区以及宁夏全境，因为在陇山（也叫六盘山）周围而称为陇。 [24]晋阳：古代北方著名都会，故址在今山西太原晋源一带。 [25]大河：指黄河。 [26]周京：西周京城丰京和镐京。今陕西西安长安区有丰镐遗址。 [27]“天子命我”二句：语出《诗经·小雅·出车》。朔方，古人以朔气指北方的寒气，故北方又称朔方。 [28]宣王“料民于大原”：宣王，姬姓，名静，字靖。周厉王之子，周幽王之父。即位后励精图治，史称“宣王中兴”。晚年穷兵黩武，损失惨重。《国语·周语上·仲山父谏宣王料民》：“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大原。”料，统计。料民，统计国民人口。 [29]《汉书》贾捐之言：《汉书·贾捐之传》载：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的曾孙。元帝即位之初，上疏论征伐珠崖（治所在今海南琼山东南）的得失，建议放弃珠崖。 [30] 闽越：先秦部落名，属百越的一支。在今福建一带。 [31] 畔：通“叛”。 [32] 朔方郡：位于黄河河套的西北部，所辖朔方县城址在今内蒙古鄂托克旗西北部。 [33] 陇西、北地、上郡：均为秦、汉时郡名。陇西，郡治狄道（今甘肃临洮）。北地，郡治义渠县（在今甘肃庆阳西南），后多次迁徙。上郡，郡治肤施县（今陕西绥德）。 [34] 雁门、云中、九原：战国时赵武灵王为抵御匈奴置雁门、云中郡。均为秦、汉时郡名。雁门，秦时治所善无（今山西右玉南）。云中，秦时郡治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九原，秦时郡治九原城（在今内蒙古包头）。 [35] 岳阳：在今湖南。 [36] 《春秋》“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原”：《左传》昭公元年：“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鹵。”杜预注：“大鹵，大原晋阳县也。”《穀梁传》昭公元年：“中国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号从中国，名从主人。‘原’者何？上平曰原，下平曰鹵。”原，即地势高的平地。荀吴，春秋后期晋国大夫。率军多与戎狄部落作战，扫平晋国周边的游牧部落。 [37] “及子产对叔向‘宣汾洮’”以下三句：语出《左传》昭公元年。子产，姬姓，公孙氏，名侨，字子产。春秋时期政治家、思想家。郑穆公之孙，前554年为卿，先后辅佐郑简公、郑定公，为郑国执政。叔向，姬姓，羊舌氏，名肸，字叔向。春秋时期晋国大夫、政治家，与郑国子产、齐国晏婴齐名。宣，疏通。汾，汾水，即今山西的汾河。洮，洮水，又名桃水。即今山西的桃河。障，堵塞。大原，杜预注：“大原，晋阳也。” [38] 司马相如《上林赋》：司马相如，字长卿，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辞赋家。代表作品为《子虚赋》《上林赋》，后者主要铺叙天子上林苑中的景观。 [39] 布濩（hù）：遍布。閼泽：大湖。閼，通“宏”，宏大。延蔓：绵延伸展。太原：广阔

的平原。 [40] 阮籍《东平赋》：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三国时期魏国诗人，“竹林七贤”之一，崇奉老庄之学。《东平赋》前面描写东平（今属山东）的山川形势、风俗习惯。 [41] “高平曰原”二句：黄汝成《日知录集释》引全祖望语：“《尚书大传》：‘大而高平者谓之太原。’《春秋题辞》：‘高平曰太原。’故平凉亦有太原之名。” [42] 穆王之征犬戎：穆王，姬姓，名满，又称“穆天子”。西周第五位君主。在位期间，曾征犬戎，伐徐戎，作《吕刑》。传说中尚有关于穆王西游见西王母的记载。 [43] 率服：相率而服从。也指顺服。 [44] 迁戎于太原：《后汉书·西羌列传》：“至穆王时，戎狄不贡，王乃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迁戎于太原。” [45] 十七年：周穆王十七年。 [46] 懿、孝：周懿王（姬囂）、周孝王（姬辟方），周室国势自此开始衰弱。 [47] 夷王：姬姓，名燮。周懿王之子。 [48] “虢公帅师‘伐太原之戎’”以下三句：语出《后汉书·西羌列传》。虢公，虢国君主。虢国是西周同宗诸侯封国，为周王室的屏障。 [49] “三十三年”以下六句：《后汉书·西羌列传》：“宣王立四年，使秦仲伐戎，为戎所杀。王乃召秦仲子庄公，与兵七千人伐戎，破之，由是少却。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与本文所记，年份有出入。王国维《竹书纪年辑校》所载，与本文所记，出入尤多。条戎、奔戎，均为古代戎族的一支。条戎分布在今山西中部。逋（b），逃亡。 [50] “三十九年”以下四句：《史记·周本纪》：“（周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千亩，古代地名，在今山西介休南。 [51] 后汉西羌之叛：东汉安帝（刘祜）永初元年夏，因官府举措不当，激起羌族叛乱，“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

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后汉书·西羌列传》）。[52]“幽王六年”以下三句：范祥雍《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案《西羌传》作‘后十年’，谓周宣王三十九后十年。宣王四十六年卒，又三年即当幽王三年。”伯士，西周将领，在征伐六济的戎狄时战死。[53]严尤以为周得中策：严尤，字伯石，善战，自比乐毅、白起，颇受王莽器重，任大司马。曾就出征匈奴事上书云：“臣闻匈奴为害，所从来久矣，未闻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后世三家周、秦、汉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汉得下策，秦无策焉。”（《汉书·匈奴传下》）[54]关中：指函谷关以西地区，位于今陕西中部。[55]整居：完全占据。[56]“而河东之申侯”二句：见《文侯之命》注[8]。[57]“申、缙、西戎方强”二句：语出《国语·郑语》，非《周语》。申，申国。缙（z ng），缙国。骚，骚扰，不安宁。[58]其患如晋之怀帝也：晋怀帝，名司马炽。永嘉五年（311），密诏荀晞讨伐司马越，由此引起永嘉之乱，被汉赵昭武帝刘聪俘虏，三年后被毒杀。西晋灭亡。[59]三川之震：《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60]“檿（y n）弧”之谣：《国语·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宣王之时童谣曰：‘檿弧箕服，实亡周国。’”檿，山中的桑树。木材坚韧，可做弓、车辕。弧，弓。檿弧，用檿桑木制作的弓。箕，一种树木名，服，箭袋。箕服，用箕木制作的箭袋。[61]唐之宣宗：唐宣宗，名李忱。在位时勤于政事，整顿吏治，惠民爱物，史称“大中（唐宣宗年号）之治”。但《新唐书》谓其“精于听断，而以察为明，无复仁恩之意。呜呼，自是而后，唐衰矣”。[62]鲁人之颂僖：僖，鲁僖公，名姬申，春秋时期鲁国君主。颇有政治

才干，处于列强争霸的年代，应对游刃有余。在位时是鲁国最强劲的时期。 [63] 书不尽言：《周易·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谓文字难以充分表达想说的话，言语也难以充分表达人的心意。 [64] 是以论其世也：《孟子·万章下》：“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言吟诵古人的诗，阅读古人的书，却不了解古人的为人，行吗？所以要讨论古人所处的时代，这样才能进而与古人为友。 [65] “如毛公者”二句：《毛诗·小雅》小序对西周后期的政事，颇多微词，故称毛公能见微知著，“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 [66] 共和：共和行政，又称周召共和，周厉王无道，国人暴动，攻入王宫，周厉王逃跑，政权由大臣周定公和召穆公共同执掌，史称“共和”。共和元年，即前 841 年，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 [ 点评 ]

《诗经·小雅·六月》中的“大原”，究竟在何处？连博闻强识的毛公、郑玄都不清楚，而同样博学多才的朱熹、吕祖谦等人，认为这就是后世晋阳的太原，但顾炎武并不认可。如何解决这个历史地理研究中的疑点？顾炎武别具慧眼，他从《六月》诗本身着手，提出求得“泾阳所在”，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本文引经据典，博采兼收，多方证佐，举要归纳，层层剖析，势如破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日知录》称顾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俞樾说他“于经史古义、注疏旧说，爬罗剔抉，不遗一字”（《重

刻憺园集序》。这种治学精神和方法，在本文得到充分的体现。

朱熹《诗集传·六月》：“猘狁内侵，逼近京邑。（厉）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甫帅师伐之，有功而归。诗人作歌以叙其事如此。”后人常将这首诗看作宣王中兴的表现。但顾炎武却看到了另外一面，即外族入侵对中原造成的伤害。下面一段突然转入“周之世有戎祸”，不仅后汉西羌之叛，与其“大略相似”，明末异族入侵的祸害更加惨烈；至于“王师败逋”，更是惨不忍睹。而吴三桂引狼入室，“至与之结盟而入寇”，其祸远比申侯为甚。“戎之所由来，非一日之故”，明末各种谣传蜂起，也远非“麋弧”之谣可比。最终不仅关中之地，就是中原大地，都让异族得以“整居其间”。顾炎武亲身经历的南明小朝廷，与周幽王、晋怀帝之世无异，故心有戚戚，对这首诗作了异乎寻常的阐发。文中指出“宣王中兴”，并不像史书说的那么可观，后人的赞美，未免言过其实。“书不尽言”，“是以论其世也”。讨论古人的时世，是为了鉴古知今，更清楚地了解当今国家社会的真情。古往今来，读《六月》诗的人不计其数，但有几人，能别有会心？如顾炎武，“岂非独见其情于意言之表者哉”？

## 夸 毗

“天之方儻<sup>[1]</sup>，无为夸毗。”《释训》曰<sup>[2]</sup>：“夸毗，体柔也。”《后汉书·崔骃传》注：“夸毗，谓佞人足恭<sup>[3]</sup>，善为进退<sup>[4]</sup>。”天下惟体柔之人，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sup>[5]</sup>。夏侯湛有云<sup>[6]</sup>：“居位者以善身为静，以寡交为慎，以弱断为重<sup>[7]</sup>，以怯言为信<sup>[8]</sup>。”《抵疑》<sup>[9]</sup>。白居易有云<sup>[10]</sup>：“以拱默保位者为明智<sup>[11]</sup>，以柔顺安身者为贤能，以直言危行为狂愚，以中立守道者为凝滞。故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sup>[12]</sup>。自国及家，寔而成俗。故父训其子曰：‘无介直以立仇敌<sup>[13]</sup>。’兄教其弟曰：‘无方正以贾悔尤。’且慎默积于中，则职事废于外；强毅

以“柔”开篇。下面谈世上、特别是官场，柔顺、巧佞之徒比比皆是，祸害国家。

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反谓率职而居正者<sup>[14]</sup>，不达于时宜；当官而行法者，不通于事变。是以殿最之文<sup>[15]</sup>，虽书而不实；黜陟之典<sup>[16]</sup>，虽备而不行。”《长庆集·策》。罗点有云<sup>[17]</sup>：“无所可否，则曰得体；与世浮沉，则曰有量。众皆默，己独言，则曰沽名；众皆浊，己独清，则曰立异。”《宋史》本传。观三子之言，其于末俗之敝，可谓恳切而详尽矣。至于佞谄日炽，刚克消亡<sup>[18]</sup>，朝多“沓沓”之流<sup>[19]</sup>，士保“容容”之福<sup>[20]</sup>。苟由其道，无变其俗，必将使一国之人皆化为“巧言令色孔壬”而后已<sup>[21]</sup>。然则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sup>[22]</sup>！乐天作《胡旋女》诗曰：“天宝季年<sup>[23]</sup>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sup>[24]</sup>。”是以屈原疾楚国之士，谓之“如脂如韦<sup>[25]</sup>”，而孔子亦云：“吾未见刚者<sup>[26]</sup>。”

以“刚”作结。因世上罕见刚强之人，故更让人期待，更值得提倡。

### 〔注释〕

[1]“天之方憯”二句：语出《诗经·大雅·板》。憯（qí），愤怒。夸毗（pí）：以谄谀、卑屈取媚于人。《毛传》：“夸毗，体柔人也。”孔颖达疏引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于人，曰体柔。”[2]释训：《尔雅》第三篇篇名。《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

解释词义的专著。孔颖达《毛诗正义·关雎》：“‘诂训传’者，注解之别名。毛以《尔雅》之作多为释《诗》，而篇有《释诂》《释训》，故依《尔雅》训而为《诗》立传。传者，传通其义也。《尔雅》所释十有九篇，独云诂、训者，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释言》则《释诂》之别，故《尔雅序篇》云：《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然则‘诂训’者，通古今之异辞，辨物之形貌，则解释之义尽归于此。” [3] 足恭：语出《论语·公冶长》。谓过分恭敬以取悦于人。 [4] 进退：指（为达到目的）或进或退、或取或舍的行为。 [5] 遗：留下。 [6] 夏侯湛：字孝若，谯国谯郡（今安徽亳州）人，西晋文学家。 [7] 弱断：缺乏担当，不肯明确作决断。 [8] 怯言：不轻易表示意见。 [9]《抵疑》：见《晋书·夏侯湛传》。 [10] 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唐代诗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 [11] 拱默：拱手缄默，无所作为。 [12] 执咎：敢于建言，不怕任过。《诗经·小雅·小旻》：“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郑玄笺：“谋事者众，汹汹满庭，而无敢决当是非，事若不成，谁云己当其咎责者？言小人争知而让过。” [13] 无介直以立仇敌：直，原作“真”，据《日知录集释》、《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三《策林二》改。 [14] 率职：奉行职事，尽职。举正，举，原作“居”，据《白氏长庆集》卷六十三《策林二》改。 [15] 殿最：古代对官员政绩或军功的考绩，下等称为“殿”，上等称为“最”。 [16] 黜陟：指官吏的升降。撤销官职为“黜”，提升官职为“陟”。 [17] 罗点：南宋崇仁县（今属江西）人。宁宗时签书枢密院事。 [18] 刚克：以刚强取胜。 [19] 沓沓：《孟子·离娄上》：“《诗》曰：‘天之方蹶，无然泄泄。’泄泄，犹沓沓也。事君无义，进退无礼，言则非先王之道者，犹沓沓也。”朱熹《孟子集注》：“泄泄，怠缓悦从

之貌。言天欲颠覆周室，群臣无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沓沓，即泄泄之意。” [20] 容容：《汉书·翟方进传》：“朕诚怪君，何持容容之计，无忠固意，将何以辅朕帅道群下？”颜师古注：“容容，随众上下也。” [21] 巧言令色孔壬：巧言令色，语出《论语·阳货》。令色，伪善、谄媚的脸色。孔壬，《尚书·虞书·皋陶谟》：“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帝尧之臣，因与共工、鲧一起作乱，被舜流放至崇山），何迁乎有苗（即三苗，古代部落名），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孔安国传：“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孔颖达疏：“巧言令色为甚佞之人。”《后汉书·郅恽传》：“昔虞舜辅尧，四罪（古代传说驩兜（欢兜）、共工、三苗、鲧合称为“四罪”）咸服，谗言弗庸（用），孔任不行，故能作股肱，帝用有歌。”李贤注：“孔，甚也；任，佞也。” [22] 阶：由来。 [23] 天宝季年：天宝末年。天宝，唐玄宗年号。 [24] 圆转：白居易《胡旋女》诗原作“圜转”，即旋转。胡旋舞是由西域康居传来的民间舞，为在跳舞时须快速不停地旋转而得名。 [25] 如脂如韦：语出屈原《卜居》。言像油脂一样光滑，像熟牛皮一样柔软，善于应付环境。 [26] 吾未见刚者：语出《论语·公冶长》。

### [ 点评 ]

传说老子的老师常枞得病，“老子往问焉，曰：‘先生疾甚矣，无遗教可以语诸弟子者乎？’常枞曰：‘子虽不问，吾将语子。’常枞……张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齿存乎？’老子曰：‘亡。’常枞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岂非以其柔耶？齿之亡也，岂非以其刚耶？’常枞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尽矣，无以复语子哉！’”（刘向《说苑·敬

慎》)《说苑》为笔记小说类的著作,未必真有其事,但老子重柔抑刚,则非虚言。“交易之道,刚者易折。惟有至阴至柔,方可纵横天下。天下柔弱者莫如水,然上善若水。”“柔弱胜刚强。”“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老子》)均堪称名言。老子的刚柔说,含有辩证思想,应具体分析。但老庄末流,确实将“柔顺”作为立身之本、养生之道、保身之术。以此,“强毅果断之心屈,畏忌因循之性成”;“朝寡敢言之士,庭鲜执咎之臣。自国及家,寢而成俗”;“佞谄日炽,刚克消亡”。就个人而言,可“苟全性命于乱世”,但对国家和民族,则“常足以遗民忧而召天祸”;“丧乱之所从生,岂不阶于夸毗之辈乎”?苏轼一针见血地指出:“士患不刚耳,长养成就,犹恐不足,当忧其太刚而惧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刚之罪。为此论者,鄙夫患失者也。”“所好夫刚者,非好其刚也,好其仁也。所恶夫佞者,非恶其佞也,恶其不仁也。”(《刚说》)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一味“柔”的结果,必然是“佞”。唯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刚者,才是真正的仁者。这正是本文的旨意。

## 鲁颂商颂<sup>[1]</sup>

《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sup>[2]</sup>，“述而不作”也<sup>[3]</sup>。“颂者<sup>[4]</sup>，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郑氏曰<sup>[5]</sup>：“襄公时，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之。”然春秋列国卿大夫赋诗，无及此四篇者<sup>[6]</sup>。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sup>[7]</sup>。《春秋》书“公”、书“郊禘<sup>[8]</sup>”，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sup>[9]</sup>”，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

<sup>[1]</sup> “六经皆然”，  
即六经皆史。

私心待圣人。世人读书如王介甫<sup>[10]</sup>，才入贡院，而一院之事皆欲纷更，《宋史·张方平传》。此最学者之大病也。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sup>[11]</sup>？大师陈之<sup>[12]</sup>，固曰“鲁诗”，不谓之《颂》矣。孔子，鲁人也，从鲁而谓之《颂》，此如鲁史之书“公”也。然而《泮水》之文<sup>[13]</sup>，则固曰鲁侯也。

商何以在鲁之后？曰：草庐吴氏尝言之矣<sup>[14]</sup>：“大师所职者，当代之诗也。商则先代之诗，故次之周、鲁之后。”《汲冢周书》“伊尹朝<sup>[15]</sup>，献《商书》”，附于《王会解》之后，即其例也。

#### [ 注释 ]

[1] 鲁颂商颂：《诗经》“三颂”，即《周颂》《鲁颂》《商颂》。《鲁颂》为歌颂鲁僖公的乐歌。《商颂》为歌颂商朝祖先的乐歌。 [2] 因：沿袭。 [3] 述而不作：语出《论语·述而》。谓只是阐述古人的学说而不表达自己的看法。 [4] “颂者”以下三句：《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言颂是赞美君主的大德并加以形容表现，将成功的消息告诉祖先的神灵。 [5] “郑氏曰”以下四句：《毛诗·鲁颂》：“《驹》，颂僖公也……鲁人尊之，于是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颂。”郑玄注：“季孙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鲁史也。”季孙行父，姬姓，季氏，谥文，史称季文子。在鲁国执国政三十三年，辅佐鲁宣公、

鲁成公、鲁襄公三代君主。史克，鲁国史官。《毛诗正义·鲁颂谱》孔颖达疏：“《驹》颂序云：‘史克作是颂。’广言作颂，不指《驹》篇，则四篇皆史克所作……故王肃云：当文公时，鲁贤臣季孙行父请于周，而令史克作颂四篇以祀。是肃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时，四篇皆史克所作也。” [6] 四篇：《鲁颂》共有《驹》《有骝》《泮水》《閟宫》四篇。 [7] 为下不倍：语出《礼记·中庸》。倍，同“背”。 [8] 《春秋》书“公”、书“郊禘”：孔子编订的《春秋》，是依据鲁国史官年、季、月、日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的著作。鲁国国君的封爵为侯，但《春秋》书鲁国国君，均称“公”。郊禘，古代帝王以祖先配祭昊天上帝。 [9] 其文则史：《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杻杙》，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10] “世人读书如王介甫”以下三句：《宋史·张方平传》：“王安石方用事，巍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时。守宋都日，富弼自亳（州）移汝（州），过见之曰：‘人固难知也。’方平曰：‘谓王安石乎？亦岂难知者！方平顷知皇祐（宋仁宗年号）贡举（古时地方官府向帝王荐举人才的科目），或称其文学，辟（授与官职）以考校（考查）。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纷更。方平恶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尝与语也。’”王介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思想家。宋神宗时任宰相，推行变法。封荆国公，世称王荆公。工诗文，名列“唐宋八大家”。贡院，古代乡试的考场，即开科取士的地方。 [11] 列国之《风》何以无鲁：《诗经·国风》十五篇，包括十五个诸侯国的乐歌，其中无《鲁风》。 [12] 大师：即太师，古代乐官之长。 [13] “然而《泮水》之文”二句：《诗经·鲁颂·泮水》：“思乐泮水，薄采其芹。鲁侯戾止，言观其旂。”鲁侯，指鲁僖公。 [14] 草庐吴氏：吴澄，字幼清，晚字伯清，学者称其为草庐先生，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乐安）人。元代理学家、经

学家。 [15]“《汲冢周书》‘伊尹朝’”以下三句：见《汲冢周书》卷七。

### [ 点评 ]

《诗经》三颂：《周颂》《鲁颂》《商颂》。周、商为天子国，鲁为诸侯国，将鲁置于周、商之列，看似并不匹配；论年代，商在周前，而反置于鲁之后，也不合常理。鲁何以独有颂？商何以在周之后？本文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前人认为孔子作《春秋》，含有微言大义，《诗经》是孔子删定的，是否也有所寄托？顾炎武认为：孔子所编《诗经》的次序，只是“因其旧文，‘述而不作’”，别无深意。这和列国之《风》无鲁，情况相同。至于周在商前，则因古代乐官的职守所致。“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如此平易的解释，不失为实事求是的通达之说。

不过本文引人注意的价值不仅在此。“六经皆史”，是中国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提起这四个字，人们首先想起的往往是晚于顾炎武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文史通义·易教上》）顾炎武认为：“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即六经皆史。当然，这也不是顾炎武首先提出。相传为隋代人王通所作的《文中子》，已“言圣人述史三焉，《书》《诗》《春秋》三者，同出于一”（《困学纪闻》卷八）。明代持这种看法的人更多，如王守仁言：“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传习

录》)王世贞言:“天地间无非史而已……《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艺苑卮言》)强调这一点,对理解顾炎武的治学思想,有特殊意义。他虽重经学,但并未将经籍神圣化、神秘化。在他的眼中,经籍同时也是记载历史事实的古籍。即以《日知录》论,其中经说很多是史说,如前面所录的《文侯之命》《大原》,便是明显的例子。他治经,常用经史互证之法,或通过史实阐明经义,或借助经文探讨史事,博及古今,探幽入微。朱一新甚至认为他“生平史学深于经学”(《无邪堂答问》)。

## 春秋阙疑之书

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sup>[1]</sup>。”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sup>[2]</sup>。《春秋》桓公十七年<sup>[3]</sup>：“冬十月朔<sup>[4]</sup>，日有食之<sup>[5]</sup>。”《传》曰<sup>[6]</sup>：“不书日，官失之也<sup>[7]</sup>。”僖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传》曰：“不书朔与日，官失之也。”以圣人之明，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岂难考历布算以补其阙<sup>[8]</sup>？而夫子不敢也，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sup>[9]</sup>？《左氏》之书<sup>[10]</sup>，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且

孔子不敢做的事，后人却敢做。非但敢做，如丰坊等人，还自以为得意，以此欺世惑人。顾炎武强调“多闻阙疑”，应了孟子一句话：“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春秋》<sup>[11]</sup>，鲁国之史也，即使历聘之余<sup>[12]</sup>，必闻其政，遂可以百二十国之宝书<sup>[13]</sup>，增入本国之记注乎<sup>[14]</sup>？成公十三年，“公会诸侯伐秦”下，《正义》曰<sup>[15]</sup>：“经文依史官策书，策书所无，故经文遂阙也。传文采于简牘<sup>[16]</sup>，简牘先有，故传文独存也。”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sup>[17]</sup>，旧史之所无也。曹大夫、宋大夫、司马、司城之不名者<sup>[18]</sup>，阙也。“齐崔氏出奔卫”<sup>[19]</sup>，去名而书族；“宋杀其大夫山”<sup>[20]</sup>，去族而书字，疑皆前史之阙。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sup>[21]</sup>，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从旧史之文也。邵氏曰<sup>[22]</sup>：“赴以卒则卒，赴以弑则弑。弑而赴以卒，其弑也传闻云尔也。传闻不胜简书，是以书‘卒’以待察也，比之疑狱。”《左氏》出于获麟之后<sup>[23]</sup>，网罗浩博，实夫子之所未见。乃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sup>[24]</sup>，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故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sup>[25]</sup>，而夫子之不能逆料者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sup>[26]</sup>，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

“今人学《春秋》之言，皆郢书燕说”。或者说，后人读经说经，都是“六经注我”。

《春秋》，因鲁史而修者也。《左氏传》，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故所书晋事，自文公主夏盟<sup>[27]</sup>，政交于中国，则以列国之史参之，而一从周正<sup>[28]</sup>；自惠公以前<sup>[29]</sup>，则间用夏正。其不出于一人明矣。其谓“赙仲子”为“子氏未薨”<sup>[30]</sup>，“平王崩”为“赴以庚戌”<sup>[31]</sup>，先壬戌十二日<sup>[32]</sup>。“陈侯鲍卒”为“再赴”<sup>[33]</sup>，似皆揣摩而为之说。

#### [ 注释 ]

[1] 吾犹及史之阙文也：语出《论语·卫灵公》，言我还能看到史书中已经散佚的文献。 [2] 益：增益，增加。 [3]《春秋》：我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相传为孔子编订。 [4] 朔：农历初一。每月此日，月球恰好运行到与太阳黄经相等的时刻，此时地面观测者看不到月面任何明亮的部分，这时的月相叫“朔”，又称新月。由于“朔”为一月之始，所以“朔”也引申出“初始”等义。 [5] 日有食之：即日食。 [6]《传》：指《左传》。 [7] 官：史官。 [8] 考历布算：根据历数研考，进行布筹运算。 [9] 史策：即史册。 [10]《左氏》之书：即《左传》。 [11]“且《春秋》”二句：《春秋》据鲁国史官的记载编订，是自鲁隐公至鲁哀公这段时期的鲁国国史。 [12] 历聘：历天下以求聘用。 [13] 百二十国之宝书：《春秋公羊传·隐公第一》徐彦疏：“闵因叙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九月经立……周史而言宝书者，宝者，保也，’

以其可世世传保以为戒，故云宝书也。’” [14] 记注：记录史实。 [15]《正义》：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 [16] 简牍：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写有文字的竹简与木牍的概称。用竹片写的书称“简策”，用木版写的叫“版牍”。 [17] 若乃改葬惠公之类不书者：《左传》隐公元年：“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鲁惠公立桓为太子，鲁隐公以摄政的名义，出于谦让，不敢以丧主的身份到场哭泣，故《春秋》不加记载。 [18] 不名：没有名字。 [19] “齐崔氏出奔卫”二句：语出《左传》宣公十年。书“崔氏”，有氏族，无名字。 [20] “宋杀其大夫山”二句：语出《左传》成公十五年。书“山”，有名字，无氏族。 [21] “郑伯髡顽、楚子麋、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以下三句：郑僖公，姬姓，郑氏，名恽，一名髡（k n）顽，春秋时期郑国君主，伯爵。因政见不合，被叔公公子驸所弑。《春秋经》襄公七年：“十有二月……郑伯髡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郟。”《左传》襄公七年：“郑僖公……将会于郟，子驸相，又不礼焉。侍者谏，不听，又谏，杀之。”楚子麋，楚愍王郑敖，名熊员（《左传》作“熊纆”），春秋时期楚国国君，子爵。被叔父、令尹公子围所弑。《春秋经》昭公元年：“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麋卒。”《左传》昭公元年：“十一月己酉，公子围至，入问王疾，缢而弑之。”齐悼公，姜姓，吕氏，名阳生。春秋时期齐国君主，侯爵。齐国大臣田乞立齐悼公，开田氏贵族专齐政的先河。被田乞之子田常指使人毒杀。《春秋经》哀公十年：“三月戊戌，齐侯阳生卒。”《左传》哀公十年：“齐人弑悼公，赴于师。”《春秋经》依据的是史官记录的简书，而《左传》依据的是社会的传闻。传闻不如简书正规，故孔子采用史官的记录。 [22] “邵氏曰”以下八句：赴，同“讣”。此指讣告。言《春秋经》据讣告书写，讣告言“卒”，《春秋》也书“卒”；讣告言“弑”，《春秋》也书“弑”。据说是“弑”，

但讣告言“卒”，那么“弑”只是传闻。传闻不能和公文相比，所以还是书“卒”，让此事作为一个疑案待考。 [23] 获麟：《史记·孔子世家》：“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祥。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曰：‘河（黄河）不出图，雒（洛水）不出书，吾已矣夫！’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春秋》至此搁笔。两年后，孔子去世。 [24] 曲为之说：作不合常理的解说。 [25] 郢书燕说：《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郢（楚国国都郢城）人有遗（寄给）燕相国书者，夜书，火不明，因谓持烛者曰：‘举烛。’云而过书‘举烛’。举烛，非书意也，燕相受书而说（悦）之，曰：‘举烛者，尚明也，尚明也者，举贤而任之。’燕相白（告诉）王，王大说，国以治。治则治矣，非书意也。今世举学者多似此类。”后用以指曲解了原文的意思，但也表达了另一种可取的看法。 [26] “多闻阙疑”二句：语出《论语·为政》。 [27] 文公主夏盟：文公，晋文公，姬姓，名重耳，春秋时期晋国君主。在位时文治武功卓著，成为春秋五霸中第二位霸主，开创了晋国长达百年的霸业。《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昔句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其是之谓乎？”杜预注：“晋为诸夏（中原）盟主。” [28] 周正：周历正月，即农历十一月。《史记·历书》：“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 [29] 惠公：名夷吾，晋文公之弟，春秋时期晋国君主。即位在晋文公之前。 [30] 其谓“赠仲子”为“子氏未薨”：《左传》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通“馈”，赠送）惠公（隐公父）、仲子（隐公同父异母弟桓公之母）之赠。缓，且子氏未薨，故名。”赠（fèng），古时送给丧家用于丧事的财物。因咺是下大夫级的宰夫，送礼品又送得太迟，没有赶上惠公的葬礼，而且当时仲子还没去世，故

直称其名。 [31] “平王崩”为“赴以庚戌”：《左传》隐公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书之。”周朝历法三月壬戌日，周平王去世。讣告上写作庚戌日，故《春秋》也记载死日为庚戌。 [32] 先壬戌十二日：壬戌日为二十四日，庚戌日为十二日，早了十二日。 [33] “陈侯鲍卒”为“再赴”：《左传》桓公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再赴也。”关于陈侯鲍的忌日，《春秋》记载了甲戌、己丑两个日子，这是因为陈侯病危时发生动乱，国内混乱，因此发了两次讣告。

### [ 点评 ]

“《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左传》成公十四年）“（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词。”（《史记·孔子世家》）“及夫子歿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刘歆《移书让太常博士》）提起《春秋》，人们就会想到“微言大义”“《春秋》笔法”。本文对此显示了不同的看法。文章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这八字展开论述。顾炎武认为：孔子编《春秋》，态度和方法都十分谨慎，对不清楚、无法确认的史料，宁可阙疑，也不敢草率记载。“况于史文之误而无从取正者乎？况于列国之事得之传闻、不登于史策者乎？”孔子采录史官的记载，不用传闻，也是因为不少传闻“皆揣摩而为之说”，不可靠。以此成为“春秋之信史”（《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由于所处环境的限制，孔子不可能掌握当时各国所有的史料，如“《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

史之所不书，则虽圣人有所不知焉者”。“后之儒者似谓已有此书，夫子据而笔削之。即《左氏》之解经，于所不合者亦多曲为之说，而经生之论遂以圣人所不知为讳。是以新说愈多，而是非靡定。”即使像孔子那样的“天纵之圣”，也不是全知全能的，应实事求是区分。如果为维护圣人的绝对权威而进行曲解，只会混淆是非，造成思想认识的混乱。文中举“郑伯髡顽、楚子麇、齐侯阳生之实弑而书‘卒’者”为例，说明孔子《春秋》和《左传》记载的区别，只是所依据的史料不同罢了，未必像后人认为的那样，都是在“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有人问陆九渊：“何不著书？”答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象山先生全集·语录》）自明以后，“我注六经”日益稀少，而“六经注我”之风则盛行于世。“六经注我”并非不可，但须建立在“我注六经”的基础之上。失去这个基础，自我作古，这不是提高，更不是发展，往往是信口妄言。这是治经，也是治学的大忌，是顾炎武毕生不懈批评的恶习。

关于《左传》的作者，汉代刘向、刘歆、班固等人认为出自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至唐、宋年间，学者开始怀疑《左传》并非左丘明所作，但并无确实的依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康有为出于宣扬托古改制思想的需要，断言《左传》乃西汉末年刘歆伪造。本文并未对此展开讨论，但在最后一段，根据《左传》自身的记载，指出“其不出于一人明矣”，不失为一种比较客观和通达的说法。

## 春秋言天之学

“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从疏、密之分，可见对《春秋》言天之说，不须作繁琐的、神秘化的解释。“中”即切合实事，言天是为了警戒人事。

天文五行之学<sup>[1]</sup>，愈疏则多中，愈密则愈多不中。春秋时言天者，不过本之分星<sup>[2]</sup>，合之五行，验之日食、星孛之类而已<sup>[3]</sup>。五纬之中<sup>[4]</sup>，但言岁星<sup>[5]</sup>，而余四星占不之及<sup>[6]</sup>，何其简也。邵子曰<sup>[7]</sup>：“五星之说，自甘公、石公始。”而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sup>[8]</sup>。扬子《法言》曰<sup>[9]</sup>：“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 [ 注释 ]

[1] 五行之学：《尚书·周书·洪范》：“五行：一曰水，二曰

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滋润），火曰炎上（燃烧），木曰曲直（弯曲，舒张），金曰从革（成分致密，善分割），土爰稼穡（意指播种收获）。”《孔子家语·五帝》篇中记载：“天有五行，水火金木土，分时化育，以成万物。”五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种系统观，古人用五行学说说明世界万物的形成及其相互关系，上观天文，下察地理。 [2] 分星：《周礼·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汉书·地理志》：“而保章氏掌天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视吉凶。” [3] 星孛（bèi）：古代对彗星的称呼。孛，光芒四射的彗星。《春秋》文公十四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4] 五纬：又称五星，古人对太白、岁星、辰星、荧惑、镇星这五颗星的合称（即金、木、水、火、土星）。五星与日、月合称七曜。 [5] 岁星：即木星。道教称之为福星。东周至汉朝使用“岁星纪年法”。 [6] 占不之及：占不及之。即不用于占卜。 [7] “邵子曰”以下三句：语出邵雍《皇极经世书·观物外篇下》。甘公，甘德。战国时齐国人。是世界上最古老星表的编制者和木卫三的最早发现者。著有《天文星占》八卷、《岁星经》等。石公，石申，又名石申父。战国中期魏国天文学、占星学家。是以其姓名命名月球背面的环形山的中国人之一。著有《天文》八卷（西汉以后此书被尊为《石氏星经》）等。后人将甘、石的天文学著作合称《甘石星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8] 爽：差失，不合。 [9] “扬子《法言》曰”以下三句：扬子，扬雄，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西汉时期辞赋家、思想家，著有《法言》《太玄》等。《法言》为扬雄模仿《论语》而作。《法言·五百》：“或问：‘圣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则史也何异？’曰：‘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

### [ 点评 ]

前面说过，顾炎武论《易》，有两个特色：一是强调其经世致用的功能，特别是对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指导作用。二是认为《易》本身并不复杂，“其实人人可用”，反对将《易》神秘化。这两点，同样体现在他对其他经籍的论述之中。如《春秋》，“其所详者，往往在于君、卿、大夫言语、动作、威仪之间，及人事之治乱敬怠。故其说也易知，而其验也不爽”。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天人合一”说，堪称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鲁国大旱，孔子认为：“邦大旱，毋乃失诸刑与德乎？”子贡补充道：“若夫正刑与德，以事上天，此是哉！”（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简《鲁邦大旱》）已开“天人感应”说的先声。在《春秋》三传中，有不少关于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记载。班固说：“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则《乾》《坤》之阴阳，效《洪范》之咎征，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汉书·五行志》）至汉，董仲舒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本文以扬雄“史以天占人，圣人以人占天”结束。这两句话，正是对《春秋》天人说的阐述，“以天占人”即通过观测天象卜知人事，“以人占天”即通过观察世相测知天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借助天意（天帝的意愿），是限制君权、遏制君王不适当的行为唯一有效（当然也很有限）的手段，有其积极意义，故应加以重视。

## 医 师

古之时庸医杀人<sup>[1]</sup>，今之时庸医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夫药有君臣<sup>[2]</sup>，人有强弱。有君臣，则用有多少；有强弱，则剂有半倍<sup>[3]</sup>。多则专，专则其效速<sup>[4]</sup>；倍则厚，厚则其力深。今之用药者，大抵杂泛而均停<sup>[5]</sup>，既见之不明<sup>[6]</sup>，而又治之不勇，病所以不能愈也。而世但以不杀人为贤，岂知古之上医不能无失<sup>[7]</sup>。《周礼·医师》：“岁终，稽其医事<sup>[8]</sup>，以制其食<sup>[9]</sup>。十全为上<sup>[10]</sup>；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十失三四，古人犹用之。而淳于意之对

唐代庸医直接杀人，明代庸医表面上不杀人，但也不能救活人，结果还是让人死，可谓间接杀人。

孝文<sup>[11]</sup>，尚谓“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易》曰：“裕父之蛊<sup>[12]</sup>，往见吝。”奈何独取夫“裕蛊”者，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呜呼，此张禹之所以亡汉<sup>[13]</sup>，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sup>[14]</sup>。朱文公《与刘子澄书》<sup>[15]</sup>，所论“四君子汤”，其意亦略似此。

《唐书》：许胤宗言<sup>[16]</sup>：“古之上医<sup>[17]</sup>，惟是别脉。脉既精别，然后识病。夫病之与药，有正相当者，惟须单用一味，直攻彼病，药力既纯，病即立愈。今人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譬之于猎，未知兔所，多发人马，空地遮围，冀有一人获之，术亦疏矣。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后汉书》：“华佗精于方药<sup>[18]</sup>，处齐不过数种。”夫《师》之六五<sup>[19]</sup>，任九二则吉，参以三、四则凶。是故官多则乱，将多则败，天下之事亦犹此矣。

医道和治国之道相通。

### [ 注释 ]

[1] 古之时庸医杀人：《旧唐书·张文仲传》：“大抵医药虽同，人性各异。庸医不达药之行使，冬夏失节，因此杀人。” [2] 药有君臣：《神农本草序》：“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摄。”徐

春甫《古今医统》：“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 [3]半倍：或一半，或加倍。 [4]专则其效速：据黄汝成《续刊误》补。 [5]均停：均匀妥帖，也指平板而少变化。 [6]“既见之不明”二句：言庸医既看不清病情，又不敢果断治病。 [7]上医：高明的医师。 [8]稽：考核。 [9]食：禄，俸禄。 [10]全：痊愈。 [11]“而淳于意之对孝文”二句：淳于意，西汉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人。精医道。曾任齐太仓令，史称仓公。孝文，西汉文帝。《史记·扁鹊仓公列传》：“问臣意：‘诊病决死生，能全无失乎？’臣意对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败逆者不可治，其顺者乃治之。心不精脉，所期死生视可治，时时失之，臣意不能全也。’” [12]“裕父之蛊”二句：语出《周易·蛊卦》。裕，宽容，姑息。蛊，事故。《序卦传》：“蛊者，事也。”言宽容父辈的弊病，必然会出事故，生悔吝（悔恨）之心。 [13]张禹之所以亡汉：张禹，字子文，河内轵县（今河南济源）人。西汉时期丞相。《汉书·张禹传》：“永始、元延之间，日蚀、地震尤数，吏民多上书言灾异之应，讥切王氏（太后王政君家族）专政所致。上（汉成帝）惧变异数见，意颇然之，而未有以明见，乃车驾至禹第（府宅），辟（屏除）左右，亲问禹以天变，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示禹。禹自见年老，子孙弱，又与曲阳侯（王根）不平，恐为所怨。禹则谓上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蚀三十余，地震五，或为诸侯相杀，或夷狄侵中国。灾变之异，深远难见，故圣人罕言命，不语怪神。性与天道，自子赣（孔子弟子）之属不得闻，何况浅见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政事以善应之，与下同其福喜，此经义也。新学小生，乱道误人，宜无信用，以经术断之。’上雅信爱禹，由此不疑王氏。后曲阳侯根及诸王子弟闻知禹言，皆喜说，遂亲就禹。”班固谓张禹等人“皆持禄保位，

被阿谀之讥”。李德裕直斥张禹“致汉室之亡，成王莽之篡，皆因禹而发，可谓汉之贼也，国之妖也。”（《张禹论》）[14] 李林甫之所以亡唐：李林甫，小字哥奴，陇西郡成纪县（今甘肃秦安）人。是唐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史称李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窥其际。好以甘言啖人，而阴中伤之，不露辞色”，“口有蜜，腹有剑”，“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安）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至卷二百一十六《唐纪》）。[15] “朱文公《与刘子澄书》”二句：罗大经《鹤林玉露》甲编：“周益公（周必大）参大政，朱文公（朱熹）《与刘子澄书》云：‘如今是大承气证，渠（他）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尔。’”中医方剂有大承气汤，为泻下剂，寒下，具有峻下热结之功效，主治阳明腑实证。四君子汤，中医方剂名，为补益剂，具有补气、益气健脾之功效，主治脾胃气虚证。[16] 许胤宗：常州义兴（今江苏宜兴）人，隋唐间医家，曾官尚药奉御等职。[17] “古之上医”以下二十五句：语出《新唐书·方技·许胤宗》传。相制，互相制约。差，同“瘥”，病痊愈。[18] “华佗精于方药”二句：语出《后汉书·方术列传下》。齐，方剂。[19] “夫《师》之六五”以下三句：《周易·师卦》：“六五：田有禽，利执言，无咎。长子帅师，弟子舆尸，贞凶。”“九二：在师中，吉，无咎；王三锡命。”“六三：师或舆尸，凶。”“六四：师左次，无咎。”

### [ 点评 ]

治病关键在对症下药，在如何用药。因此，首先得摸清病情，在此基础上决定用什么药，剂量多少。这是检验医德、医术的试金石。而庸医往往既乏医术，“见之

不明”，又亏医德，“治之不勇”，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肯承担风险，于是敷衍了事，“不杀人，亦不活人，使其人在不死不活之间”。由于“世但以不杀人为贤”，这样在表面上就推卸了自身该负的责任，而病人却因“其病日深而卒至于死”。但庸医依然心安理得，“以为其人虽死，而不出于我之为”，全无“吾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晋书·刘隗传》）的悔意。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欧阳修《醉翁亭记》）本文谈的是医道，针对的则是治国之道。庸医以此误人，奸臣、庸臣以此亡国，“张禹之所以亡汉，李林甫之所以亡唐也”。在顾炎武之前，张居正推行改革，后人赞道：“方明隆（隆庆，明穆宗年号）万（万历，明神宗年号）之际，明之政已弛矣。自世宗（嘉靖）西内静摄，君荒于上，臣纵于下，将嬉于边，士嚣于庠。纪纲万事，群堕于冥昧之中之中。而瓦解土崩之祸，将隐中于晏安无事之日。自非有雷霆之力不足以集上下涣散之孰，非有整齐严厉之法不足以其积久疲顽之习。”（潘博《张江陵书牒序》）当社会症结愈陷愈深之时，正需要张居正这样的人，大刀阔斧下重药，用“大承气汤”，但也有当政者出于各种顾虑，畏缩软弱，采用仅有调理作用的温和的“四君子汤”。朱熹对周必大为政不得力的感慨，也是顾炎武的感慨。文中还指出庸医用药的一个特点：“不能别脉，莫识病源，以情臆度，多安药味。”“假令一药偶然当病，他味相制，气势不行，所以难差，谅由于此。”而朝廷用人，多设官职，互相牵制，官场机构臃肿，互相扯皮，致使能者难以施展，和庸医用药，如出一辙。

## 乐 章<sup>[1]</sup>

《诗》三百篇，皆可以被之音而为乐<sup>[2]</sup>。自汉以下，乃以其所赋五言之属为“徒诗”<sup>[3]</sup>，而其协于音者<sup>[4]</sup>，则谓之“乐府”<sup>[5]</sup>。宋以下，则其所谓“乐府”者，亦但拟其辞，而与“徒诗”无别。于是乎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

开篇提出诗与乐的关系及其演变。后面七段，全是围绕这个主题，从音律、诗体、乐器等多方面展开的具体论述。

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古人必先有诗，而后以乐和之。舜命夔教胄子<sup>[6]</sup>：“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是以登歌在上，而堂上堂下之器应之，是之谓以乐从诗。宋国子丞王普言<sup>[7]</sup>：“古者既作诗<sup>[8]</sup>，从而歌之，然后以声律协和而成曲。

自历代至于本朝，雅乐皆先制乐章，而后成谱。崇宁以后，乃先制谱，后命辞，于是辞律不相谐协，且与俗乐无异。”朱子曰：“诗之作<sup>[9]</sup>，本言志而已。方其诗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乐也。以声依永，以律和声，则乐乃为诗而作，非诗为乐而作也。诗，出乎志者也；乐，出乎诗者也。诗者其本，而乐者其末也。”古之《诗》，大抵出于中原诸国，其人有先王之风，讽诵之教，其心和，其辞不侈<sup>[10]</sup>，而音节之间，往往合于自然之律。《楚辞》以下<sup>[11]</sup>，即已不必尽谐<sup>[12]</sup>。《文心雕龙》言《楚辞》“讹韵实繁<sup>[13]</sup>”。降及魏、晋，羌戎杂扰，方音递变<sup>[14]</sup>，南北各殊。故文人之作，多不可以协之音，而名为乐府，无以异于徒诗者矣。元稹言<sup>[15]</sup>：“乐府等题<sup>[16]</sup>，除《铙吹》《横吹》《郊祀》《清商》等词在乐志者，其余《木兰》《仲卿》《四愁》《七哀》之类，亦未必尽播于管弦也。”人有不纯，而五音十二律之传于古者<sup>[17]</sup>，至今不变，于是不得不以五音正人声，而谓之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

《汉书》：“武帝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sup>[18]</sup>，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夫曰“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是

以诗从乐也。后代乐章皆然。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sup>[19]</sup>，《郊祀歌》十九章，皆郊庙之正乐<sup>[20]</sup>，如三百篇之《颂》。其他诸诗，所谓“赵、代、秦、楚之讴<sup>[21]</sup>”，如列国之《风》<sup>[22]</sup>。

“十九章”，司马相如等所作，“略论律吕，以合八音”者也。“赵、代、秦、楚之讴”，则有协有否。“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sup>[23]</sup>”，采其可协者以被之音也。

乐府中如《清商》《清角》之类<sup>[24]</sup>，以声名其诗也。如《小垂手》《大垂手》之类<sup>[25]</sup>，以舞名其诗也。以声名者，必合于声；以舞名者，必合于舞。至唐而舞亡矣，至宋而声亡矣，于是乎文章之传盛，而声音之用微，然后徒诗兴而乐废矣。

歌者为诗，击者、拊者、吹者为器<sup>[26]</sup>，合而言之谓之乐。对诗而言，则所谓乐者八音，“兴于诗<sup>[27]</sup>，立于礼，成于乐”是也，分诗与乐言之也。专举乐，则诗在其中。“吾自卫反鲁<sup>[28]</sup>，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也，合诗与

乐言之也。

《乡饮酒礼》<sup>[29]</sup>：“工四人，二瑟。”注<sup>[30]</sup>：“二瑟，二人鼓瑟，则二人歌也。”古人琴瑟之用，皆与歌并奏，故有一人歌、一人鼓瑟者。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sup>[31]</sup>，上自倚瑟而歌”是也。师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亦有自鼓而自歌，孔子之“取瑟而歌”是也<sup>[32]</sup>。若乃卫灵公听新声于濮水之上<sup>[33]</sup>，而使师延写之，则但有曲而无歌，此后世“徒琴”之所由兴也。

言诗者大率以声音为末艺<sup>[34]</sup>，不知古人入学，自六艺始<sup>[35]</sup>，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sup>[36]</sup>。后人之学好高，以此为瞽师、乐工之事<sup>[37]</sup>，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两京<sup>[38]</sup>，两京之音不存于六代<sup>[39]</sup>，而声音之学，遂为当今之绝艺。

“七月流火<sup>[40]</sup>”，天文也。“相其阴阳<sup>[41]</sup>”，地理也。“四矢反兮<sup>[42]</sup>”，射也。“两骖如舞<sup>[43]</sup>”，御也。“止戈为武<sup>[44]</sup>”“皿虫为蛊<sup>[45]</sup>”，书也。“千乘三去<sup>[46]</sup>”“亥有二首六身<sup>[47]</sup>”，数也。古之时人人知之，而今日遂为绝学。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

对乐的认识和态度，也是对“艺”的认识和态度。

空疏也。

### [ 注释 ]

[1] 乐章：能配乐的诗。后亦泛指能入乐的诗词。 [2] 被：加，施加。 [3] 徒诗：不入乐的诗。徒，只，仅仅。 [4] 协：调和，和谐。 [5] 乐府：秦代以来朝廷设立的管理音乐的机构，汉武帝用来训练乐工、制定乐谱和采集歌词，其中采集了大量民歌。后“乐府”成为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体名称。 [6] “舜命夔教胄子”以下五句：语出《尚书·虞书·尧典》。夔，上古帝舜时的乐官。胄子，帝王或卿大夫的长子。永，通“咏”。依一定的腔调缓慢地诵吟。律，乐律，即音律，指音乐上的律吕、宫调等。 [7] 王普：字伯照，闽县（在今福建福州）人。宋高宗绍兴年间官国子丞。精律历。 [8] “古者既作诗”以下十一句：语出《宋史·乐志五》。雅乐，雅，正。雅乐即典雅纯正的音乐，是古代传统的宫廷音乐，帝王朝贺、祭祀天地等大典时所用。崇宁，宋徽宗年号。 [9] “诗之作”以下十六句：语出朱熹《答陈体仁》。 [10] 侈：夸张，过分。 [11] 《楚辞》：相传为屈原开创的一种新文体。以其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代表作品有屈原《离骚》《九歌》《九章》、宋玉《九辩》等。 [12] 谐：协调。 [13] 《文心雕龙》言《楚辞》“讹韵实繁”：《文心雕龙》，南朝梁刘勰撰。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声律》：“《楚辞》辞楚（用楚音作辞），故讹韵实繁。”讹韵，错乱的音韵。 [14] 方音：指方言特有的音调。 [15] 元稹：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北魏宗室鲜卑拓跋部后裔。唐宪宗元和间一度任宰相。与白居易同科及第，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诗称“元和体”。 [16] “乐府等题”以下四句：语出元稹《乐

府古题序》。《饶吹》，指《鼓吹曲辞》。饶吹，即饶歌。军中乐歌，所用乐器有笛、觱篥、箫、笳、铙、鼓等，为鼓吹乐的一部。《横吹》，《横吹曲辞》。横吹，乐器名。即横笛，又名短箫。《郊祀》，《郊庙歌辞》。郊祀，古代君王在一年中某些重要的时日，带领三公九卿等诸大臣依据礼法于国都郊外祭祀上天，为百姓和国家祈福的一种祭祀活动。《清商》，《清商曲辞》。清商，清商乐，又称清商曲，隋唐时简称清乐。是三国、六朝时占主导地位的一种传统音乐。乐志，旧时纪传体史书中有《乐志（书）》，用以综述音乐发展沿革及相关典章制度。《木兰》，《木兰诗》，南北朝时北朝民歌，宋郭茂倩《乐府诗集》归入《横吹曲辞·梁鼓角横吹曲》中。是一首长篇叙事诗。《仲卿》，《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又名《孔雀东南飞》，是中国文学史上最长的叙事诗，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四愁》，东汉张衡作。对后世七言诗的发展有很大影响。《七哀》，汉末及三国魏诗人王粲、曹植均有《七哀诗》。管弦，管乐器与弦乐器，泛指乐器，也指管弦乐。 [17] 五音十二律：古代的定音方法。五音，即宫、商、角、徵、羽。十二律，即用三分损益法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同的半音的一种律制。各律从低到高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 [18] “武帝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以下五句：武帝，汉武帝刘彻。在位时颇有作为，后世褒贬不一。律吕，古代乐律的统称。又称十二律，可分为六律（六阳律）、六吕（六阴律）。是有一定音高标准和相应名称的中国音律体系。八音，古代有八种制造乐器的材料，通常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不同质材。也用以泛指音乐。“十九章之歌”，指《郊祀歌》十九章。汉武帝郊祀时所用的乐歌。 [19] 《安世房中歌》十七章：相传为汉初唐山夫人所作。 [20] 正乐：雅正的音乐。 [21] 赵、代、秦、楚之讴：《汉

书·礼乐志》：“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讴，歌。 [22] 列国之《风》：指《诗经》中的《国风》。 [23]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语出《汉书·礼乐志》。李延年，汉武帝宠妃李夫人之兄。世代为倡。因擅长音律，故颇得武帝宠爱，封协律都尉（为诗谱乐的乐官）。 [24] 《清角》：雅曲名。“清”指升高半音，清角指的是比角音高半音的音。如：若 mi 是角音，清角就是 fa。 [25] 《小垂手》《大垂手》：均为舞名。梁简文帝萧纲诗《赋乐府得大垂手》：“垂手忽茗茗，飞燕掌中娇。罗衣恣风引，轻带任情摇。诘似长沙地，促舞不回腰。”《小垂手》：“舞女出西秦，蹑影舞阳春。且复小垂手，广袖拂红尘。折腰应两笛，顿足转双巾。蛾眉与曼脸，见此空愁人。”刘歆《西京杂记》：“（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郭茂倩《乐府解题》：“《大垂手》《小垂手》，皆言舞而垂其手也。”陈良运《歌以咏言，舞以尽意——中国古代舞蹈美之窥探》：“所谓‘大垂手’，双手下垂仅随身而动，独显窈窕身段舞动之美，以‘罗衫’‘轻带’之‘引’与‘摇’，表现舞者含情脉脉之态。‘小垂手’即手小有所动，‘广袖拂红尘’，以微动之手拂动长袖而生风。也‘折腰’，也‘顿足’，但不失温婉娴静之美。” [26] 拊：拍。《尚书·虞书·尧典》有夔“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之说。 [27] “兴于诗”以下三句：语出《论语·泰伯》。 [28] “吾自卫反鲁”以下三句：语出《论语·子罕》。 [29] 《乡饮酒礼》：《仪礼》篇名。 [30] 注：指郑玄注。 [31] “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二句：见《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 [32] 孔子之“取瑟而歌”：《论语·阳货》：“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传话的人）出户，取瑟而歌，使之（孺悲）闻之。” [33] “若乃卫灵公听新声于濮水之上”二句：《史记·乐书》：“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于濮水之上舍。夜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涓曰：‘吾闻鼓

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听而写之。”卫灵公，姬姓，名元，春秋时期卫国君主。新声，新作的流行乐曲。濮水，古代水名。是流经古菏泽（在今山东）区域的一条河流。师延，上古时期的神话人物。黄帝时为司乐之官。后世以其为中华民族第一位乐神宗祖。此应为“师涓”。师涓，春秋时期卫国音乐家，以善弹琴著称。 [34]末艺：小技艺。 [35]六艺：《周礼·地官·司徒》：“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时要求学生掌握的六种基本才能：礼（礼节）、乐（音乐）、射（射箭）、御（驾驶马车）、书（书法）、数（术数，计算、数学的技术）。 [36]孔子以“游艺”为学之成：《论语·述而》：“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37]瞽师：盲乐师。 [38]两京：西汉京城在长安，东汉京城在洛阳，合称两京，借指两汉。 [39]六代：即六朝（吴、东晋、宋、齐、梁、陈）。 [40]七月流火：语出《诗经·豳风·七月》。火（古读hu），或称大火，星名，即心宿。流，流动。每年夏历五月黄昏时候，这星当正南方，在正中和最高的位置。过了六月就偏西向下了，故谓之“流”。 [41]相其阴阳：语出《诗经·大雅·公刘》。为观察山的北面（阴）和南面（阳）。 [42]四矢反兮：语出《诗经·齐风·猗嗟》。朱熹《诗集传》：“四矢，射礼每发四矢。反，复也，中皆得其故处也。”言射出的四支箭都中靶心。 [43]两骖如舞：语出《诗经·郑风·大叔于田》。骖（cān），驾车的四马中外侧两边的马。 [44]止戈为武：语出《左传》宣公十二年。言“止”“戈”二字合成一个“武”字。 [45]皿虫为蛊：语出《左传》昭公元年。言器皿中的毒虫即蛊。 [46]千乘三去：语出《左传》僖公十五年。言三次驱除一千辆兵车。 [47]亥有二首六身：语出《左传》襄公三十年。言“亥”字是“二”字头、“六”字身。

## [ 点评 ]

本文所论，是诗与乐的关系。顾炎武继承了王普、朱熹等宋代学者的看法，认为诗先于乐。“古人以乐从诗，今人以诗从乐”，“以诗从乐，非古也，后世之失，不得已而为之也”。这里有两层意思：按诗乐的本原而言，诗先于乐；乐理应依附诗，诗依附乐是不得已而为之，即本不该有的事。这不是说乐不重要，恰恰相反，在此强调的是：诗不能离开乐，有诗应有乐，或者说：有诗必有乐，诗乐不可分。“诗之与乐判然为二，不特乐亡，而诗亦亡。”顾炎武的前辈学者陈策说：“《诗经》三百篇，诗之祖，亦韵之祖也。”（《毛诗古音考序》）也许还可加一句：“《诗经》三百篇，亦乐之祖也。”“凡音者，生于人心者也；乐者，通伦理者也……是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礼记·乐记》）顾炎武强调诗乐合一，其实也是重视在乐诗中表现的伦理意义。

“乐”为“六艺”之一。最后两段论“学”与“艺”的关系。古人常将“技”“艺”二字关联，视“艺”为“技”，而又将“技”和“学”分割，雕虫小技，为博雅君子所不屑为。“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论语·子张》）“小道”即小技。《论语》虽载此言，只是出自子夏之口，其实孔子很重视“艺”，且“以‘游艺’为学之成”。“古人入学，自六艺始。”“六艺”之教，起于西周，乃“养国子以道”（《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世传《周礼》为周公所作，居“三礼”之首。而周公正是儒学先驱，孔子终身仰慕的

榜样。“学”和“艺”并不对立，而需兼顾。人该掌握的，不仅是理论知识，还有实践技能。那些轻视技艺，“且曰‘艺而已矣，不知之无害也’。此近代之儒，所以自文其空疏也”。

国家图书馆

## 爱百姓故刑罚中<sup>[1]</sup>

“不忍”之心，即孟子所说的“恻隐之心”，即爱民之心。

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sup>[2]</sup>。古之王者，不忍以刑穷天下之民也，是故一家之中，父兄治之；一族之间，宗子治之<sup>[3]</sup>。其有不善之萌，莫不自化于闺门之内<sup>[4]</sup>；而犹有不帅教者<sup>[5]</sup>，然后归之士师<sup>[6]</sup>。然则人君之所治者约矣<sup>[7]</sup>。然后“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sup>[8]</sup>，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夫然，刑罚焉得而不中乎？是故宗法立而刑清。天下之宗子各治其族，以辅人君之治，“罔攸兼于庶狱”<sup>[9]</sup>，而民自不犯于有司<sup>[10]</sup>。风俗

之醇，科条之简<sup>[11]</sup>，有自来矣。《诗》曰：“君之宗之<sup>[12]</sup>。”吾是以知宗子之次于君道也。

### [ 注释 ]

[1] 爱百姓故刑罚中：《礼记·大传》：“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中，公正，公平。 [2] 刑措：也作“刑错”“刑厝”。置刑法而不用。措，安放。 [3] 宗子：指大宗的嫡长子，也指族长。 [4] 闺门：古代称内室的门。也指家门、城门。 [5] 帅：遵循。 [6] 士师：《周礼》列为秋官司寇之属官，掌禁令、狱讼、刑罚之事。用作对执法官员的通称。 [7] 约：简约。 [8] “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以下三句：语出《礼记·王制》。为司寇“听五刑之讼”的前提。权，权衡。意论，考虑。浅深，郑玄注：“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尽。致，给予，奉献。意谓：凡审理判决案件，一定要从体谅父子亲情、确立君臣大义的角度进行权衡；要考虑罪犯罪情节的轻重程度，谨慎地分析作案动机之间的不同，区别对待；要竭尽自己的才智，奉献自己的忠恕仁爱之心，彻底了解案情。 [9] 罔攸兼于庶狱：《尚书·周书·立政》：“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罔，无，没有。攸，语助词。兼，兼管。庶，众多，各种。言，谓民众申诉之言。狱，狱讼案件。谓文王没有兼管众多申诉事项，众多狱讼案件，众多该谨慎处理的事，只由主管官员决定可否。对这些具体的事情，文王并不过问。 [10] 有司：主管某部门的官吏，也用于泛指官吏。 [11] 科

条：指法令条文。 [12] 君之宗之：语出《诗经·大雅·公刘》。为之君（君主），为之宗（族主）。

### [ 点评 ]

人们常说“法律无情”，但也有人认为“法律不外乎人情”，法国文豪雨果说“普遍的良心是法律的基础”（《九三年》）。本文所言，正是法与情之间的关系。由于所处时代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的差异，顾炎武不可能具有雨果那样的思想，但在执法必须考虑人情这点上，则有自己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执法者除了智慧，还须具有足够的爱心，只有这样，在审案时才能体谅人情，考虑情节轻重、动机差异，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刑罚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公正。程晋芳说“亭林生于明末，目击宽弛之弊，思以严厉矫之，说近申韩，几不自觉”（《勉行堂文集·正学论五》）。从本文看，说得有些片面。

文中提出“独治”和“众治”的区别，前者“刑繁”，后者“刑措”，“刑繁”则伤害百姓，“刑措”则百姓安宁。“众治”并非今人所理解的民主思想，主要指旧时宗法社会的社会管理。顾炎武无疑主张后者，具体的措置则是分朝廷之权，交给社会，一起承担教化百姓的责任。由于社会的力量无所不在，就能将罪恶遏制在萌芽状态，从而产生民风淳朴、刑法简约的效果。

## 庶民安故财用足<sup>[1]</sup>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贫有富。贫者至于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嗇之计，于是乎有争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贫而患不均<sup>[2]</sup>。”夫惟“收族”之法行<sup>[3]</sup>，而岁时有“合食”之恩<sup>[4]</sup>，吉凶有“通财”之义<sup>[5]</sup>。“本俗六安万民<sup>[6]</sup>”，“三曰联兄弟”，而“乡三物”之所兴者<sup>[7]</sup>，“六行”之条，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矜寡、孤独、废疾者<sup>[8]</sup>，皆有所养”矣。此所谓“均无贫”者，而财用有不足乎？至于《葛藟》之刺兴<sup>[9]</sup>，《角弓》之赋作<sup>[10]</sup>，“九族乃离<sup>[11]</sup>”，一方相怨<sup>[12]</sup>，而瓶罍交耻<sup>[13]</sup>，泉池并

去“争心”需要“均贫富”，“均贫富”有赖“曰睦曰恤”之行，如此就能“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而不愁财用不足——这就是本文的思路。

竭<sup>[14]</sup>，然后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sup>[15]</sup>，为周且豫矣<sup>[16]</sup>。宋范文正公苏州义田<sup>[17]</sup>，至今裔孙犹守其法<sup>[18]</sup>。范氏无穷人。

### [ 注释 ]

[1]庶民安故财用足：语出《礼记·大传》。 [2]不患贫而患不均：语出《论语·季氏》。 [3]收族：陈澧《礼记集说》：“收，不离散也。宗道既尊，故族无离散。”《仪礼·丧服》：“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绝。”郑玄注：“收族者，谓别亲疏，序昭穆。”谓以上下尊卑、亲疏远近之序团结族人。 [4]合食：指合祭，同炊。《公羊传》文公二年：“其合祭奈何？毁庙（亲过高祖者移神主于太庙之称）之主，陈于大（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 [5]通财：流通财货或朋友间互通财物。《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颁职事十有二于邦国、都鄙。使以登万民……六曰通财。” [6]“本俗六安万民”二句：语出《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本俗”上有“以”字。本俗，传统习俗。 [7]“而‘乡三物’之所兴者”以下三句：《周礼·地官司徒·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乡，本土。 [8]“矜寡、孤独、废疾者”二句：语出《礼记·礼运》。矜（gu n）寡，犹鳏寡，孤苦的老人。矜，通“鳏”。废疾，残疾。 [9]《葛藟（l i）》之刺兴：《葛藟》，《诗经·王风》篇名。葛藟，藤类蔓生植物，即野葡萄。《毛诗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朱熹《诗集传》：“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并谓此诗每章前二句如“绵绵葛藟，在河之浒”，都用“兴”的手法。前人归纳出《诗经》中三种主要表现手法，即赋、比、

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诗集传》）。兴，以其他事物为发端，引起所要歌咏的内容。与诗歌内容有一定联系。 [10]《角弓》之赋作：《角弓》，《诗经·小雅》篇名。角弓，用角装饰的弓。《毛诗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亲九族而好谗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诗也。” [11]九族乃离：语出《尚书·商书·仲虺之诰》。九族，自高祖至玄孙九代族人。 [12]一方相怨：《诗经·小雅·角弓》：“民之无良，相怨一方。”言互相埋怨者都站在自己这一边的立场责怪对方（而不肯反思自己有什么问题）。 [13]瓶罍（léi）交耻：《诗经·小雅·蓼莪》：“瓶之罄（尽）矣，维罍之耻。”瓶，汲水器具。言瓶中无水，罍也会因此感到羞耻。罍：盛水器具。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存，彼此利害一致。 [14]泉池并竭：《诗经·大雅·召旻》：“池之竭矣，不云自频。泉之竭矣，不云自中。”《诗集传》：“频，崖。”“池，水之钟也。泉，水之发也。故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由内之不出。言祸乱有所从起，而今不云然也。”这里说泉水断流，池水就会枯竭。同样比喻关系密切，相互依存，彼此利害一致。 [15]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荀子·礼论》：“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言供养人的欲望，满足人的需求。 [16]周且豫：豫：同“预”。言预先考虑周到。 [17]宋范文正公苏州义田：范文正公，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邠州（治所在今陕西彬州），后移居苏州吴县（今属江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宋仁宗皇祐元年，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成立范氏义庄。“范文正公，苏人也。平生好施与，择其亲而贫，疏而贤者，咸施之。方贵显时，置负郭（靠近城郭）常稔（庄稼成熟）之田千亩，号曰义田，以养济群族之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钱公辅《义田记》） [18]裔孙：相隔久远的子孙。

## [ 点评 ]

本文紧接前篇，就治国安民的大政继续进行探讨。前篇谈执法，如何管理百姓；本文谈民生，如何养育百姓，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的安定。孔子有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无论是一国还是一家，不怕财富少，就怕分配不平均；不怕人口少，就怕社会不太平。若是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和睦，就不在乎人多少；社会太平，就不会有被推翻的危险。这就是说：由分配不均带来的贫富不等，是激起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造成社会不安的根源。为富不仁，无同情心，以此产生矛盾、斗争。对此，前人已做过不少努力，如周代的“收族”之法、“合食”之恩、“通财”之义，宋代的“义庄”等，使孤苦残疾之人获得生计。文中将“均贫富”作为“养人之欲而给人之求”的主要措施，而其实施，则有赖富者、强者的慈善、体恤之心。这和墨子的“兼爱”思想、孟子的“恻隐之心”“可以为善”说，一脉相承。“大笑猗氏辈，为富皆不仁。”（皮日休《偶书》）虽然文中已提出“瓶罍交耻，泉池并竭”这样的警告，伤害别人最后也会伤害自己，只是世上的富人，大多缺乏慈善之心，更不具备“兼爱”的思想，而“常恐人之有求，而多为吝啬之计”的人，却比比皆是，致使矛盾日益激化，社会始终不得安宁。不过在当时，顾炎武确实也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更好的办法。

## 致 知

“致知”者<sup>[1]</sup>，“知止”也。董文清槐以“知止”二节合“听讼章”为《格物传》<sup>[2]</sup>。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sup>[3]</sup>，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sup>[4]</sup>。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sup>[5]</sup>，威仪三千”，是之谓物。

《诗》曰：“天生烝民<sup>[6]</sup>，有物有则。”《孟子》曰：“舜明于庶物<sup>[7]</sup>，察于人伦。”昔者武王之访<sup>[8]</sup>，箕子之陈；曾子、子游之问<sup>[9]</sup>，孔子之答，皆是物也。故曰“万物皆备于我矣<sup>[10]</sup>”。

惟君子为能体天下之物<sup>[11]</sup>，故《易》曰：“君

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sup>[12]</sup>。”《记》曰：“仁人不过乎物<sup>[13]</sup>，孝子不过乎物。”

“格物”为“致知”的前提。谈“致知”，不能离开“格物”。

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sup>[14]</sup>。“知者无不知也<sup>[15]</sup>，当务之为急。”

“听讼”者<sup>[16]</sup>，“与国人交”之一事也。

### [ 注释 ]

[1] “‘致知’者”二句：《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研究、认识）。物格而后知至。”“知止而后有定。”朱熹《大学章句》：“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致知，获取完善的知识。格物，穷究世间万物的原理。知止，立志达到至善的境地。 [2] 董文清槐以“知止”二节合“听讼章”为《格物传》：董槐，字庭植，号槩堂，濠州定远（今属安徽）人。南宋理宗宝祐年间任右相兼枢密使。谥号文清。著有《大学记》，已佚。黄震《黄氏日钞·读礼记》：“辛酉岁见《董丞相槐行实》载此章，谓经本无阙文，此特错简之厘正未尽者耳。首章‘明德’‘新民’‘至善’三句纲领之下，即继以‘欲明明德’以下条目八事之详，此经也。自‘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此谓‘知本’。‘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右正系释致知在格物，不待别补，今错在首章三句之下耳。” [3] “为人君止于仁”以下五句：语出《礼记·大学》。 [4] 知至：“物格而后知至。”谓通过格物获得知识。 [5] “礼仪三百”二句：语出

《礼记·中庸》。《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郑玄注：“经礼谓《周礼》也。《周礼》六篇，其官有三百六十。曲犹事也，事礼谓今《礼》（指《仪礼》）也。”孔颖达沿袭此说。朱熹说：“经礼三百，便是《仪礼》中士冠、诸侯冠、天子冠礼之类，此是大节，有三百条。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齐’之类，皆是其中之小目，便有三千条。或有变礼，亦是小目。”（《朱子语类·礼四》）[6]“天生烝民”二句：语出《诗经·大雅·烝民》。烝（zhēng），众。烝民，即庶民，是先秦对“百姓”的称呼。物，形体。则，准则。谓人既有外在的形体，又有内在的准则。[7]“舜明于庶物”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下》。庶物，众物，万物。[8]“昔者武王之访”二句：《尚书·周书·洪范》：“惟十有三祀（祀即年。指周文王建国后的第十三年，也是周武王灭商后的第二年），王访于箕子……箕子乃言曰……”箕子所陈，即《洪范》篇。[9]“曾子、子游之问”二句：见《礼记·曾子问》《礼记·檀弓》。[10]万物皆备于我矣：语出《孟子·尽心上》。言在我的身上具备万物之理。[11]惟君子为能体天下之物：张载《正蒙·大心》：“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体，体察。[12]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语出《周易·家人卦》。言有物，说话诚实。行有恒，行为端正，恒久不变。[13]“仁人不过乎物”二句：语出《礼记·哀公问》。不过乎物，不逾越事（物）理。[14]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语出《论语·阳货》。[15]“知者无不知也”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上》。当务，眼前该做的事。[16]听讼：《论语·颜渊》：“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又见《礼记·大学》。言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重、必要的是不让诉讼的案件发生。

### [ 点评 ]

《大学》提出的“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

善)和“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格物致知”既是人认识世界、获取知识的首要途经,也是人治理国家、改造社会的认知基础。尽管自汉以来,谈论“格物致知”的不乏其人,但众说纷纭,迄无定论。与顾炎武同时的刘宗周说:“格物之说,古今聚讼有七十二家。”(《大学杂言》)宋明理学家都喜说“格物致知”,朱熹重在穷理,王守仁重在正心。本文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将“致知在格物”径直解为“‘致知’者,‘知止’也”,“知止,然后谓之知至”。格物是穷究世间万物的道理;以此致知,获取各方面的知识;进而知止,达到至善的境地。如此,才算掌握了完美的知识,才是一个完善的认知过程,才能体现“万物皆备于我”的真谛。既不离物,也不离心。因此,只是着眼于外物是不够的,“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未矣”;仅仅关注内心也不行,“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顾炎武既重穷理,也重正心,而最终都应落实到“当务之急”上。什么是当务之急?就是他念念不忘的“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与黄太冲书》)。

“‘听讼’者,‘与国人交’之一事也。”“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与国人交,止于信。”(《礼记·大学》)审理案件,既然是人与人交往中的一事,当然也得以信为本。这“信”,就是公平、公正。这就需要“格物”,了解实情;以此“致知”,有正确无误的判断。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公平、公正。这也是“当务之急”中的一事。

##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sup>[1]</sup>

治化之隆，则“遗秉”“滞穗”之利及于寡妇<sup>[2]</sup>；恩情之薄，则“糲鉏”“箕帚”之色加于父母<sup>[3]</sup>。故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敛之臣<sup>[4]</sup>”，则财足而化行。“人人亲其亲<sup>[5]</sup>，长其长，而天下平”矣。

即“仓廩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之意。

### [ 注释 ]

[1]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礼记·大学》：“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 [2] 则“遗秉”“滞穗”之利及于寡妇：《诗经·小雅·大田》：“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秉，把，指捆成束一把把的谷穗。滞，遗留。伊，是。言那里、这里，都有一把把留下的谷穗，这些听任孤寡妇女取走，对她们生活有利。 [3] 则“糲鉏”“箕帚”之色加于父母：贾谊《治安策》：“商君（商鞅）遗礼

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年，秦俗日败……借父耰耜，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耰（y u），古代弄碎土块，平整土地用的农具。耜，同“锄”。言儿子将农具借给父亲，脸上会露出恩赐的表情；婆婆用了媳妇的畚箕扫帚，媳妇立马口出恶言。 [4] 不畜聚敛之臣：《礼记·大学》：“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畜，收养。 [5] “人人亲其亲”以下三句：语出《孟子·离娄上》。

### [ 点评 ]

汉代民谣：“吴王好剑客，百姓多创瘢。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资治通鉴·汉纪三十八》）作为万众仰望的帝王，必然也是社会的表率。民风淳厚或浇薄，是朝政清明或昏暴的对应。朝廷若能心系百姓，关注民瘼，而不是逞意妄为，唯利是图，国家必然富强，社会就会安宁。但本文的认识不仅于此。顾炎武认为：自古以来，从未见过人力物力匮乏而能立国的。要提升百姓素质，美化社会风俗，拯救道德颓败，改变“世变日新，人情弥险”的状况，根本在改善百姓的生活。因此，首先要做的是增加社会财富，而关键则在懂得生财之道。“欲使民兴孝兴弟，莫急于生财。”

## 朝闻道夕死可矣<sup>[1]</sup>

“有弗学<sup>[2]</sup>，学之弗能，弗措也。有弗问，问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sup>[3]</sup>，俛焉日有孳孳，毙而后已。”故曰：“朝闻道，夕死可矣。”

“吾见其进也<sup>[4]</sup>，未见其止也。”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

诸葛亮的名言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即本于此。

### [ 注释 ]

[1] 朝闻道夕死可矣：语出《论语·里仁》。 [2] “有弗学”以下十五句：语出《礼记·中庸》。弗，不。措，放置。言要么不学（问，思，辨，行），学了没有学会，绝不罢休。 [3] “不知年数之不足也”以下三句：语出《礼记·表記》。俛，同“俯”。 [4] “吾

见其进也”二句：语出《论语·子罕》。

[ 点评 ]

“朝闻道，夕死可矣”，体现了为追求真理献身的精神。但本文的旨意，主要在不懈的追求、不断的进取。“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这是孔子对颜渊的赞美，也是他对众弟子的要求。顾炎武又引申出两句话：“有一日未死之身，则有一日未闻之道。”这既是《日知录》撰写的动力，更是顾炎武一生孜孜以求的写照。

## 忠 恕

《延平先生答问》门人朱熹元晦编。曰<sup>[1]</sup>：“夫子之道，不离乎日用之间。自其尽己而言，则谓之忠；自其及物而言，则谓之恕，莫非大道之全体。虽变化万殊，于事为之末，而所以贯之者未尝不一也。”曾子“答门人之问<sup>[2]</sup>，正是发其心尔，岂有二邪？若以为夫子‘一以贯之’之旨甚精微，非门人所可告，姑以‘忠恕’答之，恐圣贤之心不若是之支也<sup>[3]</sup>。如孟子言‘尧、舜之道<sup>[4]</sup>，孝弟而已矣’，人皆足以知之，但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则非圣人不能尔”。朱子又尝作《忠恕说》，其大指与此略同。按此说

甚明，而《集注》乃谓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sup>[5]</sup>，是疑忠恕为下学之事<sup>[6]</sup>，不足以言圣人之道也。然则是二之<sup>[7]</sup>，非一之也。

慈溪黄氏曰<sup>[8]</sup>：“天下之理<sup>[9]</sup>，无所不在，而人之未能以贯通者，己私间之也。尽己之谓忠，推己及人之谓恕。忠恕既尽，己私乃克，此理所在，斯能贯通。故忠恕者，所以能一以贯之者也。”

元戴侗作《六书故》<sup>[10]</sup>，其训“忠”曰：“尽己致至之谓忠。《语》曰：‘为人谋而不忠乎<sup>[11]</sup>？’又曰：‘言思忠<sup>[12]</sup>。’《记》曰：‘丧礼，忠之至也<sup>[13]</sup>。’又曰：‘祀之忠也<sup>[14]</sup>，如见亲之所爱，如欲色然。’又曰：‘瑕不掩瑜<sup>[15]</sup>，瑜不掩瑕，忠也。’《传》曰：‘上思利民，忠也<sup>[16]</sup>。’又曰：‘小大之狱<sup>[17]</sup>，虽不能察，必以情’，‘忠之属也。’《孟子》曰：‘自反而仁矣<sup>[18]</sup>，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观于此数者，可以知‘忠’之义矣。‘反身而诚<sup>[19]</sup>’，然后能忠；能忠矣，然后由己推而达之家、国、天下，其道一也。”其训“恕”曰：“推

“尽己致至之谓忠”，即在如何时候、如何场合，都要尽其仁爱、诚信之心。

己及物之谓恕。‘己欲立而立人<sup>[20]</sup>，己欲达而达人’，施诸己而不愿<sup>[21]</sup>，亦勿施于人，恕之道也。充是心以往，达乎四海矣。故曰：‘夫子之道<sup>[22]</sup>，忠恕而已矣。’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sup>[23]</sup>’。”本程子。“子贡问曰<sup>[24]</sup>：‘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仲弓问仁<sup>[25]</sup>，夫子告之，亦以敬、恕。夫圣人者，何以异于人哉？知终身可行，则知“一以贯之”之义矣。

只有尽己之忠，怀有仁爱、诚信之心，方能推己及物，才谈得上恕。

《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sup>[26]</sup>，无非忠恕之事。而《乾》九二之龙德<sup>[27]</sup>，亦惟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谨”。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何以言“违道不远<sup>[28]</sup>”？曰：此犹之云“巧言令色<sup>[29]</sup>，鲜矣仁”也。古人语辞云尔<sup>[30]</sup>。“违道不远”，即道也。违禽兽不远，即禽兽也。孟子已自申之。岂可以此而疑忠恕之有二乎？或曰：孟子言“强恕而行<sup>[31]</sup>，求仁莫近焉”，何也？曰：此为未至乎道者言之也。孟子曰：“由仁义行<sup>[32]</sup>，非行仁义也。”仁义岂有二乎！今人谓有圣人之忠恕，有学者之忠恕，非也。

君子之道，即忠恕之道，亦即仁义之道。

尽得忠恕，方是圣人，学者所以学为忠恕。

## [ 注释 ]

[1]《延平先生答问》：李侗，字愿中，学者称延平先生，南剑州剑浦（今属福建南平）人。杨时（程颢、程颐门下四大弟子之一）门生。朱熹年轻时拜李侗为师，后辑录李侗答朱熹问儒家经义的一些信札，成《延平先生答问》一书。 [2]曾子“答门人之问”：《论语·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曾子，见《艮其限》注[12]。 [3]支：支离，烦琐凌乱。 [4]“如孟子言‘尧、舜之道’”二句：语出《孟子·告子下》。 [5]而《集注》乃谓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朱熹《论语集注·里仁》：“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余之辞也。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 [6]下学：《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下学人事，上知天命。” [7]“然则是二之”二句：忠恕合圣人内外之道（一之），现将其看作下学之“事”，从“道”中分离，故说“二之”。 [8]慈溪黄氏：黄震，见《艮其限》注[10]。 [9]“天下之理”以下十二句：语出《黄氏日钞·临汝书堂癸酉岁旦讲义》。己私间之，以一己之私而与理相隔。 [10]元戴侗作《六书故》：戴侗，字仲达，浙江永嘉人。南宋理宗淳祐间知台州。元世祖至元间卒。所著《六书故》，是一部用六书理论来分析汉字的字书。 [11]为人谋而不忠乎：语出《论语·学而》。 [12]言思忠：语出《论语·季氏》。 [13]“丧礼”二句：

语出《礼记·礼器》。 [14]“祀之忠也”以下三句：语出《礼记·祭义》。孔颖达疏：“明文王祭思亲忠敬之甚”，“言齐（斋戒）时思念亲之平生嗜欲，如似真见亲所爱在于目前”。又引王肃然解：“欲色，如欲见父母之颜色。”杨天宇《礼记译注》译：“祭祀（奉献祭品）时的虔诚，就像见到了（已故）亲人生平所喜爱的东西，就像看到了亲人想要得到这些东西的神色。” [15]“瑕不掩瑜”以下三句：语出《礼记·聘义》。 [16]“上思利民”二句：语出《左传》桓公六年。 [17]“小大之狱”以下四句：语出《左传》庄公十年。曹刿问鲁庄公凭借什么和齐国作战，鲁庄公答道：“大大小小的案件，虽不能一一明察，但一定会根据实情来裁决。”曹刿说：“这才是尽职的事。” [18]“自反而仁矣”以下五句：《孟子·离娄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横逆，粗暴蛮横的态度。自反，反省自己。此物奚宜至哉，要不这种态度怎么会冲我来呢？由是，还是这样。 [19]反身而诚：《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言反躬自问，能做到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 [20]“己欲立而立人”二句：语出《论语·雍也》。言（作为一个仁者，）自己想站得住，也要帮助别人站得住；自己想兴旺发达，也要帮助别人兴旺发达。 [21]“施诸己而不愿”二句：语出《礼记·中庸》。 [22]“夫子之道”二句：语出《论语·里仁》。 [23]天下之达道也：《礼记·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24]“子贡问曰”以下四句：语出《论语·卫灵公》。 [25]“仲弓问仁”以下三句：《论语·颜

渊》：“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26] “《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二句：《礼记·中庸》：“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我孔丘一条也没能做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忠厚诚实的样子）尔！”平常的道德要实行，平常的言谈应谨慎。 [27] “而《乾》九二之龙德”二句：《周易·乾卦·文言》：“九二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九二爻辞说：龙在大地出现，有利于大德大才之人出世。这是什么意思？孔子说：“有龙德的君子具备中正之道……”庸，常，平常。高亨《周易大传今注》：“庸由正中而来。正中者，无过，无不及，无偏，无邪也。正中之言乃为庸言，正中之行乃为庸行。之犹是也。”正中之道就是常道，故平常的言语无不诚实，平常的行为无不严谨。 [28] 违道不远：《礼记·中庸》：“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言人能做到忠恕，就离中庸之道不远了。 [29] “巧言令色”二句：语出《论语·阳货》。 [30] 云尔：用于语尾，表示如此而已。 [31] “强恕而行”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上》。 [32] “由仁义行”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下》。言能遵照仁义行事，而不是勉强施行仁义。

### [ 点评 ]

《论语》中共有十八处提到“忠”，“恕”见于《论语》仅有二处。“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

无余之辞也。”（《论语集注》）钱穆作了补充说明：“尽己之心以待人谓之忠，推己之心以及人谓之恕。”（《论语新解》）忠就自身说，恕就待人说，忠内恕外。忠内，故难知；恕外，故易见。从恕，可测忠的真伪、程度，忠恕实为一体。由此而言：“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忠恕之道即仁义之道。仁是完美的道德境界，义是合宜的行为规范。仁作为“二人相对”的字义符号，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要求人不仅关心自己，还要为对方（他人）着想。忠、恕二字，堪称融和人与人间的感情、协调人与人间的关系的最有效的准则。恕不是简单的宽恕，而是将心比心，以自己的心思来揣度别人的心思，是真切的同情和理解。“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这就是恕的真谛。而唯有终身行恕的人，才能永远不失其仁爱之心，故孔子于此尤为强调。文中赞同忠恕“合内外之道，使之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说法，就是强调忠恕发乎人的本性，是“性本善”的体现。

在《论语》中，忠恕并提，忠在恕先。但置于社会关系中，实际上是恕在忠先。恕是一个“限定”词，其实质是人不能以邻为壑，为满足自身的欲望而去侵犯他人的权益；其前提则是人与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超越别人、控制别人的特权。因此，恕是维护社会秩序和正义的基础，是在一个正常的、有理性的社会中，任何人都必须遵循的最起码的行为准则。也许正是由此着眼，法国思想家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超过基督教义的最纯粹的道德。

##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sup>[1]</sup>

夫子之教人<sup>[2]</sup>，“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故曰“不可得而闻”。“子曰<sup>[3]</sup>：‘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是疑其有隐者也。不知“夫子之文章”，无非“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所谓“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

性与天道，在文章之中。

子贡之意<sup>[4]</sup>，犹以文章与性与天道为二，故曰：“子如不言<sup>[5]</sup>，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是故可仕可止<sup>[6]</sup>，可久可速，无一而非天也；恂

恂便便<sup>[7]</sup>，侃侃闇闇，无一而非天也。

性与天道，在  
世事之中。

“动容周旋中礼者<sup>[8]</sup>，盛德之至也。”孟子以为尧、舜性之之事<sup>[9]</sup>。夫子之文章<sup>[10]</sup>，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义<sup>[11]</sup>，尊天王，攘戎翟，诛乱臣贼子，皆性也，皆天道也。故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sup>[12]</sup>，而“子如不言，则小子其何述”乎？

性与天道，在  
政事之中。

今人但以《系辞》为夫子言性与天道之书。愚尝三复其文<sup>[13]</sup>，如“鸣鹤在阴”七爻<sup>[14]</sup>，“自天祐之”一爻<sup>[15]</sup>，“憧憧往来”十一爻<sup>[16]</sup>，“履，德之基也”九卦<sup>[17]</sup>，所以教人学《易》者，无不在于言行之间矣。故曰：“初率其辞<sup>[18]</sup>，而揆其方，既有典常，苟非其人，道不虚行。”

性与天道，在  
言行之中。

“樊迟问仁<sup>[19]</sup>，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司马牛问仁<sup>[20]</sup>，子曰：‘仁者，其言也讷。’”由是而充之，“一日克己复礼<sup>[21]</sup>”，有异道乎？今之君子，学未及乎樊迟、司马牛，而欲其说之高于颜、曾二子<sup>[22]</sup>，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sup>[23]</sup>。

朱子曰：“圣人教人<sup>[24]</sup>，不过孝弟忠信、持

守诵习之间”，“此是下学之本。今之学者以为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又曰：“近日学者病在好高<sup>[25]</sup>。《论语》未问‘学而时习’，便说‘一贯’；《孟子》未言‘梁惠王问利’，便说‘尽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读《系辞》。”此皆躐等之病<sup>[26]</sup>。又曰：“圣贤立言，本自平易，今推之使高，凿之使深<sup>[27]</sup>。”

《黄氏日钞》曰：“夫子述六经<sup>[28]</sup>，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

孔门弟子不过四科<sup>[29]</sup>，自宋以下之为学者，则有五科，曰“语录科”。

刘石乱华<sup>[30]</sup>，本于清谈之流祸<sup>[31]</sup>，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sup>[32]</sup>，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sup>[33]</sup>，代修己治人之

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sup>[34]</sup>，爪牙亡而四国乱<sup>[35]</sup>，神州荡覆，宗社丘墟<sup>[36]</sup>。昔王衍“妙善玄言”<sup>[37]</sup>，“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

#### [ 注释 ]

[1] 夫子之言性与天道：《论语·公冶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指有关古代文献的学问。 [2] “夫子之教人”二句：《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指文献、行为、忠诚、信誉。 [3] “子曰：‘二三子以我为隐乎’”以下五句：语出《论语·述而》。孔子说：“你们这些学生以为我有所隐瞒吗？我没什么可隐瞒的。我没有事不向你们公开，这就是我孔丘的为人。” [4] 子贡：见《丰熙伪尚书》注 [7]。 [5] “子如不言”以下七句：《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孔子说：“我想保持沉默。”子贡说：“先生如果不说话，那我们传述什么呢？”孔子说：“天说过什么呢？四季照常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过什么呢？” [6] “可仕可止”二句：《孟子·公孙丑上》：“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 [7] “恂恂便便”二句：《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恂恂（xún），恭顺。如，……的样子。便便（pián），能言

善辩。言孔子在家乡非常谦恭，像一个不会说话的人。他在宗庙和朝廷上，能言善辩，只是十分谨慎罢了。 [8]“动容周旋中礼者”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下》。言举止、仪容、进退揖让都符合礼的要求，乃道德最高境界。 [9] 孟子以为尧、舜性之之事：《孟子·尽心上》：“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言尧、舜本性具备仁义，商汤、周武王是亲身实践仁义，春秋五霸是假借仁义。 [10] “夫子之文章”二句：《孟子·滕文公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11] “《春秋》之义”以下四句：天王，即天子。《孟子·滕文公下》：“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2] 胡氏以《春秋》为圣人性命之文：胡氏，胡安国。其子胡寅说他“笃志于天人性命之学”（《崇正辨》）。胡安国志在《春秋》，“潜心是书二十余年，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此。每叹曰：‘此传心要典也。’”（《宋史·胡安国传》） [13] 三复：反复诵读。 [14] 鸣鹤在阴：《周易·中孚卦》：“九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象》曰：‘其子和之’，中心愿也。”言鹤在山阴处鸣叫，幼鹤在旁边和应。我有好酒，愿意和你分享。爵，酒器，借指酒。靡，靡费，消费。中心愿，发自内心的愿望。 [15] 自天祐之：《周易·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祐，同“佑”。保佑。 [16] 憧憧往来：《周易·咸卦》：“九四：贞吉，悔亡。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象》曰：‘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来’，未光大也。”“《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咸卦》即谈男女之间的感应之理。憧憧，形容心动的样子。“九四”言女子贞洁自守，行为没有过失，这似乎不利于男子求爱，其实不然，所以说“未感害也”，即不妨碍男女间的感情交流。相感之后，便会有所表现，出现“憧憧”之貌、“往来”之行。但毕竟还刚开始，所以说“未光大也”，

即尚未充分表现出来。“朋从尔思”，即女子的情思会在交往中和男子的感情交融。 [17]履，德之基也：语出《周易·系辞下》。《序卦传》：“履者，礼也。”孔颖达《周易正义》：“为德之时，先须履践其礼，敬事于上，故履为德之初基也。”言礼是培养德性的基础。 [18]“初率其辞”以下五句：语出《周易·系辞下》。初，始。率，循。辞，卦、爻之辞。揆，度。方，向。典常，不可改易的常法。苟，若。孔颖达《周易正义》：“《易》虽千变万化，不可为典要。然循其辞，度其义，原寻其初，要结其终，皆唯变所适，是其常典也。”言开始学《易》应遵循卦、爻的文辞，思考其指引的方向，掌握不可改易的常法（规律）。如果不是得道的人，《易》道也难以凭空施行。 [19]“樊迟问仁”以下五句：语出《论语·子路》。见《艮其限》注[11]。樊迟，名须。孔子学生。 [20]“司马牛问仁”以下四句：语出《论语·颜渊》。司马牛，名耕。孔子学生。切（rèn）：说话迟缓。因付诸行动很难，故说话表态不得不迟缓。 [21]一日克己复礼：《论语·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言克制自己的欲望，使言语行动都合于礼，这就是仁。一旦做到这一点，天下人就会称你是仁人。发扬仁德完全取决于自己，难道还要靠别人吗？ [22]颜、曾：颜渊、曾参（sh n）。颜渊，曹姓，颜氏，名回，字子渊，鲁国人。孔子最得意的门生，后世尊称“复圣”。曾参，字子舆，鲁国人。春秋末年思想家，孔子著名弟子。相传“四书”中的《大学》即其所作。 [23]禅宗：又称佛心宗，汉传佛教宗派之一，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惠能指出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之学，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也使从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禅宗的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24]“圣人教人”

以下七句：见朱熹《答王季和》《答林谦之》。下学，《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何晏《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下学人事，上知天命。”谓学习人情事理的基本知识。

钝根，佛教语。《法华经·药草喻品》：“正见邪见，利根钝根。”谓根机愚钝，不能领悟佛法。后也用于指缺少灵性。 [25] “近日学者病在好高”以下七句：语出《朱子语类》卷十九。学而时习，《论语》首篇《学而》前二句为：“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贯，一以贯之。见《忠恕》注 [2]。梁惠王问利，《孟子》首篇《梁惠王上》开篇为：“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尽心，《孟子》最后二篇为《尽心上》《尽心下》。《尽心上》：“尽其心者，知其性（本性）也。知其性，则知天（天命）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 [26] 躐等：逾越等级；不按次序。 [27] “圣贤立言”以下四句：语出《答刘子澄》。 [28] “夫子述六经”以下六句：语出《黄氏日钞》卷三十八《晦庵先生语类续集》。濂洛，濂指周敦颐，原居道州营道濂溪，世称濂溪先生，为宋代理学之祖，其学生程颐、程颢兄弟，家居洛阳，世称其学为洛学。二程是与朱熹齐名的理学奠基者。道学，即理学。 [29] 四科：孔门四种科目：德行、言语、政事、文学。《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故后世有“四科十哲”说。 [30] 刘石乱华：西晋惠帝时，发生八王之乱。北方少数民族趁乱反晋，占据中原。其中最主要的是匈奴、鲜卑、羯、羌、氐五大胡人部落，故史称“五胡乱华”。刘，刘渊，字元海，新兴郡（今山西忻州）人，匈奴首领冒顿单于后代。趁着西晋诸王内乱，割据并州，建立汉国（前赵）。石，石勒，字世龙，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人。羯族部落首领，十六国时期后赵开国皇帝。 [31] 本于清谈之流祸：清谈，清雅的谈

论。特指魏晋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玄学问题析理问难，反复辩论的文化现象。《晋书·儒林传序》：“有晋始自中朝，迄于江左，莫不崇饰华竞，祖述虚玄……遂使宪章弛废，名教颓毁，五胡乘间而竞逐，二京继踵以沦胥。”《资治通鉴》卷七十九《晋纪一·武帝》胡三省注：“清谈之祸，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犹未已也。” [32] 综：管理，整治。 [33] 明心见性：《元史·仁宗本纪三》：“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谓屏弃世俗一切杂念，彻悟因杂念而迷失了的本性（即佛性）。 [34] 股肱（gōng）：比喻左右辅佐之臣。股，大腿；肱，胳膊。 [35] 四国：四方诸侯国。 [36] 宗社：宗庙和社稷，泛指国家。 [37] “昔王衍‘妙善玄言’”以下十句：见《晋书·王衍传》。王衍，字夷甫。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西晋末年重臣，玄学清谈领袖。玄言，指魏晋间崇尚老庄玄理的言论。

### [ 点评 ]

“性与天道”，这是备受宋明理学家关注的问题，但顾炎武却说：“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他对这种状况的反感，一方面是因为“夫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性与天道在其中矣”，即性与天道就在世事、人事之中，故“圣贤立言，本自平易”，人人知晓，无需多谈。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看到：“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即脱离世事、人事，性与天道便无着落，“推

之使高，凿之使深”的结果，是沦为不着边际的空谈。这也是顾炎武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用章学诚的话说：“性命之说易入虚无……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文史通义·朱陆》）

更让顾炎武担忧的是：“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看到：不仅心学末流已流为禅学，就是理学的继承者，也沾染了禅学的习气。黄震已经提出：“夫子述六经，后来者溺于训诂，未害也。濂洛言道学，后来者借以谈禅，则其害深矣。”如果说在宋末还初见端倪，那么至明末已成风气。其结果是“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最终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这是士人的堕落，是学界的不幸，更是时代的悲剧。

清谈之风，起于魏晋年间，文人学士不谈国事民生，好说老庄玄理。西晋建国之初，傅玄在上疏时即指出：“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而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使天下无复清议，而亡秦之病复发于今。”（《晋书·傅玄传》）“清谈误国”之论，始见于此。东晋依然“以浮虚相扇，儒雅日替。（范）宁以为其源始于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晋书·范宁传》）。《日知录》中有《正始》篇，论及当时风气，深有同感：“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一掬哀时泪，不为前朝流。

## 博学于文

“君子博学于文<sup>[1]</sup>。”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sup>[2]</sup>，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品节斯<sup>[3]</sup>，斯之谓礼。”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sup>[4]</sup>，踊不绝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绝于地。知此者，由文矣哉！由文矣哉！”《记》曰：“三年之丧<sup>[5]</sup>，人道之至文者也。”又曰：“礼减而进<sup>[6]</sup>，以进为文。乐盈而反，以反为文。”《传》曰：“文明以止<sup>[7]</sup>，人文也。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曰：“文王既没<sup>[8]</sup>，文不在兹乎！”而《溢法》“经纬天地曰文”<sup>[9]</sup>，与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sup>[10]</sup>，有深浅之不同矣。

同一“文”字，含义大不相同。“博学于文”之“文”，主要是天文、人文、礼乐之文，而不仅仅是文献资料。

## [ 注释 ]

[1] 君子博学于文：语出《论语·雍也》。 [2] 度数：标准，规则。 [3] “品节斯”二句：语出《礼记·檀弓下》。孔颖达疏：“品，阶格也；节，制断也。”品节，言按等级而加以节制。斯，这个，这里。言对人的哀乐之情区分轻重等级而加以节制，这就称作礼。 [4] “伯母、叔母疏衰”以下七句：语出《礼记·杂记下》。疏衰，即齐衰。丧服中“五服”之一，规格次于斩衰。踊不绝地，哭泣跳跃时脚不离地面。踊，往上跳。大功，丧服中“五服”之一，服期九月。踊绝于地，哭泣跳跃时脚离开地面。由文矣哉，言这样做可能行礼了。 [5] “三年之丧”二句：语出《礼记·三年问》。言守丧三年，是人情在丧礼上最完美的表现。 [6] “礼减而进”以下四句：语出《礼记·乐记》，又见《祭义》。原文前有“礼主其减，乐主其盈”二句。进，郑玄注：“谓自勉强也。”言礼所重在减损（使礼仪形式趋于简单），乐所重在充盈（使表现形式趋于丰富）。因礼减损，人才能勉力遵循，故谓之“减而进”。因乐充盈，人才能得到陶冶回归本性，故谓之“盈而反”。 [7] “文明以止”以下三句：语出《周易·贲卦·彖传》。言观察人的文明礼仪各止（守）其分（不逾越）的现象，就可以教化天下。 [8] “文王既没”二句：语出《论语·子罕》。言周文王死了以后，文献制度不都在我这里吗？ [9] 《谥法》：指《逸周书·谥法解》。 [10] 弟子之学《诗》《书》六艺之“文”：《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朱熹《论语集注》：“文，谓《诗》《书》六艺之文。”

## [ 点评 ]

在《亭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中，顾炎武揭橥“博

学于文”“行己有耻”，提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孔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谈“文”，不能离开“礼”。本文列举了先秦儒家经籍中关于“文”的陈述，说明这是一种体现礼乐精神的“文”，不是象形指事的文字，也不是表情达意的文章，而是包含着丰富社会内容、伦理内容的大文化，即经天纬地之文。由此，“博学于文”才能成为顾炎武所认定的立身行事的准则。

国家图书馆

## 予一以贯之<sup>[1]</sup>

“好古敏求<sup>[2]</sup>”，“多见而识<sup>[3]</sup>”，夫子之所自道也。然有进乎是者。六爻之义<sup>[4]</sup>，至赜也<sup>[5]</sup>，而曰“知者观其彖辞<sup>[6]</sup>，则思过半矣”。三百之《诗》<sup>[7]</sup>，至泛也，而曰“一言以蔽之<sup>[8]</sup>，曰思无邪”。三千三百之仪<sup>[9]</sup>，至多也，而曰“礼<sup>[10]</sup>，与其奢也，宁俭”。十世之事<sup>[11]</sup>，至远也，而曰“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虽百世可知”。百王之治，至殊也，而曰“道二<sup>[12]</sup>，仁与不仁而已矣”。此所谓“予一以贯之”者也。其教门人也，必先“叩其两端<sup>[13]</sup>”，而使之“以三隅反<sup>[14]</sup>”。故颜子则“闻一以知十”<sup>[15]</sup>，而子贡“切磋”

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是用一个基本观念来贯穿所学的知识。后世将一以贯之解释成自始至终不作改变，有离孔子本意。

之言<sup>[16]</sup>，子夏“礼后”之问<sup>[17]</sup>，则皆善其“可与言诗”。岂非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乎？彼章句之士<sup>[18]</sup>，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学<sup>[19]</sup>，均失圣人之指矣。

### [ 注释 ]

[1] 子一以贯之：语出《论语·卫灵公》。 [2] 好古敏求：《论语·述而》：“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勤勉。 [3] 多见而识：语出《论语·述而》。识(zhì)，记住。 [4] 六爻：见《朱子周易本义》注[27]。 [5] 蹟(zé)：幽深玄妙；深入探求。 [6] “知者观其彖辞”二句：语出《周易·系辞下》。知，同“智”。彖辞，即卦辞。思过半，领悟大半。 [7] 三百之《诗》：即《诗》三百(篇)。 [8] “一言以蔽之”二句：见《论语·为政》。 [9] 三千三百之仪：《礼记·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然后行。”见《致知》注[4]。 [10] “礼”以下三句：语出《论语·八佾》。 [11] “十世之事”以下五句：《论语·为政》：“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子张问：“今后十代(的礼仪制度)可以预先知道吗？”孔子说：“殷朝沿袭夏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加和废除的内容，是可以知道的；周朝沿袭殷朝的礼仪制度，所增加和废除的内容，也是可以知道的。那么，如果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就是一百代以后，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这里反其意而用之，言由于看不到前人的记载，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大圣人，也无法理解前

代的礼仪制度。 [12] “道二”二句：语出《孟子·离娄上》。道二，言治国之道有二种。 [13] 叩其两端：《论语·子罕》：“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言：“我有知识吗？其实没有知识。有个粗俗的人向我讨教，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就从问题正反两方面不断探讨，这样就能把问题彻底弄清楚。” [14] 以三隅反：《论语·述而》：“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言教他一点，却不能举一反三的，就不再说了。 [15] 颜子则“闻一以知十”：见《论语·公冶长》。颜子，颜渊，见《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注 [22]。言颜渊听到一件事，就能推知十件事。 [16] 子贡“切磋”之言：《论语·学而》：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子贡名）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见《丰熙伪尚书》注 [7]。 [17] 子夏“礼后”之问：《论语·八佾》：“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先有白色的底子，然后再绘画）。’曰：‘礼后乎（是不是礼乐的产生在仁义之后呢）？’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夏，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西南）人。孔门十哲之一。 [18] 章句：见《朱子周易本义》注 [42]。 [19] 语德性而遗问学：《礼记·中庸》：“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言君子既推重与生俱有的德性，又重视通过学习、存养发扬德性。这里批评当今君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 点评 ]

本文前面列举孔子论《易》《诗》《礼》《春秋》之语，诠释何谓“一以贯之”，引出最后几句：“彼章句之士，既不足以观其会通，而高明之君子，又或语德性而遗问

学，均失圣人之指矣。”以此作为结语，颇有深意。“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陆九渊《鹅湖和陆教授兄韵》）关于朱熹、陆九渊异同的争辨，是理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公案，二家生徒各持其说，或以陆学偏于尊德性而失之空疏，或以朱学偏于道问学而失之支离。虽然后世出现了调停朱陆异同的主张，但“章句之士”偏于道问学、“高明之君子”偏于尊德性的分歧终究存在。顾炎武认为：“天下之理，殊途而同归，大人之学，举本以该末。”大学之道，必须格物致知（道问学）和正心诚意（尊德性）并进，方可完成治国平天下的大业。潘耒称亭林为“通儒”，即能一以贯之，两不偏废，无畸重畸轻之弊。

##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sup>[1]</sup>

疾名之不称，则必求其实矣，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是以《乾》初九之《传》曰<sup>[2]</sup>：“不易乎世<sup>[3]</sup>，不成乎名。”

古人求没世之名，今人求当世之名。吾自幼及老，见人所以求当世之名者，无非为利也。名之所在，则利归之，故求之惟恐不及也。苟不求利，亦何慕名？

“疾名之不称”，和“岂有务名之心”，并不矛盾。

### 〔注释〕

[1]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语出《论语·卫灵公》。言君子只恨到死仍无名望。 [2] 《乾》初九之《传》：《乾》，《周易·乾卦》。初九，见《朱子周易本义》注[44]。《传》，指《文言传》，见《朱子周易本义》注[10]。 [3] “不易乎世”二句：不为世俗

转变立场，不求当世之名。

### [ 点评 ]

“君子岂有务名之心哉！”陆耀谓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则骛名之一念实为之”（《切问斋集·复戴东原言理欲书》）。追名逐利，历来被看作人堕落的起因。但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即使是君子，内心也有扬名后世的愿望。司马迁遭宫刑之后，忍辱负重，发愤作《史记》，就出于“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故“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安书》），以此成为后世文人学士的表率。就治国而言，“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在《名教》这篇文章中，顾炎武提倡“以名为教”，以挽救日益溃败的官场痼疾、社会风气。好名的对错，全看人的动机如何。顾炎武认为：君子所求的，是没世之名，即身后之名，只有那些能立德、立功、立言，建立不朽业绩、造福后世的人，才会享有如此令名。今人所求的，是当世之名，即和利益相伴的名，求名即求利。对有所追求的人来说，这是在“名”字面前无可回避的选择。

## 自视欲然<sup>[1]</sup>

人之为学，不可自小，又不可自大。“得百里之地而君之<sup>[2]</sup>，皆足以朝诸侯，有天下”，不敢自小也。“附之以韩、魏之家<sup>[3]</sup>，如其自视欲然，则过人远矣”，不敢自大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sup>[4]</sup>”，“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已推而内之沟中”，则可谓不自小矣。“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sup>[5]</sup>，无非取于人者”，则可谓不自大矣。故自小，小也；自大，亦小也。今之学者，非自小则自大，吾见其同为小人之归而已。

自小，是妄自菲薄；自大，是忘乎所以。究其实，都是心胸小、见识浅，同为不能成大事的小人。

### [ 注释 ]

[1] 欲(k n)然：不自满。 [2] “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以下

三句：语出《孟子·公孙丑上》。言（像伊尹、伯夷、孔子那样的贤人，）若能得到方圆百里的一块地担任君主，都能使诸侯来朝见，最终拥有天下。 [3]“附之以韩、魏之家”以下三句：语出《孟子·尽心上》。附，增益。韩、魏之家，指晋国六卿中富室韩、魏两家。言在他原有的家产上，再添加韩、魏两家的财产，如果他还能做到不自满，那就不是寻常人了。 [4]“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以下四句：语出《孟子·万章上》。斯道，指尧舜之道。觉，使……觉悟。斯民，百姓。内，同“纳”，放入。 [5]“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二句：语出《孟子·公孙丑上》。言（舜）从农夫、陶工、渔夫做起，直到成为帝王，他的长处都是从别人那里学取的。

### [ 点评 ]

本文所说的，是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既不能妄自菲薄，即“不可自小”；也不能狂妄自大，即“不可自大”。自小者无远大抱负，自大者无自知之明。自小者不想成大事，自大者不能成大事。有抱负者，即使身在困苦之中，依然怀着兼济天下的雄心，“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贫贱不能移”；即使时来运转，“附之以韩、魏之家”，依然“自视欷然”，“富贵不能淫”；进而达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境地，“威武不能屈”。这种高昂的格调，这种“大丈夫”的气概，在《孟子》中表现得尤为特出。

## 饭糗茹草<sup>[1]</sup>

开篇四句，即“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之意。

享天下之大福者，必先天下之大劳；宅天下之至贵者<sup>[2]</sup>，必执天下之至贱。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sup>[3]</sup>，“知小人之依”。而周之后妃<sup>[4]</sup>，亦必“服澣濯之衣，修烦縻之事”。“及周公遭变<sup>[5]</sup>，陈后稷先公王业之所由者，则皆农夫女工衣食之务也”。干宝《晋纪论》<sup>[6]</sup>。古先王之教，能事人而后能使人。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舜之圣也，而“饭糗茹草”；禹之圣也<sup>[7]</sup>，而“手足胼胝，面目黧黑”，此其所以道济天下，而为万世帝王之祖也，况乎其不如舜、禹者乎！《朱子语类》言：舜之耕稼陶渔<sup>[8]</sup>，“夫子

之钩弋”，“子路之负米，子贡之埋马”，皆贱者之事，而古人不辟也。“有若三踊于鲁大夫之庭，冉有用矛以入齐军，而樊须虽少能用命”，此“执干戈以卫社稷”，而古人所不辞也。“后世骄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职为耻。”

### [ 注释 ]

[1] 饭糗茹草：《孟子·尽心下》：“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饭、茹，吃。糗（qi），干粮。草，野菜。 [2] 宅：居于。 [3] “是以殷王小乙使其子武丁‘旧劳于外’”二句：《尚书·周书·无逸》：“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小乙，又作祖乙，商中宗。在位时制定了商代的祭祀制度。武丁，商高宗。任用刑徒出身的傅说等贤能之人辅政，励精图治，史称“武丁盛世”。旧，《史记》作“久”。爰，于是。暨，及。小人，指底层百姓。裴骃《史记集解》引马融语：“武丁为太子时，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劳役于外。与小从事，知小人艰难劳苦也。” [4] “而周之后妃”以下三句：《晋书·孝愍帝纪》：“妃后躬行四教，尊敬师傅，服澣濯之衣，修烦辱之事，化天下以成妇道。”澣（huàn），同“浣”。濯（zhuó），洗。澣濯，洗涤。烦缛，繁杂卑贱。 [5] “及周公遭变”以下三句：干宝《晋纪总论》：“及周公遭变，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者，皆农夫女工衣食之事也。”周武王灭商二年后去世，成王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周公摄政。其兄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有取代周成王的野心，于是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成王不利。”“遭变”即指此事。后稷，姬姓，名弃。尧、舜、禹时均为农官，教民耕种，相传为最早种稷（粟或黍类的粮食作物）和

麦的人。周人以后稷为始祖。 [6]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后迁居海宁（今属浙江）。东晋文学家、史学家。所著《搜神记》，被称作“中国志怪小说的鼻祖”。 [7] “禹之圣也”以下三句：《墨子·备梯》：“禽滑厘子事子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黧黑。”《史记·李斯列传》：“禹凿龙门，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决渟水致之海，而股无胈，胫无毛，手名胼胝，面目黎黑。”胼胝，老茧。黧，古作“黎”，“黑”的意思。黧黑是同义反复词，形容人脸色发黑。 [8] “舜之耕稼陶渔”以下十三句：见《朱子语类》卷十三。夫子之钓弋，《论语·述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言孔子钓鱼，不用大网竭泽而渔；射鸟，不射归巢栖息的鸟。子路，名仲由，字子路，又字季路，鲁国卞（在今山东泗水）人。孔门十哲之一。为人伉直，好勇尚武。刘向《说苑·建本》：“子路曰：‘负重道远者不择地而休，家贫亲老者不择禄而仕。昔者由事二亲（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粗劣的饭菜），而为亲负米百里之外。’”《礼记·檀弓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贡埋之，曰：‘吾闻之也，敝帷（帷帐）不弃，为埋马也；敝盖（车盖）不弃，为埋狗也。丘也贫，无盖，于其封也，亦予之席（草席），毋使其首陷焉（不要让狗的头直接陷在泥土中）。’路马死，埋之以帷。”辟，通“避”。有若，字子有，世称“有子”，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左传》哀公八年：“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吴国攻打鲁国。鲁大夫微虎想要夜袭吴王的住处，率领他的部属七百人，在帐幕外的庭院里向上跳三次，最后选了三百人，有若也在里边。）冉有，冉求，字子有。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曾担任鲁国卿大夫季孙氏宰臣。樊须，字子迟，世称“樊迟”。鲁国人。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左传》哀公十一年：“齐为郕（息国）故，国书、高无丕帅师伐我（鲁国）……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驾车），

樊迟为右（车右）。季孙曰：‘须（樊须）也弱（年少）。’有子曰：‘就用命焉（虽年少，但能效命）。’……师（鲁国军队）及齐师战于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不敢过沟与齐军作战）。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你，有若）也。请三刻（与众三刻约信）而逾之。’如之（按这样做），众从之……孔子曰：‘能执干戈以卫社稷，可无殇（不作夭折看待）也。’冉有用矛于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

### [ 点评 ]

《孟子》中有一段励志的名言：“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本文所表达的，正是同样的意思。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从人生的轨迹看，对很多人而言，也可以说：劳兮福之所倚，贱兮贵之所倚。《老子》还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本文认为治大国始于烹小鲜。干大事必须从小事做起，“其心不敢失于一物之细，而后可以胜天下之大”。那些好高骛远、骄侈日甚、以应尽职责为耻者，正是失去羞耻之心的人。

## 州县赋税

王士性《广志绎》曰<sup>[1]</sup>：“天下赋税，有土地肥瘠不甚相远，而征科乃至悬绝者<sup>[2]</sup>。当是国初草草<sup>[3]</sup>，未定画一之制<sup>[4]</sup>，而其后相沿，不敢议耳。如真定之辖五州二十七县<sup>[5]</sup>，苏州之辖一州七县<sup>[6]</sup>，无论所辖，即其广轮之数<sup>[7]</sup>，真定已当苏之五，而苏州粮二百三万八千石<sup>[8]</sup>，真定止一十万六千石。然犹南北异也。若同一北方也，河间之繁富<sup>[9]</sup>，二州十六县；登州之贫寡<sup>[10]</sup>，一州七县，相去殆若莛楹<sup>[11]</sup>。而河间粮止六万一千，登州乃二十三万六千。然犹直隶、山东异也<sup>[12]</sup>。若在同省，汉中二州十四县之殷

庶<sup>[13]</sup>，视临洮二州三县之冲疲<sup>[14]</sup>，易知也。而汉中粮止三万，临洮乃四万四千。然犹各道异也。若在同道，顺庆不大于保宁<sup>[15]</sup>，其辖二州八县，均也。而顺庆粮七万五千，保宁止二万。然犹两郡异也<sup>[16]</sup>。若在一邑<sup>[17]</sup>，则同一西南充也<sup>[18]</sup>，而负郭十里<sup>[19]</sup>，田以步计，赋以田起；二十里外，则田以缁量<sup>[20]</sup>，不步矣；五十里外，田以约计，不缁矣。官赋无定数，私价亦无定估<sup>[21]</sup>，何其悬绝也。惟是太平日久<sup>[22]</sup>，累世相传，民皆安之，以为固然，不自觉耳。”夫王者制邑居民<sup>[23]</sup>，则壤成赋<sup>[24]</sup>，岂有大小轻重不同若此之甚哉！

且以所辖州县言之，真定三十二，西安三十六<sup>[25]</sup>，开封、平阳各三十四<sup>[26]</sup>，济南三十<sup>[27]</sup>，成都三十一<sup>[28]</sup>，而松江、镇江、太平止三县<sup>[29]</sup>，汉阳、兴化止二县<sup>[30]</sup>。其直隶之州，则如徐州、泽州之四县<sup>[31]</sup>，郴州之五县<sup>[32]</sup>，嘉定之六县<sup>[33]</sup>，潼川之七县<sup>[34]</sup>，俨然一府也；而其小者或至于无县可辖。且国初之制<sup>[35]</sup>，多因元旧，平阳一路共领九州<sup>[36]</sup>，殆据山西之半。至洪武二年<sup>[37]</sup>，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

因无视各府土地、人口的差异，没有制定公平的准则，造成征收赋税时的不公和不均。

山西行省<sup>[38]</sup>，而今尚有五州。若蒲州自古别为一郡<sup>[39]</sup>，屡次建言<sup>[40]</sup>，皆为户部所格<sup>[41]</sup>。归德一州向属开封<sup>[42]</sup>，至嘉靖二十四年始分为府<sup>[43]</sup>。天下初定，日不暇给，沿元之非，遂至二百年。崔铎言<sup>[44]</sup>：“今之郡<sup>[45]</sup>，大者千里，属邑数十。为长者名数且不能悉，奚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过四百里，邑百里。”然则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sup>[46]</sup>，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不可以虑始之艰，而废万年之利者矣。

各府统辖，本来就很不合理，却又长期被因袭沿用，不肯改变。

《太祖实录》<sup>[47]</sup>：洪武八年三月，“平阳府言：‘所属蒲、解二州，距府阔远，乞以直隶山西行省为便。’未许。”至天启四年<sup>[48]</sup>，巡按山西李日宣请以二州十县分立河中府<sup>[49]</sup>，治运城<sup>[50]</sup>，以运使兼知府事<sup>[51]</sup>，运同兼清军<sup>[52]</sup>，运副兼管粮<sup>[53]</sup>，运判兼理刑<sup>[54]</sup>。事下户部，户部下山西，山西下河东，河东下平阳府议之，竟寝不行<sup>[55]</sup>。

保护既得利益，是不肯改变的根本原因。

按汉河东郡二十四县<sup>[56]</sup>，后汉二十城。魏正始八年<sup>[57]</sup>，分河东之汾北十县为平阳郡<sup>[58]</sup>。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sup>[59]</sup>，而与狐谋其皮也<sup>[60]</sup>。且商、雒之于关内<sup>[61]</sup>，陈、许之于大梁<sup>[62]</sup>，德、棣之于济南<sup>[63]</sup>，颍、亳之

于凤阳<sup>[64]</sup>，自古不相统属。去府既远，更添司道<sup>[65]</sup>，于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扰，职此之由矣。

昔仲长统《昌言》谓<sup>[66]</sup>：“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sup>[67]</sup>，远州有旷野不发之田。”范晔《酷吏传》亦言：汉制“宰守旷远<sup>[68]</sup>，户口殷大。”而《后汉·马援传》：既平交阯<sup>[69]</sup>，“奏言西于县户有三万二千<sup>[70]</sup>，远界去庭千余里，庭，县庭也。请分为封溪、望海二县<sup>[71]</sup>。许之”。《华阳国志》<sup>[72]</sup>：“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sup>[73]</sup>。见《风俗通》<sup>[74]</sup>。上疏言：‘郡境南北四千<sup>[75]</sup>，东西五千，属县十四，土界遐远，令、尉不能穷诘奸凶<sup>[76]</sup>。时有贼发，督邮追案十日乃到<sup>[77]</sup>，贼已远逃，踪迹绝灭。其有犯罪，逮捕证验，文书诘讯，从春至冬，不能究讫，绳宪未加<sup>[78]</sup>，或遇德令<sup>[79]</sup>。是以贼盗公行，奸宄不绝<sup>[80]</sup>。太守行农桑<sup>[81]</sup>，不到四县；刺史行部<sup>[82]</sup>，不到十县。’欲请分为二郡，其后遂为三巴<sup>[83]</sup>。”《水经注》<sup>[84]</sup>：“山阴县<sup>[85]</sup>，汉会稽郡治也。永建中，阳羨周嘉上书，以县远，赴会稽至难，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为吴，以东

为会稽。”此皆远县之害，已见于前事者也。《北齐书》<sup>[86]</sup>：赫连子悦“除林虑守<sup>[87]</sup>，世宗往晋阳<sup>[88]</sup>，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子悦答言：‘临水、武安二县<sup>[89]</sup>，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sup>[90]</sup>，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sup>[91]</sup>，不觉损干<sup>[92]</sup>。’子悦答以‘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sup>[93]</sup>’”。嗟乎！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当今官场，难见不谋私利、一心为民的人。

#### 〔注释〕

[1] 王士性《广志绎》：王士性，字恒叔，号太初，宗沐侄，临海（今属浙江）城关人。万历年间历任四川、广西、山东等地参议。一生游迹几遍全国，凡所到之处广事搜访，详加记载，著有《广志绎》《五岳游草》《广游志》等。下面引文出自《广志绎·方輿崖略》。 [2] 征科：征收赋税。 [3] 国初：指明朝初期。草草：草率。 [4] 画一：一致。 [5] 真定：府名。治所在今河北正定。 [6] 苏州：府名。治所在今江苏苏州吴中。 [7] 广轮：广袤。指土地面积。 [8] 粮：指当地所交的公粮。 [9] 河间：府名。治所在今河北河间。 [10] 登州：府名。治所在今山东蓬莱。 [11] 莛楹：比喻二者相差悬殊。莛，植物的茎。楹，堂屋前部的柱子。 [12] 直隶：明称直隶于京师的地区为直隶。直隶北京的地区为北直隶，简称北直，相当今北京、天津两市、河北省大部 and 河南、山东的小部地区；直隶南京的地区为南直隶，简

称南直，相当今江苏、安徽两省。此指北直隶。 [13] 汉中：府名。治所在今陕西汉中。 [14] 临洮：府名。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冲疲：地当冲要，民情疲顽。 [15] 顺庆：府名。治所在今四川南充。保宁：府名。治所在今四川阆中。 [16] 郡：古代行政区域，相当于明、清时的府。 [17] 邑：古代行政区域，后世用作县的别称。 [18] 西南充：指四川南充。 [19] 负郭：靠近城郭。 [20] 缙（g ng）：大绳索。 [21] 定估：指物品的定价。 [22] 惟是：只是。 [23] 制邑居民：《礼记·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参相得也。”谓设置都邑，让百姓居住。 [24] 则壤成赋：《尚书·夏书·禹贡》：“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则，（制定）规则。言水、火、金、木、土、谷这些财富所聚的六府治理得很好，各处的土地都要征收赋税，慎重制定征收赋税的规则，都按照土地肥脊的三个等级确定赋税数额。 [25] 西安：府名。治所在今陕西西安长安。 [26] 开封、平阳：都为府名。开封府治在今河南开封，平阳府治在今山西临汾。 [27] 济南：府名。治所在今山东济南历城。 [28] 成都：府名。治所在今四川成都。 [29] 松江、镇江、太平：都为府名。松江府治在今上海松江，镇江府治在今江苏镇江，太平府治在今安徽当涂。 [30] 汉阳、兴化：都为府名。汉阳府治在今湖北武汉汉阳，兴化府治在今福建莆田。 [31] 徐州、泽州：徐州治所在今江苏徐州，泽州治所在今山西晋城。 [32] 郴（ch n）州：治所在今湖南郴州。 [33] 嘉定：州名。治所在今四川龙游。 [34] 潼川：州名。治所在今四川三台。 [35] 国初：潘耒本作“明初”。黄侃《日知录校记》：“抄本‘明’作‘国’。”据此改。 [36] 平阳一路：平阳路，元代行政区划，治所在今山西临汾。 [37] 洪武二年：1369年。 [38] 始以泽、潞、辽、沁四州直隶山西行省：潞州治所在今山西长治，辽州治

所在今山西左权，沁州治所在今山西沁源。行省，起于元朝的行政区划，在明、清两朝得到发展，并为现代中国所继承。 [39] 蒲州：治所在今山西永济。 [40] 建言：提议。 [41] 户部：明清时期户部掌全国疆土、田地、户籍、赋税、俸饷及一切财政事宜。格：阻止，搁置。 [42] 归德：治所在今广西平果。 [43]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嘉靖，明世宗朱厚熜年号。 [44] 崔铣：字子钟，又字仲凫，号后渠，世称后渠先生，河南安阳人。明代学者。嘉靖间任南京礼部右侍郎。 [45] “今之郡”以下七句：语出《士翼》。悉，知道。奚，怎么。 [46] 幅员：当为“幅员”，又作“幅圆”。指疆域，广狭称“幅”，周围称“员”。疆域有广狭及四至，所以称疆域为幅员。 [47] “《太祖实录》”以下七句：见《太祖实录》卷九十八。解，解州，治所在今山西运城。 [48] 天启四年：1624年。天启，明熹宗朱由校年号。 [49] 巡按：明永乐元年（1403）后，以一省为一道。派监察御史分赴各道巡视，考察吏治，每年以八月出巡，称巡按御史。李日宣：字晦伯，江西吉水人。天启五年（1625），与族父李邦华被宦官弹劾为“东林邪党”。 [50] 治运城：治所在今山西运城。 [51] 运使：转运使。明、清时有转盐运使，专管盐务。 [52] 运同：明、清时盐同知的简称，为盐运使的佐官。 [53] 运副：转运副使。 [54] 运判：明、清时盐运判官的简称，为盐运使的佐官。 [55] 寝：停止，停息。 [56] 汉河东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北。 [57] 正始八年：247年。正始，三国魏齐王曹芳年号。 [58] 平阳郡：治所在今山西临汾。 [59] 千金之裘：价值千金的皮衣。《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 [60] 与狐谋其皮：《太平御览》引《苻子》：“周人有爱裘而好珍馐，欲为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与羊谋其馐。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

五年不具一牢。”比喻所谋之事有害于对方的切身利益，终难达到目的。 [61] 商、雒之于关内：商，商州，治所在今陕西商洛。雒，洛阳，今属河南。关内，古时称函谷关或潼关以西王畿附近为关内，即今陕西西安及附近地区。此指西安府。 [62] 陈、许之于大梁：陈州，治所在今河南周口。许州，治所在今河南许昌。大梁，战国时魏国都城，在今河南开封西北。后用作开封的别称。此指开封府。 [63] 德、棣之于济南：德州，治所在今山东陵县。棣州，治所在今山东惠民。济南，府名，今属山东。 [64] 颍、亳之于凤阳：颍州，治所在今安徽阜阳。亳（bó）州，今属安徽。凤阳，府名，今属安徽。 [65] 司道：明代布政司、按察司与分守道、分巡道等的统称。 [66] 仲长统《昌言》：仲长统，字公理，山阳郡高平（今山东邹城西南）人。东汉末年哲学家、政论家。敏思好学，博览群书。不矜小节，时人称为狂生。曾参与丞相曹操的军事，但没有得到重用。著论名《昌言》，计十余万言。原书已佚，今流传的为后人辑本。 [67] “诸夏有十亩共桑之迫”二句：语出《昌言上》。诸夏，义近“华夏”。泛指中原地区，也用于指中国。十亩共桑之迫，《诗经·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写采桑人收工后结伴同归的情景。这里说仅十亩之地，就有不少采桑人拥挤在一起。 [68] “宰守旷远”二句：语出《后汉书·酷吏列传》。宰守，宰，县宰；守，太守，泛指地方长官。言郡县疆域辽阔（地方长官在很远的地方），人口众多。 [69] “而《后汉·马援传》”二句：马援，字文渊，扶风郡茂陵县（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东汉开国功臣。官至伏波将军，世称“马伏波”。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八年（42），交趾女子征侧、征贰举兵造反，征侧自立为王。马援率军南击交趾，大破叛军。交趾，又作“交趾”。秦以后设交趾郡，为今越南北部。 [70] 西于县：治所在今越南永富省东英县。 [71] 封

溪、望海二县：封溪县治在今越南河内市东英县。望海县治在今越南河北省北宁西北。均属交阯郡。 [72]《华阳国志》：东晋常璩著。是一部记载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历史、地理、人物的地方志著作。 [73]巴郡太守但望字伯门，太山人：《华阳国志·巴志》：“（东汉）孝桓帝以并州刺史泰山但望（字伯闾）为巴郡太守，勤恤民隐。”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 [74]《风俗通》：即《风俗通义》，东汉泰山太守应劭辑录。书中记录了大量神话异闻，为研究汉以前风俗和鬼神崇拜的重要文献。 [75]“郡境南北四千”二句：谓巴陵郡南北长四千里，东西长五千里。 [76]令、尉：县令、县尉。后者为县令佐官，掌治安捕盗之事。 [77]督邮：督邮书掾、督邮曹掾的简称。汉代各郡的重要属吏，代表太守督察县乡，宣达政令兼司法等。追案：追究查办案情。 [78]绳宪：即法绳，法律制裁。 [79]德令：施恩德的政令，指大赦令。 [80]奸宄（gu）：违法作乱的人。也指违法作乱的事。宄，坏人。 [81]太守行农桑：《后汉书·郑弘传》：“太守第五伦行春，见而深奇之。”李贤引《续汉志》注：“太守常以春行所主县，劝人农桑，振救乏绝。” [82]刺史行部：《后汉书·酷吏列传》：“刺史行部，见（黄）昌，甚奇之，辟从事。”汉武帝于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部（州），各部始置刺史一人。“刺”即检核问事之意，“史”为“御史”之意。刺史即各部（州）监察长官。行部，巡行所属部域，考核政绩。 [83]三巴：汉末巴、巴东、巴西三郡，合称三巴。相当于今重庆和四川部分地区。 [84]《水经注》：北魏酈道元著。名为《水经》之注，实则以《水经》为纲，详细记载了一千多条河流及有关的历史遗迹、人物掌故、神话传说等资料。下面引文出自《水经注》卷四十《浙江》。 [85]“山阴县”以下九句：语出《水经注·渐江水》。秦朝和西汉时期，会（kuài）稽郡治所在吴县（在今江苏苏州），辖境大致相当于今江苏南部、

上海西部、浙江大部以及福建部分地区。永建（东汉顺帝年号）四年，分会稽郡浙江以北诸县置吴郡，会稽郡治所移至山阴县（在今浙江绍兴）。杨守敬《水经注疏》引《元和志》，谓周嘉时任阳羨（治所在今江苏宜兴）令。 [86]《北齐书》：下面引文，出自《北齐书·赫连子悦传》。 [87]赫连子悦：字士忻，统万城（今陕西靖边）人。北魏至北齐时期的大臣。除：授、拜（官职）。林虑：治所在今河南林州。 [88]世宗：高澄，字子惠，生于怀朔镇（今内蒙古固阳）。高欢长子，东魏权臣。其弟高洋建立北齐之后，追谥高澄为文襄皇帝，庙号世宗。晋阳：故址在今山西太原晋源，东魏和北齐的实际行政中心。 [89]临水、武安二县：临水县治在今山西临县。武安，今属河北。 [90]魏郡：治所在今河北邯郸。 [91]便民：原作“民便”，据《日知录集释》本、《北齐书·赫连子悦传》乙正。 [92]不觉损干：《日知录集释》引杨宁语：“干，郡守所食于郡者。” [93]私润：个人好处。

### [ 点评 ]

孔子谈民生与治政的关系，有一段名言：“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言无论是一国还是一家，不怕财富少，就怕分配不平均；不怕人口少，就怕社会不太平。若是财富平均，就无所谓贫穷；百姓和睦，就不在乎人多少；社会太平，就不会有被推翻的危险。也就是说：公正和公平，是决定百姓幸福感和维护社会安定的基础。而对众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底层劳作者而言，赋税的多少，直接影响其生活水平，故赋税的公正和公平，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但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不合理

的现象普遍存在，而且始终存在。本文即对此展开探讨。

顾炎武认为：要免除征收赋税时所出现的不平、不均、不公、不定的现象，理应制定合理的法规，“则壤成赋”，使各地官府行事有所依据。“后之王者，审形势以制统辖，度辐员以界郡县，则土田以起征科，乃平天下之先务。”道理很明白，操作也不复杂，但为什么就行不通呢？即使有识之士提出合理化的建议，也被官场所否定，依然沿袭陈习，因循不改。顾炎武进而指出：行不通，主要是因为主事者不肯改。对那些地方长官来说，郡县就是他们的寄生窝，郡县的收益，和他们的私人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任何有损其既得利益的事，都必然会反对。“此所谓欲制千金之裘，而与狐谋其皮也。”至于是否扰民、是否损民，都毫不在乎。以此，顾炎武格外怀念古代那些一心为公、情系百姓的循吏，如赫连子悦那样“徒知便民，不觉损干”，“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的人。可叹的是：“今之牧守，其能不徇于私而计民之便者，吾未见其人矣。”

## 法 制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故曰：“居敬而行简<sup>[1]</sup>，以临其民。”周公作《立政》之书<sup>[2]</sup>，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sup>[3]</sup>，庶狱庶慎。”又曰：“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其丁宁后人之意<sup>[4]</sup>，可谓至矣。秦始皇之治<sup>[5]</sup>，“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sup>[6]</sup>，上至于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而秦遂以亡。太史公曰<sup>[7]</sup>：“昔天下之网尝密矣<sup>[8]</sup>，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然则法禁之多，乃所以为趣亡之具<sup>[9]</sup>，而愚暗之君，犹以为未至也。杜子

以过去的历史为鉴，可知国家的兴旺、社会的安宁，在德不在刑。

美诗曰<sup>[10]</sup>：“舜举十六相<sup>[11]</sup>，身尊道何高。秦时任商鞅，法令如牛毛。”又曰：“君看灯烛张<sup>[12]</sup>，转使飞蛾密。”其切中近朝之事乎！

汉文帝诏<sup>[13]</sup>：“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sup>[14]</sup>，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夫三老之卑，而使之得“率其意”，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sup>[15]</sup>，黎民醇厚”，而上拟于成康之盛也<sup>[16]</sup>。

诸葛孔明“开诚心<sup>[17]</sup>，布公道”，而上下之交，人无间言<sup>[18]</sup>。以蕞尔之蜀<sup>[19]</sup>，犹得小康。魏操、吴权任法术以御其臣<sup>[20]</sup>，而篡逆相仍<sup>[21]</sup>，略无宁岁<sup>[22]</sup>。天下之事，固非法之所能防也。

叔向与子产书曰<sup>[23]</sup>：“国将亡<sup>[24]</sup>，必多制。”夫法制繁，则巧猾之徒皆得以法为市<sup>[25]</sup>，而虽有贤者，不能自用，此国事之所以日非也。善乎杜元凯之解《左氏》也<sup>[26]</sup>，曰：“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宣公十二年《传解》<sup>[27]</sup>。

前人立法之初，不能详究事势，豫为变通之地<sup>[28]</sup>。后人承其已弊，拘于旧章<sup>[29]</sup>，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sup>[30]</sup>，其究也“眊而不行<sup>[31]</sup>”，

汉文帝是明君，诸葛亮是贤臣。他们都以道德教化为先导，由此取得治国的成功。

语出《汉书·董仲舒传》。师古曰<sup>[32]</sup>：“眊，不明也。”上下相蒙，以为无失祖制而已。此莫甚于有明之世，如勾军、行钞二事<sup>[33]</sup>，立法以救法，而终不善者也。

宋叶适言<sup>[34]</sup>：“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sup>[35]</sup>，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sup>[36]</sup>。虽然，岂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sup>[37]</sup>，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又曰：“今内外上下<sup>[38]</sup>，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浹，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然而人之才不获尽，人之志不获伸，昏然俛首<sup>[39]</sup>，一听于法度，而事功日堕，风俗日坏，贫民愈无告，奸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诬也。”又曰：“万里之远<sup>[40]</sup>，嗷呻动息<sup>[41]</sup>，上皆知之。虽然，无所寄任，天下泛泛焉而已。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

反过来看，奸恶之徒很容易钻刑法的空子；而刑法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sup>[42]</sup>，讎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

陈亮上孝宗书曰<sup>[43]</sup>：“五代之际<sup>[44]</sup>，兵财之柄倒持于下，艺祖皇帝束之于上，以定祸乱。后世不原其意，束之不已，故郡县空虚，而本末俱弱。”

洪武六年九月丁未，命有司庶务<sup>[45]</sup>，“更月报为季报<sup>[46]</sup>，以季报之数类为岁报。凡府、州、县轻重狱囚，即依律断决，不须转发。果有违枉，从御史、按察司纠劾”。令出，天下便之。

#### [注释]

[1]“居敬而行简”二句：语出《论语·雍也》。谓态度严肃，办事简要，以此治理百姓。 [2]《立政》：《尚书·周书》篇名。王引之《经义述闻》：“‘政’与正同。正，长也。立正，谓建立长官也。”即谈设官用人之道。 [3]“文王罔攸兼于庶言”以下五句：见《爰百姓故刑罚中》注[9]。 [4]丁宁：即叮咛。 [5]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秦朝的建立者。 [6]“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以下六句：语出《史记·秦始皇本纪》。衡，秤。石，古代重量单位，一百二十斤为一石。衡石为称重量的器物。衡石量书，古时文书用竹简木札，以衡石来计算文书的重量，用以形容君主勤于国政。中呈，又作“中程”，达到预定的期限。 [7]太

史公：司马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发愤完成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原名《太史公书》）。[8]“昔天下之网尝密矣”以下五句：语出《史记·酷吏列传》。[9]趣亡：奔向灭亡。趣，通“趋”。[10]杜子美：杜甫，字子美，原籍襄阳（今属湖北），后徙巩县（今河南巩义）。唐代大诗人。[11]“舜举十六相”以下四句：语出《述古三首》（其二）。《左传》文公十八年：“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之民谓之‘八元’……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内平外成……是以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以其举十六相，去四凶也。”商鞅，姬姓，公孙氏，名鞅，卫国人。战国时期法家代表人物。辅佐秦孝公，推行变法，史称“商鞅变法”。[12]“君看灯烛张”二句：语出《写怀二首》（其二）。飞蛾靠光指引飞行，故会飞向点燃的灯烛。[13]汉文帝：刘恒。为人宽容平和，即位后励精图治，朴素仁厚，开启“文景之治”。[14]“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二句：语出《汉书·文帝纪》。三老、孝弟、力田，均为汉代乡官。常员，固定的名额。率其意，按照他们的本意。道民，引导百姓。[15]“此文景之治所以‘至于移风易俗’”二句：文景之治，汉初因多年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凋敝，汉文帝、汉景帝推崇黄老治术，采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迎来中国历史上统一后的第一个盛世，史称“文景之治”。“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语出《汉书·景帝纪》。[16]成康之盛：西周周成王、周康王在位年间，对内推行周公“明德慎罚”的主张，对外扩大疆域，为周最强盛的时期，史称“成康之治”。[17]诸葛孔明：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三国时期蜀汉丞相，政治家、军事

家。“开诚心”二句：语出《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18] 间言：非难、毁谤的话。 [19] 蕞尔：形容地域狭小。 [20] 曹操、孙权：三国魏国曹操、吴国孙权。曹操，本名吉利，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末年政治家、军事家。曹魏政权的奠基人。去世后，其子曹丕称帝，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孙权，字仲谋。吴郡富春县（今浙江杭州富阳）人。三国吴国的建立者。 [21] 相仍：相继，连续不断。 [22] 略：大约，大致。 [23] 叔向与子产书：叔向、子产，见《太原》注 [37]。 [24] “国将亡”二句：语出《左传》昭公六年。制，法规，制度。 [25] 以法为市：将法规作为权利交易的工具。 [26] 杜元凯：杜预。 [27] 《传解》：《春秋经传集解》。 [28] 豫：同“预”。 [29] 旧章：过去的典章制度。 [30] 丛脞（cu）：细碎，杂乱。脞，琐细。 [31] 眊（mào）：眼睛昏花，看不清楚。 [32] 师古：颜师古。 [33] 勾军：征兵。行钞：发行纸币。 [34] 叶适：字正则，号水心居士，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南宋学者，永嘉学派集大成者。著有《水心集》。 [35] “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以下十七句：语出《水心集·始论二》。 [36] 威柄：威权，权力。 [37] 畏人：谓畏辽人、金人。 [38] “今内外上下”以下十八句：语出《水心集·实谋》。 [39] 俛首：低头，表示服从。俛，同“俯”。 [40] “万里之远”以下十九句：语出《水心集·实谋》。 [41] 嗔呻：蹙眉呻吟。嗔，同“颦”，皱眉。动息：动静。谓情况，消息。 [42] 凭陵：侵扰。 [43] 陈亮：字同甫，号龙川，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学者称为龙川先生。南宋学者、文学家，永康学派创立者。孝宗：宋孝宗赵昚（shèn），字元永，秀州（今浙江嘉兴）人。宋高宗赵构养子。后世称其“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44] “五代之际”以下八句：语出《上孝宗皇帝第三书》。艺祖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字元朗，小名香孩儿，

涿郡人，生于洛阳夹马营（在今河南洛阳）。宋朝开国皇帝。艺祖，指有才艺文德的祖先，太祖或高祖的通称。 [45]有司庶务：有司，指主管某部门的官吏。古代设官分职，各有专司，故称。庶务，指各种政务。 [46]“更月报为季报”以下七句：语出《太祖实录》卷八八。《明史·刑法志二》文字稍有异同。御史按察司，元世祖设山东东西、河东陕西、山北东西、河北河南四道提刑按察司，为御史台直辖机构，掌管各地监察事宜。明代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事务。纠劾，举发弹劾。

### [ 点评 ]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老子说：“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老子》）都认为使用严刑峻法，并不能使国家安宁。而晚于他们的法家，如商鞅、韩非等人，看法截然相反。治国任德还是任刑，始终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选择。汉武帝时，虽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又重用酷吏，推行苛政，身受其害的司马迁，追思汉文帝时的仁政，叹道：“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史记·酷吏列传序》）显然站在孔子这一边。前人说司马迁写《酷吏列传》“讽谏微情，盎然可掬，此极用意文字也”（姚苾田《史记菁华录》），也可用于本文。

“法制禁令，王者之所不废，而非所以为治也。其本在正人心、厚风俗而已。”开篇这几句，表明顾炎武的态度，可谓是孔子、司马迁等人“任德不任刑”思想的翻版。下面对后世统治者为何好用刑法，以及由此造成的祸患，作了诛心的探讨。法是因人的需要产生的，是人制定的，又用于制约人。从立法的目的说，人应服从法。但在实际应用时，又常因人而异。杜预说：“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法治还是人治，是法制约众人，还是少数人控制法，这是法大还是人大的问题，根本说上是法大还是权大的问题。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多次提到汉武帝对那些酷吏的赏识：“天子以为能。”文中所引叶适的三段话，对君主任法的动机、心理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弃德任刑和专权密切相关。“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于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亭林文集·郡县论一》）这尚出自公心，更多的是由于私欲。“国家因唐、五代之极弊，收敛藩镇之权，尽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欲专大利而无受其大害，遂废人而用法，废官而用吏，禁防纤悉，特与古异，而威柄最为不分。”更有甚者，“万里之远，嗾呻动息，上皆知之”。即群臣的一举一动，都在君主的监视和掌握之中。

任人不当，任法必有流弊。若“拘于旧章，不能更革，而复立一法以救之。于是法愈繁而弊愈多，天下之事，日至于丛脞”。即老子所言“法令滋章，盗贼多有”；

杜诗所云“君看灯烛张，转使飞蛾密”。有见于此，叔向才有“国将亡，必多制”的告诫。而让顾炎武格外感慨的是专权任法对人才的摧残：“法今日繁，治具日密，禁防束缚至不可动，而人之智虑自不能出于绳约之内，故人材亦以不振。”（《日知录·人材》）以此，他发出如此的偏激之言：“法令者，败坏人材之具。”（同上）这里所说的“法令”，只是被君主操纵和利用的法令而已。而人才的兴废，又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兴亡：“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亭林文集·郡县论一》）明朝亡国之君崇祯帝至死都不悔悟：“朕非亡国之君，诸臣皆亡国之臣。”而从不正视如此反讽的现实：“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群臣不与也。夫万里之远，皆上所制命，则上诚利矣。百年之忧，一朝之患，皆上所独当，而其害如之何？此外寇所以凭陵而莫御，雠耻所以最甚而莫报也。”“三百年来，当国大臣皆畏避而不敢言，至天子独断行之，而已晚矣！”（《日知录·宗室》）

## 省 官

光武中兴<sup>[1]</sup>，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鄣塞破坏<sup>[2]</sup>，亭燧绝灭<sup>[3]</sup>，或空置太守、令长<sup>[4]</sup>，招还流民。帝笑曰：“今边无人<sup>[5]</sup>，而设长吏治之，如《春秋》‘素王’矣。”以故省并郡国及官僚，屡见于史，而总之曰：“兵革既息<sup>[6]</sup>，天下少事，文书调役，务从简寡，至乃十存一焉。”以此知省官之故，缘于少事。今也文书日以繁，狱讼日以多，而为之上者主于裁省，则天下之事必将丛脞而不胜<sup>[7]</sup>；不胜之极，必复增官，而事不可为矣。

晋荀勖之论<sup>[8]</sup>，以为“省官不如省事<sup>[9]</sup>，省

事不如清心。昔萧、曹相汉<sup>[10]</sup>，‘载其清静<sup>[11]</sup>，民以宁一’，所谓清心也。抑浮说，简文案，略细苛，宥小失<sup>[12]</sup>，有好变常以徼利者<sup>[13]</sup>，必行其诛，所谓省事也”。此探本之言，为治者识此，可无纷纷于职官多寡之间矣。

### [ 注释 ]

[1] “光武中兴”以下三句：言光武帝登位时，国内人口稀少，才是战乱前的十分之二三。光武，汉光武帝刘秀，字文叔，南阳蔡阳（今湖北枣阳）人。东汉开国皇帝。东汉建国之初，国家衰败，民生凋敝。光武帝在位期间，经济和文化都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光武中兴”。裁，通“才”。 [2] 鄣塞：指秦汉边塞险要处用于防御的小城，是边城派出的鄣尉所在的地方，形同后代的哨所。 [3] 亭燧（suì）：古代筑在边境上的烽火亭，用作侦伺和举火报警。此指古时边防告警的烽火。 [4] 空置太守、令长：秦汉时治万户以上县者为令，不足万户者为长。后因以“令长”泛指县令。因边地无人，太守、县令无事可做，故说“空置”。 [5] “今边无人”以下三句：应劭《汉官仪上》引《续汉书郡国志五补注》：“上笑曰：‘今边无人而设长吏治之，难如春秋素王矣。’”钱钟书《管锥编·全后汉文卷三五》：“‘圣而不王’曰‘素王’，谓空有其德，而无其位；今适相反，空有其位，而无其事，具臣素食。‘素’之为言空也，而空有位不足比空有德，故曰‘难如。’” [6] “兵革既息”以下五句：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7] 丛脞（cu）：细碎，杂乱。 [8] 荀勖（xù）：字公曾，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三国至西晋时音律学家、藏书家，西晋开国功

臣。 [9]“省官不如省事”以下十三句：语出《资治通鉴》卷八十《晋纪二·武帝》。 [10]萧、曹相汉：萧、曹，萧何、曹参。萧何，沛郡丰邑（今江苏丰县）人。汉初三杰之一。秦末辅佐刘邦建立汉朝，为首任相国。曹参，字敬伯，泗水郡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西汉开国功臣，继任萧何为相国，秉承“萧规曹随”、休养生息的政策。 [11]“载其清静”二句：语出《史记·曹相国世家》。 [12]宥：宽容，原谅。 [13]徼（jiào）利：谋利，求利。徼，求。

### [ 点评 ]

唐代名相李德裕曾说：“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新唐书·李德裕传》）以此，他曾上疏要求罢免郡县官吏二千余员，引起众怒。宋太祖赵匡胤认为：“吏员猥多，难以求其治；俸禄鲜薄，未可责以廉。与其冗员而重费，不若省官而益俸。”（《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一）省官，即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历史上的“省官”，常常是由于“少事”。一旦事务繁多，势必会增添官员，省官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但官多未必就能解决事情，滥竽充数者比比皆是，更何况对不少人来说，做官是谋生，确切些说是谋利的手段，“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千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菰中随笔》）以此造成“官多则乱，将多则败”（《日知录·医师》）的局面。一些有识之士，从正本清源的角度考虑，提出要制止官吏生事，首要的是君主“省事，省事则无所售其吓射。即勒之应役，将有不愿而逃去者。

尤安民之急务也”（《菰中随笔》）。本文后半段即申述此意，以“萧规曹随”，“载其清静，民以宁一”为榜样，视“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为“探本之言”，即君主“清心省事”，不折腾，使贪官奸吏无机可乘，这才是釜底抽薪之策，是为政的根本。

国家图书馆